

男女平等价值观的理论内涵解析^①

刘晓辉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北京 100730)

摘 要:澄明和把握男女平等价值观的理论内涵是关涉男女平等价值观的认知、认同、确立、践行的根基性的理论前提问题。男女平等价值观,是不同于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等落后陈腐性别观念的一种具有平等理念的性别观。男女平等价值观指人们对男女两性的人格与尊严以及两性在家庭和社会领域中的能力与价值、角色与分工、权利与责任、机会与结果进行认知和评判时持平等的态度和看法。其包含有机统一的 5 个方面:第一,女性是具有独立人格、尊严、价值和社会贡献的人;第二,男女两性是平等、和谐、包容、共享的依存关系;第三,男女两性全面参与平等、文明、和谐家庭建设;第四,男女两性全面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第五,女性是生态环境保护不可缺少的重要生力军。

关键词:男女平等;价值观;理论内涵;性别观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01-09

男女平等价值观,是人类社会对“男女平等”基本价值的取向和追求。在我国,男女平等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始终遵循的价值原则和坚持不懈的价值追求,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价值观基础,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男女平等价值观的提出与确立,对于实现男女两性平等、自由、协调、全面发展,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秉承男女平等价值理念,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教育及舆论等多种措施持续推进男女平等。男女平等,是我国宪法的基本价值原则;1995 年,男女平等被确

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2012 年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被写入十八大报告;2012 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男女平等价值观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设专节专章对“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作出了部署。可以说,在我国,男女平等已经在制度层面得到确认。但是,在日常生活和大众传媒中,不尊重女性,贬损女性价值和作用,误解两性之间的关系,不公平定位、评价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与分工、权利与责任、机会与结果的观念、言论仍时隐时现。可见,当下,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仍时时受到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等落后陈腐性别观念的挑战,两者的较量从未停止,男女平等价值观的认知、认同、

收稿日期:2017-06-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男女平等价值观研究与相关理论探讨”(项目编号:12&ZD035)

作者简介:刘晓辉(1980—),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女性发展理论、男女平等基本理论研究。

确立和践行仍需不懈的努力。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理论前提便是需澄明男女平等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到底是什么,因为只有首先知晓男女平等价值观为何物,才能进而谈认知、认同、培育、确立、践行的问题。

一、价值观的本质

价值观指基本价值在人们思维中的观念,即人们看待和处理个人、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关系和各类事务时所表现出的认知、判断、看法和观念的总和,常常表现为人们的好坏观、是非观、善恶观、美丑观、荣辱观、得失观、利弊观等,是人们向往、追求、拥护、反对、舍弃什么的观念系统。

价值观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价值基础,一方面表现为一种价值尺度和价值原则;另一方面表现为一种价值取向与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在家庭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价值观是深藏于人们内心的准绳,成为人们处理事情、判断对错、选择取舍的价值标准,对人类群体及个体的思维与行为的动机、内容、方式及目的,均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价值观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而且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同时,价值观又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又具有历史性和可变性。

二、男女平等价值观的理论内涵

男女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关于怎样看待、评价作为个体的女性、男性,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男女两性与家庭、社会、国家和民族以及生态环境的关系,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态度和观点,其总和构成了不同的性别价值观。

男女平等价值观,说到底,是一种具有平等理念的性别观。可以从5个维度来理解和把握,即:一是人们对男女两性个体的人格、尊严、能力、价值等持有平等的态度和看法;二是人们对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持有平等的认知和评判;三是正确认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四是正确看待女性与国家、民族、社会的关系;五是准确判断女性与生态文明的关系。

简言之,男女平等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男女两

性的人格与尊严以及两性在家庭和社会领域中的能力与价值、角色与分工、权利与责任、机会与结果进行认知和评判时持平等的态度和看法。

具体来讲,男女平等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包含以下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5个方面。

(一)女性是具有独立人格、尊严、价值和社会贡献的人

对女性作为一个社会人作出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不仅关系到女性自身发展,对实现男女平等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人类历史上,自私有制产生以来,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贬抑与否定之词便不绝于耳,迄今为止,这种对女性不公正的看法、评价与观念仍根深蒂固。这对女性来说,是一种不公正的误识和偏见。作为人,女性同男性一样,是平等的社会主体,男女人格与尊严、智力与能力、贡献与价值均是平等的。

1. 男女两性人格与尊严平等。作为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生而自由平等。男女两性生理结构不同,但这种不同不能作为存在社会地位差距的依据,在生命的尊严与人格上男女两性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优劣的差别。

在漫长的奴隶、封建社会中,父权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从根本上压抑女性的主体性,经济生活中强调“男外女内”,政治生活中强调“君君”“臣臣”,家庭生活中则强调“父父”“子子”,国家用法律等意识形态确立男子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提倡“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使得女性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依附和依赖于男性,无独立人格与生命尊严可言。正如波伏娃所言,“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女人的被动与依附并非生就的,而是父权制度与文化造就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平等的目标就是要“脱离夫奴隶之羁绊”^[1]。人格与尊严平等是一切平等的基础,意味着把社会中的男女两性作为平等的人予以尊重,充分肯定男女两性同样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和道德价值,反对并消除任何领域基于性别的偏见和歧视,是男女平等的第一步。

2. 男女两性智力与能力平等。人首先是一个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人,具有自然属性。同属自然人的男女两性,具有生理方面的

不同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尚没有任何研究报告或其他确凿无疑的事实,能有力地证明男女智力与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以致可以从总体上科学地断言男女智力、能力孰优孰劣。相反,大多数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两性智力与能力的差异并非人们观念中普遍认为的那样大。男女智力总体上具有平衡性,不存在谁高谁低、孰优孰劣的评判。社会上流行的“女性智力与能力不如男性”的“女性弱智论”的观点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偏见。

其实,无论思维习惯、行为方式,还是能力水平,整个男性群体和整个女性群体之间平均水平的差异,远远比不上一名男性与另一名男性之间的个体差异,同样也比不上一名女性和另一名女性之间的个体差异。可以说,真正将人与人区别开来的是个体差异而非性别差异。但现实却往往是人们放大了性别差异,而忽略了两性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差异。而且,人与人、男性与女性之间即便有差异,也并非是由先天的生理差异造成的,而是后天环境影响和塑造的结果。

在阶级社会中,女性被囿于家庭樊篱,失去了在广阔的社会天地发展能力的权利与机会,势必思维狭窄,目光短浅,如井中之蛙,不了解井外之天。柏拉图说,“如果我们想让妇女做与男人相同的事情,我们必须交给她们相同的事情”。传统固化的性别分工只交给女人家务和生育,却说她们只会生育和做家务。社会要女子“无才便是德”,剥夺了她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却又贬斥她们什么都不懂^[2]。这对于女性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污名化与蔑视。其实,女子智力与能力并不差于男性,她们一旦接受教育,了解了天下大事,开阔了视野,智力被开发了出来,则“往往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3]。

3. 男女两性贡献与价值平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女性同男性一样,是家庭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主体,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男性中心社会,男性的作用被有意识地强化与抬高,女性的社会贡献和社会价值却被有意识地贬低甚至抹煞,女性的伟大作

用被淹没了。

作为平等的社会主体,男女两性同为伟大的人力资源,是实现社会文明进步和国家繁荣昌盛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女性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参与者、贡献者。女性在与男性共同承担物质资料生产的同时还承担着人类再生产的神圣使命。现代社会中,女性不仅是家庭建设的决策者、管理者、参与者与贡献者,更是心怀天下,勇担时代使命,活跃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生态、军事等社会各领域、各方面,以卓越的才干和贡献,在社会变革、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撑起半边天。

总之,女性同男性一样,是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勤劳勇敢、蕴藏着无穷智慧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体。那种无视女性作为平等社会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无视女性智慧与力量的社会偏见,不能对女性的贡献与价值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不仅造成女性的潜能无法充分发挥、女性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女性个体发展受到抑制,而且也不利于男性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

(二)男女两性是平等、和谐、包容、共享的依存关系

人类社会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最自然、最基础、最必然的关系。然而,关于两性关系的认识、评价与定位,一些人总是执着于“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男高女低”的等级观念,难以摆脱对立、对抗、疏离的思维模式。一些人认为,女性解放,就是“要压制和打倒男性,建立女性统治男性的女权社会”;男女平等,就是“女性向男性争权夺利,争资源,抢地盘”。

纵观两性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伴随着人类社会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几个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两性关系经历了朴素的男女平等、男性统治、女性解放这样几个状况。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男女两性之间是统治、压迫、对抗的等级关系,两性的关系是畸形、扭曲的,不仅女性能力得不到发挥,男性同样受束缚、受压抑,人的自由发展程度很

低。近代工业文明吹响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号角,今天的男女两性,正逐步迈向平等和谐、包容对话、共享融合的时代。可以说,男女两性关系,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是统治与服从、此消彼长的对立对抗关系,而是非等级、非对立、非对抗的平等、和谐、包容、共享的依存关系。

1. 尊重差异、平等依存。男女两性共同构成人类世界,共同缔造人类社会历史,共同繁衍人类,使人类生生不息。男性并非女性天生的压迫者,女性也并非天生是男性奴役的对象,男女之间具有天然的平等关系。

男女两性虽然自然属性不同,但差异不是差距,正是生理构造不同的男性与女性,共同创造着丰富多彩、五彩斑斓的美丽世界,成为两性和谐的基础和两性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前提。男女两性不是对立、对抗的等级关系,而是平等依存、相互促进的伙伴关系。

正视男女两性不同的生理属性,尊重两性的生理性别差异,就意味着不以优劣好坏来评价男女两性的性别特征,不主张绝对的“男女都一样”“男女等同”,女性不以“男性价值”为标尺达到男性在现实中的水准,成为“男性化”的人。同时,主张消弭两性的社会性别差距,促进男女两性协调发展,推动女性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使女性与男性在家庭、社会各个领域角色与分工、权利与责任、资源与收入、机会与结果等方面平等。

2. 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第一,女性发展关系着男性的发展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女性发展、男性发展同是人类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女性解放与发展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女性不解放,男性也得不到解放,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得不到实现。女性的落后,阻碍的不仅是女性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而且将阻碍男性的全面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进步。

第二,男女平等关涉两性共同的解放与发展,离不开男性的支持与参与。父权制度和文化的不仅伤害和禁锢着女性,也束缚和限制了男性的解放与发展。男女不平等是男女共同的发展羁绊,摆脱历史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男主女从、

男强女弱传统观念,已经不仅仅是女性解放的需要,更日益表现为男性人格健全与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男女平等、女性解放,不是女性向男性的“夺权复仇”,不是以女性来代替男性、压迫男性而造成新的不平等,而是旨在追求和实现男女双方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男女平等、女性解放,是两性共同的解放与发展,需要男性的支持与参与,需要两性共同协力完成。

第三,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男女两性的精诚合作。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效益,将取决于男女两性合作的程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需要男女两性人力资源、创新能力的充分展现,需要两性的良性互动和高效合作。在家庭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两性互尊互爱、平等相待、各展所长、共建共享、携手前进,才能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明天。

(三)男女两性全面参与平等、文明、和谐家庭建设

在漫长的传统封建社会,基于性别形成了固化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模式,“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男性被定位为从事公事、外事,参与社会公共领域的“养家者”,他们尽情遨游于广阔的社会天地,建功立业,女性则被视为无公事、只能从事内事和私事的“被养者”,固守家庭,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专事家务,被认为是女性的天职。近代工业文明以来,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广泛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生态等各个领域,以卓越的能力与业绩,与男性一起成为社会生产的参与者和家庭收入的贡献者,承担起养家的责任。然而,挣钱养家主要应该是男人的责任、男人应该是家里的顶梁柱、男人应该有自己的事业、男性的职业发展权优于女性等等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依然顽固地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中。时下,人们在择偶结婚时,依旧固守着“男高女低”的传统婚配标准,希望年龄上“男大女小”,学历、收入、身高上“男高女低”,要求男方有房有车、出具高额彩礼。妻子即使出来工作承担了养家责任,可做家务、照顾老人孩子也还是妻子的主责,必要时,要牺牲自己成就丈夫的发展,夫贵

妻荣;女性天生就适合、擅长做家务和带孩子,一个女人如果在家不做家务,那便是个“无女人味”的人,是个懒女人;“男做女工,一世无功”“好男不问家务事”,男人在家里做家务,照管孩子,就是无能 and 窝囊的表现,这些认识偏见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在人们的头脑中,无酬的家务劳动与有酬的社会劳动相比,是不创造社会价值的。内外的区分不仅是家庭与社会界限的区隔,更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尊卑等级。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4]。家庭,是每一个家庭成员共同组成、共同参与、共同尽力、共同享有的命运共同体。平等、文明、和谐家庭建设离不开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尽心参与、悉心经营与精心呵护,是男女两性共同的权利与责任。

1. 男女两性同是家庭建设的参与者、决策者、贡献者与共享者。作为平等的社会人,男女两性都扮演着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都要参与家庭与社会建设,也都是家庭权利与社会权利的享有者、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承担者。

女性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天生隶属于家庭,天生适合、擅长做家务与照顾孩子。传统“男外女内”的固化分工,剥夺了两性的自由选择权和发展空间,女性失去了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权利,承受了太多的家庭重担;而男性则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和压力,失去了在家庭中享受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权利与乐趣。时下依然流行的“男高女低”的择偶观,实质依然是“男强女弱”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定型在起作用,反映的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从属与被从属、供养与被供养的不平等的两性关系。

当前,女性已然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传统固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已然松动和改变。因此,无论自觉与否,男女两性都需要从性别角色态度到性别角色期望、从权利与机会到义务与责任,适时作出及时的调整。

从经济来源上来讲,在一个家庭中,挣钱养家应该是男女两性共同的权利与义务,男女双方都应该为家庭作贡献。男性不再是唯一的“挣钱养家者”,女性以广泛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

贡献与业绩同样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持者与贡献者,与男性一起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从家庭权力上讲,男女两性都是家庭的主人,共同成为家庭发展与家庭建设的决策者与管理者。对于家庭的生产经营、投资、贷款、购房/盖房、购买大件商品、子女升学/就业等重大家庭事务及家庭生活的日常开支等,男女应共同商量,共同规划。从家务分工上讲,从事家务劳动是男女两性共同的权利与责任,男女两性应共享共担养老、育幼、家务劳动等家庭照料的权利与责任。从家风传承和家庭环境营造上讲,男女两性应以身垂范、言传身教,共享共担子女的家庭教育、良好家风培育传承的权利与责任。男女两性在生活中应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积极构建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平等、民主、和谐、包容的家庭关系。

2. 尊重、肯定和认可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家务劳动是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为满足其成员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需要进行的劳动^[5]。其特点在于以家庭为场所,以家庭成员为服务对象,既包括为成年人自身生活服务的劳动,也包括为家庭老人和未成年子女生活服务的劳动;既包括劳动者自身再生产的劳动,也包括人类社会人口再生产的劳动;既包括维持家庭成员生存需要的劳动,也包括满足家庭成员发展、享受需要而进行的劳动。

家务劳动虽然在家庭内进行,受益者是家庭成员本身,但这种劳动却是从事其他劳动的前提条件,进而是整个社会劳动的基础。可以说,家务劳动不仅是一种家庭劳动,更是一种社会劳动;不仅是一种生活劳动,更是一种生产劳动。家务劳动是社会生产劳动在家庭中的继续,是社会生产、交换与消费过程的构成部分,如果没有家务劳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可能中止。家务劳动与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一样,不仅创造了使用价值,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据估计,家务劳动占工业化国家所创造财富的25%~40%,家务劳动对国家经济的贡献显而易见^[6]。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无论家庭形态、家庭

功能怎样变化,自古至今,女性始终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家务劳动特别是女性的家务劳动对家庭成员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家庭被视为私人领域,家务劳动被认为是婆婆妈妈、琐碎复杂的私人事务,与社会无关,且家务劳动的成果不在市场上进行经济交换,家务劳动是无酬劳动,其经济和社会价值被严重忽视,得不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可。承担繁重家务劳动的女性,在人格、就业等方面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女性的家务劳动在分配上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与补偿,在社会上,女性失去了她们应该占有的重要位置,造成事实上社会和家庭中的两性不平等。

公允地对家务劳动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使全社会认识、尊重、认可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男性更多地投入家庭,享有家庭权利与女性共担家务劳动,将不仅推动妇女解放事业,更带来人性的解放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反,固守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无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不管是何种性别,都仍将生活在束缚和不自由当中,两性的全面均衡发展无从实现。

(四)男女两性全面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传统社会对男性的要求与期待是参与社会、成就伟业,对女性的要求与期待则是固守家庭,做好贤妻良母,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几千年来,女性被禁锢在家庭,参与社会生产与社会活动的权利被剥夺。现代社会,女性虽然已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然而,女性参与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阻力与障碍仍远超男性。社会和文化总是极力讴歌伟大的母亲,赞颂无私的母爱,渲染母亲是女人最神圣的天职,却忽视女性应享有的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权利,抹煞女性作为生产者、职业者的智慧、才干与力量,忽视女性对于社会的责任与贡献,忽略女性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舆论把在社会参与中取得成就的女性描述成生硬死板的“女强人”,极力渲染这些女性在家庭、情感生活中的失落与自责,强调她们因过于注重事业而忽视了家庭责任,是缺乏女人味的,

的,与贤妻良母的形象不符。当社会面临就业压力与困境时,“女性阶段就业”“妇女回家”的主张和呼声就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女性为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们同男性一样,除承担着物质资料的生产外,同时还承担着人口再生产的重大责任。这本来应当成为女性受社会尊重与认可的理由。然而,一些人总是认为并强调,母亲是伟大的,母职是神圣的,但女性、母亲终究是隶属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女性承担的人口再生产也被认为是家庭、女性个人的私事,不具有社会价值。不仅如此,生育责任还被当成了女性天生的弱点、女性的特殊负担和社会的累赘,变成了女性求职、晋升的主要障碍。当前,面对与男性发展相比女性发展相对滞后的社会现实,有人将此归因于女性素质低,或者认为女性解放与发展就是女性自己的事情;还有人认为,经济发展了,女性自然而然就解放了。这些认识偏见都需要澄清和纠正。

1. 女性同男性一样,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主体力量。作为平等的社会人,男女两性享有平等的参与国家建设的权利,并平等地履行社会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社会中,扮演好社会角色,从事社会工作,通过参与社会生产和各种活动在为国家、社会、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作贡献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解放与发展,这不再只是男性的事情,同样也是女性应享有的社会权利和应尽的社会义务。

社会发展离不开生活于其中的男性、女性的平等参与和贡献。女性在发展中的作用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直接有关,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女性同男性一样,是推动国家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主体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离不开男女两性的共同奋斗。广大女性全面参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生态等各个领域建设,不仅是其实现经济独立,提高综合素质与竞争能力的需要,更是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力的需要。

我们再也不能固守传统性别观念,无视女性这支伟大的人力资源,忽视女性的智慧、才能与

创造力,看不到女性的重要作用与贡献;再不能借口女性应尽母职,承担家庭责任,主张女性退出社会、回归家庭。否则,不仅是漠视女性的主体权益、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而且会造成女性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进而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2. 尊重、肯定和认可女性人口再生产的社会价值。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两种,一种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为了世代延续而进行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口和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人口再生产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物质生产的基本要素和能动力量^[7]。两种社会生产互为前提,互相制约,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共同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制约力量。任何社会都是两种生产的有机统一,人们为这两种生产付出的劳动构成了社会的总劳动。可以说,无论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人口再生产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都是社会劳动,都具有社会价值。

女性不仅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参加物质资料的生产,还同时承担着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为人类社会的延续、存在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作出了特殊贡献。当前,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价值是得到公认的,而人口的再生产却由于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因而传统观念一直把生育、养育子女看成是女性、家庭的私事,其社会价值被忽视和抹煞,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承认。全社会应尊重、肯定并认可女性在人口再生产中的社会价值,并给予其公正评价和合理补偿,不使女性因生育责任而被歧视和限制。

3. 强化国家责任,保障女性发展。男女平等、女性发展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地实现。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的发展、社会中人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条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纵观人类历史不难发现,正是经济的发展为广大女性的社会参与提出了客观要求,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女性的解放与发展。男女平等、女性

发展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存在多方面的制约性因素,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

男女平等、女性发展是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民族昌盛的重要目标与体现。男女不平等、女性发展滞后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女性个人的问题。因此,男女平等、女性全面发展的实现,不仅需要作为主体的广大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不懈的坚持与奋斗,更需要国家力量的强力保障,创造一种良好的支持性的社会环境。

当前,在男女两性实质上还存在发展差距的社会现实中,国家需要通过坚持不懈实实在在的努力,在出台法律、制定政策、编制规划、部署工作等各个环节充分考虑男女两性的现实差异和妇女的特殊利益,为开发妇女这支伟大的人力资源提供制度保障。离开国家的积极作为,男女平等的实现将更为漫长曲折。

(五)女性是生态环境保护不可缺少的重要生力军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和自然界须臾不可分离。人类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承担着管理和保护地球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与自然永续和谐相处的责任。人类应该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善待自然、呵护自然,同自然共生共长。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伟大事业,是男女两性共同的权利与责任。女性同男性一样,对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未来肩负着重要职责,这不仅是女性不可剥夺的权利,更是女性不可推卸的伟大使命。

然而,长期以来,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中,性别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女性在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的角色与作用、知识与经验、能力与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甚至被忽视,女性的声音、权益与需求很少得到倾听与关注。一提起女性与环境,人们往往就把女性定位为生态环境恶化的受害者,女性是极其脆弱的,是需要被救助与被保护的。即使注意到了女性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与贡献,由于传统性别角色定型的影响,也只是突

出强调女性在家庭生活领域以及作为消费者的作用,而忽视了女性参与经济与社会发展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对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事实上,女性不仅仅是环境恶化的受害者,更是环境保护的参与者、贡献者,是应对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的重要力量。人类是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在这一点上是不分性别的,男性女性没有谁可以幸免。只是,由于妇女的自然生理特征及她们在社会繁衍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8],加之传统劳动性别分工及女性所遭受的制度性和结构性的歧视,环境恶化会对女性的健康、工作和生活质量造成更大的损害和更直接的影响。环境恶化导致女性生活更加贫困,环境污染直接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还会通过怀孕、哺乳影响到下一代。我们既要看到女性在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面前所具有的脆弱性、敏感性,也要看到女性同男性一样在促进生态环境优化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力。由于女性承担着人类再生产的使命,因而母亲的爱与责任使她们对生态环境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力与洞察力,更能体会到环境恶化对人类及子孙后代造成的严重影响,会更深切地关注生存环境的质量,从而积极采取保护环境的行动,为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1. 作为消费者,女性是推动形成绿色消费方式的重要力量。作为家庭消费的主要管理者、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和家庭照料的主要力量,妇女在日常消费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妇女对消费品和消费方式的选择,不仅在改变家庭生活方式、推动节能环保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而且能促进生产、流通、消费的过程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女性能否考虑环保因素,采取一种低消耗、低污染、符合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将直接影响一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消费方式和生产结构,进而促进环境状况的改善。女性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践行用布袋购物,选择绿色产品,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回收、废旧物品循环使用,注意节水、节电、节约燃料等等,就会带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反之,如果采用不可

持续的消费方式,就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对环境的破坏。女性对环境的作用还体现在她们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影响力上。如果每一位母亲都能用自己“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的理念和行动影响自己的孩子,使他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养成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就可以大大增强下一代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2. 作为生产者,女性是推动形成可持续生产方式的重要力量。女性作为广泛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领域、各行业的生产者,在节约资源、清洁生产、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推进绿色发展、环保发展、低碳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妇女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我国80%以上的农业劳动、70%的家庭种植业和养殖业都由妇女承担^[9],她们能否在生产中注意生态保护和可持续经营,能否注意保护土地资源,科学选择使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科学处理废弃农膜、秸秆、家禽粪便等,都会直接影响生态环境。

3. 作为决策者,女性是推动形成科学环境决策与管理的重要力量。女性参与环境决策与管理,对于提高环境决策与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平公正具有重要意义。《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妇女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她们的充分参加对实现持久发展至关重要”^[10]。《行动纲领》指出:“健全的环境管理所需的战略行动应采取一种整体的、多学科和部门间的对策,妇女的参与和领导对于这一对策的每个方面都至关重要。没有男女共同参与的 environmental policy 终究不会成功。”“除非承认并支持妇女对环境管理的贡献,否则可持续发展就将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11]环境决策与管理中纳入性别视角,让女性全面参与其中,参与家庭、社区及国家各个层级关于生态环境的法律、政策、项目、方案的制定、实施、监测和评估的各个阶段,充分肯定和采纳女性环境知识、经验及技能,重视倾听女性的声音,关注女性的权益与需求,并将它们反馈到环境决策中,对于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层次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 ① 本文的写作,得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领导的悉心指导及妇女理论研究室马焱、黄桂霞、马冬玲老师的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 [1] 陈独秀.敬告青年[EB/OL].凤凰网读书, http://book.ifeng.com/special/wusiwenrenpu/list/200905/0501_6351_1135138.shtml,2009-05-01.
- [2] 孔岩.社会分工与女性角色变迁[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39-43.
- [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23.
- [4] 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2015年2月17日)[N].人民日报,2015-02-18.
- [5] 刘爱玉,庄家炽,周扬.什么样的男人做家务——

情感表达、经济依赖或平等性别观念[J].妇女研究论丛,2015,(3):20-28.

- [6] 张赛玉.性别回归:社会性别视野下的和谐家庭建设新探[J].湖南社会科学,2016,(1):106-109.
- [7] 苟建忠.对妇女生育价值及其社会补偿方式的几点思考[J].社会科学探索,1989,(6):71-75.
- [8] 中国妇女环境宣言(草案)[J].中国妇运,1994,(8):5-6.
- [9] 关夏.重视女性主体性以生态文化建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N].中国妇女报,2012-11-13.
- [10]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J].环境保护,1992,(8):2-3.
- [11] 联合国大会.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EB/OL].中国妇女研究网,<http://www.wsic.ac.cn/internationalwomenmovementliterature/66149.htm>,2009-06-15.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LIU Xiao-hui

(Women's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 Beijing 100730, China)

Abstract: The clarification and grasp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values is basic theoretical premise for the cognition, identification, establishment and practice of gender equality. Gender equality values are a set of views of gender equality, different from the obsolete views of “men are superior to women” “men are dominating” “women are subordinate to men” “men being responsible for external affairs and women for internal” and so on. In short, gender equality values are beliefs in judging or evaluating the personality and dignity, roles and division,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opportunity and results of men and women in family and society. Concretely speaking, its connotation includes five integrated aspects: Firstly, females posses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dignity, value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Secondly, men and women are mutually equal, harmonious, tolerant and sharing. Thirdly, men and women fully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qual, civilized and harmonious families. Fourthly, men and women both devote to the great cau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ifthly, females are an indispensable forc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Key words: gender equality; value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views of gender equality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

社会性别、男权统治与社会契约论

——重读盖尔·鲁宾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

施文斐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盖尔·鲁宾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首次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并促成了女权主义视野下“社会性别”理论的迅速崛起。然而,这一女权主义核心范畴的本源实际上却是有着鲜明男权立场的社会契约论。为了避免认识上的混乱与理论上的尴尬,鲁宾在建构理论框架时有意避开本源不谈,致使许多重要的论述都无法深入到底。只有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大背景对鲁宾的这篇论文加以重新解读,才有可能使问题的阐述真正落到实处,使妇女从属地位的根源性探究真正成为可能。

关键词:社会性别;社会契约论;父权制;兄弟同盟;女人交换;性契约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10-09

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盖尔·鲁宾于 1975 年发表的重量级论文《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集中体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女权运动第二波浪潮对妇女从属地位的根源问题的深切关注。作为对这一问题反复思考的理论成果,鲁宾在这篇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借以阐明“将女性作为天然材料接受,做成驯化的女人产品”的“系统性的社会组织”^{[1](P23)}。该概念的提出促成了女权主义视野下“社会性别”理论的迅速崛起,并成为女权运动的核心范畴和理论基础。

然而,这一为女权主义奉为圭臬的概念其实并不完全是鲁宾的个人发明,而是有着相当深

刻、复杂的思想背景的。对此,鲁宾也无意否认。她于文章中坦言,其所构建的“性/社会性别制度”正是以“列维·斯特劳斯和弗洛伊德互相重叠的一些著述为起点”^{[1](P23)}，“试图借用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概念来建构一个关于妇女压迫的理论”^{[1](P62)}。但这是否就是这一概念的全部理论来源呢?不知为何,鲁宾完全没有提及社会契约论,而“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的原初运用正是率先发起于 17 世纪的古典契约理论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的社会性别理论充其量也仅能算作“近源”而已。鲁宾敏锐地注意到了此二人的理论在强制性的异性恋、两性权利差异等方面表现出的惊人的一

收稿日期:2017-06-03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资助项目“性别书写研究与近世白话小说”(项目编号:2014YB11)

作者简介:施文斐(1978—),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近世小说与性别研究。

致,但却未能足够敏锐地发现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二人的社会性别理论均与社会契约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鲁宾不可能对社会契约论一无所知,事实上,其在文章中确实曾明确地提及过“社会契约”一词,尽管只是匆匆带过。在论述弗洛伊德的女性气质形成理论时,鲁宾就将曾经处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同性恋女孩最终对“异性恋女人”这一社会性别身份的接受视为“签署社会契约”,但笔者相信这一不小心遗漏下的“蛛丝马迹”对于鲁宾而言很可能仅仅是一个无意间的“笔误”。如果可以的话,她将会尽可能地抹除掉社会契约论在其论证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而只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理论来源归结为精神分析学说与结构人类学。

笔者认为,鲁宾对社会契约论这一“社会性别”真正本源的“避讳”很可能是为了回避“社会性别”在其原初运用时即与男性权力制度,即父权制、男权制结下的“不解之缘”。正是由于17世纪的古典社会契约论者发明并成功运用了“社会性别”,才使得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完整性,以及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的公民社会得到了维护,而公民社会究其实质其实就是男权制的,是传统父权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变相延续。“社会性别”就其原初运用而言,恰恰是站在了男权制(父权制)一边的,这一男权立场显然与女权主义者欲借“社会性别”以反男权压迫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恐怕也正是鲁宾极力撇清与社会契约论有任何关系的原因所在。为了能使“社会性别”真正地做到为我所用,女权主义者必须无视其发源于社会契约论的事实,必须无视其在原初运用时即已绑定的男权立场,而只将理论渊源上溯到似乎较少危险的精神分析学说与结构人类学,仿佛“社会性别”跟社会契约论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似的。

鲁宾在“社会性别”真正起源问题上的刻意回避、避重就轻并无助于这一概念在女权主义视野下的更新与发展,她也无法对精神分析学说与结构人类学作更深一层的理论打通,因为一旦如此操作就会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深层的社会契约论本源,这直接导致了她的一些重要论述无法再

深入下去。不过,却也因此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从社会契约论角度出发加以深入阐释的理论空间,并使追踪妇女从属地位形成的真正根源成为可能,而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之所在。

一、社会契约论与父权主义的论战背景下,“社会性别”的初次运用

“社会性别”在17世纪古典契约理论家与父权主义者围绕着父权制的起源(实为政治权力的起源)问题展开的论战中得到了初次运用。尽管古典契约理论家几乎从来没有明确地使用过这一概念,但其所表述的无疑就是“社会性别”的内涵,“社会性别”实为社会契约论者的一大发明。为了更为准确地理解“社会性别”在社会契约论者手中运用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对此次论战的背景加以简述,先从父权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菲尔默爵士的绝对君权论说起。

作为英国保王党中的时髦人物,菲尔默的绝对君权论集中体现在其于1680年发表的《先祖论》中。菲尔默的核心观点就是父权即君权,绝对父权是绝对君权得以确立的基础。在具体论证中,菲尔默将父权的起源归结为父亲的生育能力和生育行为,即父亲因生育子女而对子女自然享有权力。父权是自然而绝对的,子女生来即为父亲的附属品,“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不自由的,他一出生就成为生他的父亲的属下”^{[2](P40)}。人并非生而平等的,这一观点是菲尔默的绝对父权论、绝对君权论的基石,然而这显然与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契约论者的核心观点——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完全背道而驰。为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一场有着重大政治意义的“父权制”论争终于在以菲尔默为代表的父权主义者和以洛克、霍布斯为代表的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家之间展开,而正是在这场论争中,“社会性别”得到了首次运用。

不得不承认,菲尔默极其准确地抓住了社会契约论逻辑中的致命“要害”,即所有人都是“生而”平等、自由的。他表示如果人果真“生而”就是平等、自由的,那么,“就有必要在婴儿一出生时就征求他们的意见”^{[2](P87)}。然而,很难想象婴儿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会是双方缔结契约的结果。

这一有力的质疑使得社会契约论的整个理论构想陷入了有如釜底抽薪般的困境之中。严格来说,尽管社会契约论构想美好、鼓舞人心,但它确实忽视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社会建构的“自然限制问题”^{[3](P26)}。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与女性之间有性繁殖的产物,生殖过程本身是自然的,父母与婴儿之间也有植根于血缘的自然联系,并非纯粹的社会学课题,而社会契约论者却将社会契约的签订直接假定为是在自由、平等的社会公民之间进行的,完全忽视了成人之前的这段并不那么自由、平等的“自然限制期”。对“人的自然起源”这一事实的“疏忽”给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完满造成了不小的威胁,对此,社会契约论者有着各自不同的回应。

洛克承认了人的自然起源,认为尽管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但在成人以前,“他们的父母对他们有一种统治权和管辖权,但这只是暂时的”^{[2](P160)}。一旦子女长大成人,父亲就不再享有支配子女的权力。洛克乐观地认为他在“一个成年人的自由”与“一个尚未达到成人年龄的儿童对父母的服从”^{[2](P164)}之间达成了完美的平衡,但他的这一折中观点还是遭到了父权主义者的尖锐反驳。菲尔默认为,即使假定子女成人后即可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力,但其成人之前的这段时间隶属于父权的经历本身还是表明了权力的不平等与自由的虚幻,“假如人不是生而自由,那他就不可能在出生以外的其他任何时候被指明或证明能要求一种自由的自然权利”^{[2](P175)}。由人的自然起源而造成的自然限制对于社会契约论者而言简直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为了彻底地摆脱这一困境,霍布斯和普芬多夫索性否认掉了人的自然起源,他们坚持认为婴儿一出生即“以充分发育的方式”^{[3](P48)}来到人世间,恰如“突然之间冒出地面”的“构造完善”的“蘑菇”^{[3](P175)}一样,彼此独立、全无瓜葛。由于彻底否认了人的自然起源,将婴儿视为与成人同样自由、平等的“个体”,所以婴儿同样具有签约资格、签约能力。即便其暂时隶属于父权,那也是出于婴儿的自我意愿,是其“自愿”签订“父子契约”这一“社会”行为的结果,而非源自于婴

儿对父母的“自然”隶属。当然,尚无基本认知与读写能力的婴儿确实无法像成人那样形成文字契约,但霍布斯还是坚持认为“婴儿顺从母亲的权力而不是被抛弃就是同意的标志”,普芬多夫也认为孩子的沉默就是同意,所谓父亲的统治就是以“沉默的契约”^{[3](P88)}为依据的。

从这一近乎诡辩的生硬解释可以看出,陷入理论困境的社会契约论者为了彻底摆脱由于人的自然起源而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关于婴儿如何成为独立自主的、有意识的、理性的自我的尴尬问题”^{[3](P48)},而将社会建构的“自然限制”从人的自然起源转移到了社会性别上。如果婴儿不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或女性,而是作为社会性别上的男人或女人,“作为具有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的个体来订立契约”^{[3](P41)},而这种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本身又是社会构建而成的话,那么,社会契约论者的“认为社会是由人们通过契约而组成的观点就可以保留下来”^{[3](P40)}。因为婴儿已经被设定为一出生就是社会的一分子了,是自由、平等的独立“个体”,因此,他完全有能力、有资格同自己的父亲签约,父子关系因而是社会契约性的,而非自然隶属性的。如此一来,社会契约论最大的理论漏洞就被“有惊无险”地堵上了,其自身的理论完整性总算得到了保证。

二、关于“父权制”：社会契约论的胜利造成的两个错误印象

17世纪在父权主义者和社会契约论者之间展开的这场著名论战最终以社会契约论的胜利告终,并直接导致了古典父权主义思想的衰落。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1690年后,父权主义“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政治意识形态迅速衰落”,这成为“衡量社会契约论者的伟大成就的一个尺度”^{[4](P20)}。这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社会契约论是反父权的,同样地,在社会契约论者手中得到初次运用,并使得社会契约论一举扭转局面的“社会性别”也必定是反父权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通过上文论述可知,社会契约论者与父权主义者论争的焦点其实并不在父权本身,而在于父权的起源问题上。菲尔默认为父权起源于父亲

的生育能力与生育行为,是自然决定的生物学事实,而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者则认为父权起源于父子契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除此以外,霍布斯的观点则与菲尔默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都主张父权即统治权,主张绝对君权论。菲尔默曾就此作过如下评述:“关于行使统治权的权利,我同意他(霍布斯)的观点,但是我不能同意他的取得统治权的方法。”^{[2](引言P8)}可见,二人仅仅是在父权(君权)的起源,或者说获取方式上发生了分歧。与霍布斯同一阵营的另一位社会契约理论家洛克虽否认了父权即君权,但同样并不否认父权本身。可见,为社会契约论理论家们所真正关心的只是父权的契约起源问题,“社会性别”的运用有效地维护了这一观点。从这一意义而言,社会契约论究其本质是维护父权的,为其理论家所发明并运用的“社会性别”则是父权制得以维系的一套话语机制。社会契约论者对父权主义者的胜利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父子间统治与隶属的关系,并且还使得这种基于生育与血缘的古老权力得以在被普遍接受了生物学基础之外,又于社会层面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强化,并最终在现代公民社会中获得了实际上的合法席位。

社会契约论者在这次论战中取得的胜利还造成了另一个错误印象,即认为父权制已经不复存在。错误的印象导致了对“形势”过于乐观的错误估计。鲁宾认为“文化的演变”必将能使人类“从它畸形的古代关系中解放出来”“从社会性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P61)}。如果理解不错的话,鲁宾所说的“文化的演变”当指从血缘亲属关系向社会契约关系,或者说从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的转变。的确,如果仅从表面上来看(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一重大转变中,“地位、父权制和传统已经让位给契约和现代性”^{[3](P151)},维护父权制合法性的社会性别变得不再重要,人们可以从刻板的二元划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男性气质不再被“用来维护父权制的合理性”或展示“男人比女人能怎样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力”^{[3](P3)},女性气质也无须一定要以“被动的、自虐的、肉体的”等负面内涵才能从男性气质的对立面获得自

身的存在,“父权制的终结将使得个性不为社会性别的固定模式所限制”^{[3](P152)}。但通过上文分析可知,社会契约论并没有对父权制进行彻底地清算,其所倡导的现代公民社会就其实质而言也依然是父权制的变相延续。因此,作为从社会层面上维护父权制的理论工具——“社会性别”是不可能彻底消解的,因为它所服务的“恩主”——父权制即便在进入契约社会后也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退出历史舞台。

此外,即使如鲁宾指出的那样,随着从传统父权制向现代契约社会的转变,父权制赖以系的血缘亲属关系已经不再是社会组织的基础,那种建构在血统、身份、等级之上的传统父权社会已被现代契约社会所取代,但任谁也无法否认,血缘亲属关系,至少在繁殖与抚育这一层面上确实是超历史的存在。人的自然起源终究是无法回避的生物学事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3](P153)},无论父权来源于何处,只要亲子间基于血缘的自然联系存在,儿子就会至少在成年之前的这段漫长时间里隶属于自己的父亲,父亲也会至少在这段时间内有权对其行使父亲的权力。这表明于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之外终究还是有一个与自然血缘发生更多联系的私人领域的存在的,即使血缘亲属关系和父权制就整个社会层面而言失去了体制上的依托,但至少在由血缘维系的私人领域中还是得到了强有力的延续的。并且,即将展开的论述将会表明,即使被认为是推翻了父权制后建立起来的现代契约社会也同样是父权制的,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父权制的“变种”——兄弟同盟的契约男权制。

三、关于“女人交换”:“性权力”与兄弟同盟的契约男权制

列维将亲属关系结构描述为以女人这一“最珍贵的礼物”^{[1](P36)}为媒介而在两群男人之间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鲁宾认为列维描述的亲属关系制度是“性/社会性别制度可观察的,实实在在的形态”^{[1](P33)},其对“女人交换”(“女人交易”)的洞察深刻地揭示了“女人在其中对自身缺乏完整权利的一种制度”^{[1](P40)},于不经意间“构

造了一套解释性别压迫的理论”^{[1](P34)}。列维将婚姻视为一种原始交换,而“妇女只不过是一个交换对象,而不是进行交换的伙伴之一”^{[4](P118)}。女人的“礼物”定位表明了列维描述的亲属关系结构中,妇女人身所有权的丧失已成为既定事实,而人身所有权被社会契约论者认为是“个体”所拥有的最为重要的一项权力。女人的非个体身份使其丧失了签约资格,婚姻契约实际上是在具有签约能力的“个体”——两群男人之间进行的。也正是从这个层面出发,鲁宾认为列维描述的亲属关系制度洞悉了女人受压迫的从属地位形成的制度性根源。

然而,人们不禁仍然要问:为什么一定要进行女人交换呢?如果像列维所说的,女人交换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族外通婚的顺利进行,那么,被交换的为什么一定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呢?这样一种强烈的性别稳定性,即男人永远都是签约者、赐礼者、流通过程的组织者与受益者,而女人永远都是被流通的“礼物”究竟所据为何呢?或者,这一问题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即为什么一定要实行族外通婚呢?(防止乱伦的优生学考量并非最终答案)显然,如果仅仅停留在亲属关系的结构层面上是无法解答这些问题的。鲁宾认为,列维描述的亲属关系组织由于乱伦禁忌的实施而反映了“文化的起源”,因此可以推断说“妇女在世界上的历史性失败”^{[1](P39)}正是伴随着这一文化起源出现的。但事实上,列维所描述的亲属关系组织远没有处在文化起源的源头处,且妇女人身所有权的丧失在此阶段即已成为既定事实,这说明妇女从属地位形成的根源并不在此。可见,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完全有必要再向更深处进一步开掘,社会契约论视角的引入使之成为可能。

“女人交换”,以及确保这一交换得以实施的“乱伦禁忌”、通过这一交换而实现的“族外通婚”这三大要素的存在显示了列维所描述的亲属关系组织很可能即处于绝对父权被推翻后的“兄弟同盟”(兄弟契约)阶段,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现代男权制公民社会的雏形。关于兄弟们联合起来推翻原始父亲的绝对统治,并通过彼此签约建立

兄弟同盟的故事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视角下得到了生动的阐释,他的弑父结盟故事被认为是“契约论的翻版”^{[4](P109)}。在弗洛伊德的描述中,总是妒火中烧的原始父亲不仅独占了所有的女人,而且还将被他视为潜在情敌的儿子们统统赶走。终于有一天,颠沛流离的儿子们团结起来杀死了暴君父亲,绝对父权的统治随之瓦解。儿子们推翻父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父亲是他们在权力欲和性欲上的巨大障碍”^[5],因此,像原始父亲那样“独享对所有妇女的无限权力”^{[4](P116)}便成为接下来兄弟混战的导火索。经过一番相互厮杀后,他们终于认识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够强大到征服其他所有人,谁也无法取代原始父亲的位置成为拥有“绝对权力的父亲君主”^{[4](P109)}。为了避免争夺绝对权力(包括绝对性权)而对兄弟组织造成的巨大破坏,他们必须要制定法律、签署契约,在保障每一个兄弟权利的同时,也对每一个兄弟施加相同的约束。弗洛伊德认为,在兄弟们达成的这份“原始契约”中有三条最为重要:禁止弑父(或代表父亲的图腾动物);兄弟们人人平等;禁止乱伦。所谓的“禁止弑父”不过是对罪恶感的一种事后情感补偿,但后两条却对兄弟组织的存续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保障作用。其中的乱伦禁忌迫使兄弟们不得不到族外去寻找女人,由此形成的异族通婚制则不仅确保了男人的社会组织不会因对族内女人的混乱争抢而分崩离析,同时亦能使每个兄弟的性权力都得到保障。性权力不再被绝对父亲所独享,而成为每个兄弟,或者说每个男人都可分享到的性别权力。就这样,契约取代了专制,兄弟同盟取代了父亲独裁,父权统治终于为兄弟男权制的契约社会所取代。

弗洛伊德讲述的兄弟契约故事与古典社会契约论者,如洛克的相关阐述有许多可以相互印证之处:如他们都否认了父权主义者菲尔默暗示的长子继承制,而坚持认为由兄弟同盟结成的契约社会才是绝对父权被推翻后取而代之的新组织形式;他们都否认了兄弟间统治与隶属关系的存在,而主张个体平等与权力共享。洛克还在其《政府论》的相关论述中特别提到了雅各和以扫

的故事以佐证。认为他们两兄弟在父亲死后,“谁也没有支配另一个人的权力或权威”^{[2](P92)},谁也“不是另一个人的‘主’或‘奴’”^{[2](P93)},而是相互独立、各自为政,并最终成为“两个不同政府管辖下的两个不同民族得以产生的起源”^{[2](P93)}。与洛克不同的是,“性权”问题在弗洛伊德版的社会契约论中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对性权力的争夺是促成兄弟契约缔结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而引发的女人交换、乱伦禁忌、族外通婚则成为兄弟契约得以顺利实施的保障机制,这三点同时也是列维所描述的亲属关系结构的重要特征。

列维对亲属关系结构的分析仅仅停留在兄弟同盟阶段而没有再继续深入下去,对于一位结构人类学家而言,即此足矣,但对于一位女权主义者来说,如此程度的分析尚不足以探求到妇女受压迫的真正根源。由于对社会契约论有意无意的回避,鲁宾未能把握住亲属关系组织的兄弟同盟实质,也忽略掉了绝对父权制向普遍男权制的伟大转变,更没有洞察到原始契约背后的“性权分享”问题。男人之于女人的性权力究竟是如何获得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揭示妇女从属地位形成的关键。社会契约论者对“自然状态”下“性契约”的大胆设想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

四、关于“自然状态”：“性契约”与社会性别的再度运用

社会契约论有着极为鲜明的男权立场。如果说其与主张绝对父权(君权)论的古典父权主义有任何区别的话,那么也仅体现在如下两点:即反对将父权与君权(政治权力)相等同;反对父权起源于自然的生育力。但除此以外,社会契约论并不反对父权本身,而只是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出发将父权的起源修正为父子契约;从天赋自由的角度出发将原始父亲的权力独占修正为兄弟同盟的权力共享,从而完成了从传统父权制向兄弟契约的现代男权制的伟大转变。但其所改变的也只是权力的存在方式(独占还是共享),男权统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而所谓的“男权统治”,正是指公民社会里的公民(男人)“通过把有利于维护文明的男性特征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兄

弟联盟”^{[4](P1)},契约关系体现的即是作为独立“个体”的“男人之间的兄弟关系”^{[4](P82)},自由、平等的“个体”属性也只为男人所独享。

契约社会的建立需要女人的从属地位,需要先天的生理差异,也需要公、私领域的划分,这一切正是契约社会的男权本质所决定的。男权统治建立在女人的从属性上,男性的性别权力只有通过女人的隶属与服从才能获得体现,但女人的从属地位本身又显然表明了女人并非是拥有人身所有权的“个体”,这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如果否认了女人的“个体”身份,则有违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核心观点,这将会动摇社会契约论的理论根基;如果承认了女人的“个体”身份,那就等于是承认了她们的签约资格,这显然又不符合契约社会的男权利益。女人既必须是,但同时又绝不能是“个体”,这可以说是社会契约论者继父子关系后陷入的又一个理论矛盾。这一困境的解决之道需要一种极富想象力的假设,就是首先假定女人在“自然状态”下确实具有“个体”身份,只是后来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而丧失了人身所有权。同时还必须假定,当契约社会来临之时,所有的女人都已全部“成功地”丧失了签约资格,因此,只能作为男人的附庸进入契约社会。安置她们的地方只能是“私人领域”——这个既非原始的“自然状态”,又非真正公民社会的所谓“中间地带”,分派给她们的社会角色也只能是充当被流通的“礼物”,而绝不是具有“个体”身份的签约方,这正是霍布斯的思路。

霍布斯并不认为自然状态下会有任何天然的统治权,“自然个体的属性和能力在分配上不分男女,男女在体力或智力上并无差别,一切个体都是孤立的、彼此提防的”^{[4](P45)}。在这种情况下,迫使原本自由、独立的女人“自愿”放弃其人身所有权以隶属于某个男人的方法就唯有“征服”。在将“强制性顺从”与“自愿协定”^{[4](P45)}等而视之的霍布斯看来,被胁迫、被征服后的“同意”也是同意,由此达成的协议同样具有契约效应。这种被迫的“自愿”总是根源于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或者来自于由于身处劣势而不得不出让权利以换取保护的无奈,或者干脆就是在身

体力量对比下发生的暴力征服;前者主要由女人的生育劣势所致,而后者则不排除性暴力——原始强奸的可能性。就女人的生育劣势而言,霍布斯认为“男人和不是母亲的女人”在“其他条件是平等的”^{[3](P167)},唯有“母婴纽带可能使女人陷入相对于男人的一种历史困境”^{[3](P169)}。在彼此都是独立“个体”的“原始状态”下,包括婚姻在内的任何关系都很难长久地维系下去,处于生存困境中的孕产期女人必须要让渡出相当大的权利,如人身所有权,才有可能“笼络”住一个强壮的男人以供养其生活,并保障她们母子的安全。“无论一个人出于何种原因转让或放弃他的权利,都无外乎或是考虑到对方会将某种权利回让给他,或是他期望因此产生的一些其他利益”^{[3](P193)},这种通过权利让渡以换取保护的做法正是契约行为的体现。女权主义者帕特曼将这一于“自然状态”下即已“自愿”签订的,并导致妇女丧失“个体”身份的契约称为“性契约”。

帕特曼在1988年出版的《性契约》一书的前言部分中指出,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人们就对社会契约论又重燃热情,但在当时的讨论中,“性契约”这一“极其关键的东西”却“从来没有被提及过”^{[4](前言P1)}。然而,正是由于“性契约”的签署,才使得两性间统治与隶属的关系在“自然状态”下即已成为既成事实,从而使得男人的一系列性别权力,如对女人人身所有权的占有与转让、“确保每个男人都能获得一个女人”的性权力分享,以及通过“女人交换”以建立、巩固男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等都能在其后的兄弟同盟中得到顺理成章的认可。从这一意义上讲,“性契约”既是兄弟同盟的原始契约缔结的先定前提,同时也是婚姻契约的潜在基础,男权制的兄弟契约社会正是在导致女人从属地位的“性契约”的基础上才获得了存在的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自然状态”与“性契约”的设想中,社会契约论者虽然否定了男性权力来源于生理差异这一典型的生物决定论论调,并竭力表明女人的从属地位完全是“自愿”缔结契约的社会行为使然,但导致女人“自愿”放弃其个体身份的“契机”却还是被置放在了女人因生育负

担或力量对比而造成的身体劣势上。极力主张社会建构的社会契约论终究还是无法完全撇开生物学基础的影响。颇有趣味的是,对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建构而言,一向被视为棘手难题的生物学基础这次反而显现出了某种诡吊的必要性。可以说正是因为植根于女人的身体劣势这一无法抗拒、无法摆脱的生物学事实,才使得全体女人都必将被男人所征服的假定具有了最大限度的普遍性,才有可能确保在契约社会来临之时,所有的女人都已“成功地”丧失了人身所有权,所有的“个体”身份都已全部为男人所垄断,由此形成的契约社会才能必将呈现出一幅符合男权利益的美好图景——“兄弟同盟的男人天下”。

然而,这一绕不开的生物学事实终究还是有违于契约论者一直主张着的社会建构论的。女人被剥夺“个体”身份而隶属于男权统治的原因只能是社会的,而不能是自然的。社会性别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于此再次发挥了化“自然”为“社会”的神奇功效。男性气质被建构为“理性的、社会的、精神的”,与之相对立的女性气质则被建构为“情感的、自然的、肉体的”。只有男人“才能培养出维护公民秩序和公民普遍法所必需的公正感”^{[4](P106)},而女人则“不可能克服自己的感性和特殊爱好,控制自己的理性使之合乎普遍的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要求”^{[4](P108)},她们代表了男人若要保持“个体”身份、维护公民社会,就必须克服和控制的一切恶劣品质,女人隶属地位的成因由此被成功地从身体劣势置换为道德劣势,社会性别的运用使得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完整性再次得到了保障。

麦克因斯认为社会契约论有两大致命伤,即“对生育的解释”(父子关系中父权的来源问题)与“对婚姻的解释”^{[3](P179)}(两性关系中夫权的来源问题)。正是在这两个与“自然”牵扯最多的棘手问题上,社会契约论者发明并实际运用了社会性别。在父子关系上,社会契约论者以社会性别否认掉了“人的自然起源”,坚持住了父权来源于父子契约(而非自然的生育力)的观点;在两性关系上,社会契约论者又以女性气质的劣等性替代了女性的自然身体劣势,坚持住了统治与隶属的

两性关系根源于社会性别差异(而非自然的生理差异)的观点。作为意识形态建构与男权话语运作的产物,社会性别就好像“救命稻草”一样,在关键时刻为社会契约论化解“自然”危机提供了突围之路。

五、结语

无论对于社会契约论者而言,还是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生物学基础、人的自然起源、生理性别差异等关乎“自然”的问题总是会对各自的理论建构成不小的困扰,“社会性别”在这两大理论中的普遍运用正是根源于摆脱“自然”困境这一共同的理论需求。然而,具有鲜明男权立场的社会契约论者与努力探求妇女受压迫根源的女权主义者在使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时,其立场与目的显然又是根本不同的。相较而言,女权主义者意图摆脱生物学基础的愿望要远比社会契约论者来得更为强烈。契约论者虽然极力主张社会建构论,但其实并不急于否认生理性别基础与社会性别建构之间的关联性,相反,对于“社会性别”的建构而言,这一关联性的存在本身往往还会显示出一种诡吊的必要性,有利于男权立场的维护,其发明的“社会性别”实际上也是比照生理性别差异来建构的,更多地只是从“自然”到“社会”转化了性别差异的存在方式而已。就其理论建构的实际需求而言,更为迫切的是建构起“社会性别”这一“中间环节”,以表明父子或两性之间的统治与隶属关系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非“人的自然起源”,或自然生理差异的“直接”表达。

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联性问题上,弗洛伊德的认知与社会契约论者颇可相互参证。鲁宾在论文中曾重点探讨过弗洛伊德的社会性别理论,这一理论就其实质而言,同样有着鲜明的男权立场。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极力表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关联性,即唯有生理性别上的男性才能发展成具有男性气质的男人,同样的,生理性别上的女性也必然只能发展为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至于其间可能存在的“多态性异常”,亦即性别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都将在“阳具妒羡”“阉割情结”“阉割恐

惧”“自虐心态”等生理、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消解于萌芽之中。弗洛伊德借助“阳具妒羡”等生物决定论调来使社会性别合理化的做法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一片声讨,将弗洛伊德的社会性别理论视为“社会性别的再生产”,或者说“男权制的再生产”确实可谓切中要害。但如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理论也有其现实意义所在,即承认了社会性别毕竟有其无法摆脱的生物学基础,不可能像洛克的“白板说”所暗示的那样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一点也同样内含在社会契约论视野下的性别理论中。

然而,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由于基本立场的不同,她们急于否认性别差异,否认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任何关联,而更倾向于彻底的社会建构论。两性的生理性别差异是超历史的客观存在,如果承认这一生物学事实,女权主义将(似乎)永无出头之日;但如果否认了这一生物学事实,而假定两性差异建立在社会性别的基础上,而社会性别又与生理性别并无任何关联的话,那么,就可为女权主义者开辟出一个巨大的回旋空间。既然社会性别——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那也就意味着社会性别并不必然要与生理性别保持一致,女人同样可以发展出被赋予正面价值的男性气质,因此,也同样有资格进入为男性统治的权力世界。相较于社会契约论背景下的“社会性别”,女权主义视野下的“社会性别”无论在立场、内涵上,还是运用的目的上都已发生了太多深刻的变化,原本具有鲜明男权立场的“社会性别”在女权主义者手中得到了重新诠释,被改造为符合女权主义利益的“新”理论武器,已全非昔日面目可言了。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契约论对女权主义确实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其“反父权”的姿态、天赋自由的主张、极力推崇的社会建构论都对女权主义运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社会契约论重焕生机之时,正是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高涨之际,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性别”原本的男权立场确实极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对“社会性别”在女权主义立场上的理论更新与实际运用极为不利。或

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鲁宾在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时,并没有将“社会性别”的理论源头上溯到社会契约论的本源。然而,也正是由于撇开了社会契约论这一原初的理论背景,才无法认清“社会性别”于其原初运用时即已绑定的男权立场,也无法理解其在契约社会的蓝图构想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也正是由于缺乏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视角,“女人交换”所具有的“性权分享”意义、亲属关系组织的兄弟同盟实质、从绝对父权到兄弟同盟的伟大转变都无从认识,更无法探知到“性契约”这一妇女从属地位形成的真正根源。鲁宾有意回避社会契约论很可能是为了避免理论上的尴尬,但也因此导致了她的许多重要论述都无法切实地深入下去。只有结合社会契约论这一理论大背景,对女权主义视野下的“社会性

别”理论加以重新考察,才有可能使妇女从属地位的根源性探究真正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 [1] [美]盖尔·鲁宾. 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A]. 王政, 杜芳琴.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2] [英]约翰·洛克. 政府论[M]. 赵伯英, 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 [3] [英]约翰·麦克因斯. 男性的终结[M]. 黄茜, 周丽华,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 [4] [美]卡罗尔·帕特曼. 性契约[M]. 李朝晖,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5]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M]. 邵迎生,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137.

Social Gender, Male Power and Social Contract Theory: Rereading Gayle Rubin's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SHI Wen-fei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Gayle Rubin first proposed the “gender / gender system” 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and promoted the rapid rise of “gender” the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However, the origin of the core concept of feminism is actually a classical social contract theory with distinct male power perspective. To avoid confusion and theoretical embarrassment, Lubin intends to avoid the origin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sulting in the impossibility of in – depth discussions. Bearing the social contract theory in mind, taking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e social contract theory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thesis makes it possible to have in – depth discussion and the search of origin of women's subordinating status.

Key words: social gender; social contract theory; patriarchal system; brothers alliance; traffic in women; sexual contract

(责任编辑 鲁玉玲)

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与女性政治参与^①

许 超,王小芳

(中国矿业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0(CGSS2010)的数据与政治效能感的二维概念框架,对大陆女性居民政治效能感状况及其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就政治效能感而言,女性在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得分上均不及男性;在政治参与方面,女性在基层选举、依法抗争和社区参与中存在同男性相比相对不足的现状;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及性别与效能感的交互效用模型表明,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在整体上有助于解释女性政治参与活动中的相对不足现状。

关键词:政治效能感;内在/外在效能感;女性政治参与;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19-07

一、引言

宏观地看,女性政治参与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状况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当前,中国正处于大力构建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而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扩大女性参政,达成“广义的参政状态”^[1]。因此,对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现状进行考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女性政治参与包括权力参与和民主参与,探究女性在权力参与和民主参与中的相对不足现象,同时提出改进女性参政状况的举措是国内学界研究的重点议题,目前也已产生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不过,目前的学术研究多偏重于考察女性的权力参与,而对民主参与中两性差异状况的关注不够。本文利用 CGSS2010 的数据,对政治效

能感影响女性民主参与加以具体考察,以给理解民主参与中的性别差异提供新的视角。

本研究将可能给女性政治参与议题带来两方面的贡献:在理论层面,强化民主参与中的性别差异分析,与既有女性权力参与的探究文献形成呼应,是对女性政治参与研究议题的有益补充。在实践层面,呈现女性民主参与相对不足的现状,从政治效能感视角探究其成因,有利于提出改进女性参政状况的针对性举措,实现生活领域的性别平等,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二、相关文献回顾:女性参政不足的既有解释

(一)性别文化制约

性别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整套规范两性社会角色和分工的非正

收稿日期:2017-06-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矿山安全治理的政治过程研究”(项目编号:12CZZ008)
作者简介:许超(1975—),男,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王小芳(1991—),女,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性别政治研究。

式制度^[2]。在持文化视角的学者看来,无论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化传统还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都坚持认为政治生活不是女性参与的适当领域。对中国来说,几千年的宗法制度以维护男性的绝对权威及政治地位为核心,该制度宣扬的“男尊女卑”“夫贵妻荣”“男主外,女主内”等限制女性公共参与特别是政治参与的思想,对女性进入政治领域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偏见与舆论压力,影响女性政治参与水平的发挥^[3]。

(二) 社会资源获得中的弱势地位

社会资源指的是个体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等多个要素中的拥有状况。该理论认为,资源占有是个体政治参与的基础性驱动力^[4],而当前中国女性群体无论是在经济地位、受教育机会和水平^[5],还是在政治参与渠道等方面同男性相比,均存在明显的比较弱势,这导致女性在政治参与这一竞争性领域中处于劣势地位^[6]。

(三) 制度安排中的性别盲视和歧视

性别盲视和歧视指的是制度安排中性别意识的缺失。不少学者注意到,在权力参与领域,当前我国还存在不少性别盲视,有时甚至是歧视的制度,比如我国《公务员法》对男性 60 岁、女性 55 岁退休的不同年龄规定,对女干部职位晋升与工作成就的取得造成制约与阻力^[7]。

(四) 女性自身的主观因素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女性自身的主观因素也是导致其政治参与边缘化的原因之一,比如女性在心理素质方面的抗压能力、自信心等不如男性;在身体素质方面,女性生理负担重于

男性^[8],这些都对女性政治参与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观点有助于我们充分把握女性政治参与相对不足现象的多种成因。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既有解释更多针对的是权力参与中的女性参与状况,有关民主参与中的女性参与,比如女性是否参加村委会/居委会选举等的专门考察还比较缺乏。此外,西德尼·维巴等人的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在政治参与中的差异并不是因为女性在相关资源或者能力方面的劣势,而是由于女性政治效能感较低以及对政治不大感兴趣造成的^[9]。基于此,我们在此提出有待后文验证的不同于既有观点的探索性解释,即:我们认为,女性较低的政治效能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前我国女性相对不足的政治参与状况。

三、女性的参政现状

本研究所用的分析资料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 年的调查数据。CGSS2010 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其调查点遍及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在全国各地一共抽取 100 多个区(县),对 11783 位受访人员进行面对面访谈,形成有效问卷 11783 份,我们剔除与本研究无关的 1146 个样本,最终剩余有效样本容量为 10637。在 CGSS2010 的调查问卷中,从提问来看,研究者考察的是大陆居民参与地方层面各类政治活动的状况,比如基层选举和社区参与等,本研究所考察的也主要是这一层面的信息。在地方政治参与中,女性同男性相比,表现出明显的相对不足状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类政治参与的人数及占比:分性别统计

	男(N = 5153)	占比(%)	女(N = 5485)	占比(%)
参加村委/居委会选举投票	2600	50.5	2502	45.6
集体上访	75	1.5	53	1.0
写联名信	43	0.8	34	0.6
向媒体反映小区问题	169	3.3	145	2.6
向政府部门反映小区问题	169	3.3	145	2.6
参加抗议或请愿	43	0.8	35	0.6
参加村/居/业委会工作	498	9.7	449	8.2
向村/居/业委会提意见	820	15.9	631	11.5

在上表所呈现的政治参与活动中,为后文的统计分析便利,我们将村委/居委会选举投票命名为“基层选举”,将上访、写联名信、向媒体或政府反映小区问题以及参加抗议或请愿统一命名为“依法抗争”,将参加村委、居委、业委会工作及向其提意见或建议统一命名为“社区参与”。由该表可知,无论是在基层选举、依法抗争中,还是在社区参与中,大陆女性居民均存在同男性相比相对不足的现状。

四、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

“政治效能感”是个体对于政治体系的一种主观心理感知,而这种感知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是否积极参与政治过程^[10]。政治效能感概念的提出最初被用于解释和预测美国政治中的选举行为,自引入中国后,国内学者运用这一概念工具,已经对中国本土相关政治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

究^[11]。不过,政治效能感更多地被学者用于分析阶层政治(比如中产阶层的政治行为)和城市基层政治,而较少用于分析性别政治的相关议题。已有研究表明,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是明显的,而政治效能感在政治参与问题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基于 CGSS2010 的调查提问及数据,从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出发,考察女性群体相对不足的政治参与现象,希望能对理解女性的参政现状提供新的视角。

由于考察的维度不同,学者在有关政治效能感的概念构成上尚未达成共识,主流看法是将其划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两大维度,前者指的是个体对于自身理解和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的感知,后者指的是个体对政治体系回应需求的感知。在 CGSS2010 的问卷设计中,有关大陆居民政治效能感的提问如表 2 所示。

表 2 政治效能感:概念构成及其测量

政治效能感的维度	调查提问
内在效能感	(1)政府的工作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很难明白
	(2)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政治
	(3)如果让我当政府干部,我也完全能胜任
	(4)当和别人讨论政府的工作或做法时,我对自己没什么信心
外在效能感	(5)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
	(6)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
	(7)我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时,会被有关部门采纳
	(8)政府官员会重视我们对政府的态度和看法

CGSS2010 对于以上每一个调查提问,都用五分制的 Likert 量表记录受访者的回答情况,回答“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的分别标记“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为统计分析便利,我们计算每一位受访对象内在效能感的均值作为其内在效能感的综合指标,计算外在效能感均值作为其外在效能感的综合指标。

接下来,我们以统计数据具体说明男、女两性的政治效能感差异状况。对于政治效能感之性别差异的衡量,我们需要同时考虑性别差异的显著性以及差值大小。首先,为考察各维度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是否显著,我们用 SPSS23.0

分析模块下的“比较均值”,选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性别差异的显著性状况,分析结果表明,内在效能感 t 检验的 sig 值为 0.000,说明内在效能感中的性别差异高度显著,外在效能感 t 检验的 sig 值为 0.005,说明外在效能感中的性别差异也是高度显著的(sig 值小于 0.05 时显著,小于 0.01 时高度显著)。其次,为明确两性在政治效能感各维度中的差值大小,我们给出描述统计的结果,具体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表 3 内在效能感中的性别差异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男	5153	2.8627	0.82937
女	5485	2.5364	0.77990

表 4 外在效能感中的性别差异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男	5153	2.6225	0.77443
女	5485	2.5635	0.74621

注:为便利后文的统计分析,我们调整了 CGSS2010 中询问受访对象政治效能感的提问方式,同时采用反向计分的方式更改相应数据的值标签,这样,在表 3 和表 4 中,无论是对内在效能感还是对外在效能感而言,得分越高表明效能感越高。

由上述表格呈现的内容可知,男性在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中的状况都比女性好,并且,内在效能感在较大程度上高于女性,而外在效能感中的性别差值则比内在效能感的性别差值要小。

五、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对女性参政现状的解释

(一)变量选取与描述

我们已运用 CGSS2010 的数据说明,当前,中

国大陆女性居民存在政治参与相对不足的现状,并且,女性在内在和外在效能感得分上均不及男性,那么,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能解释女性的参政现状吗? 下面我们用 CGSS2010 的相关变量与数据检验这一问题。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及相关文献,本文实证分析中的被解释变量共有 8 个,涉及大陆居民在地方层面的“基层选举”“依法抗争”和“社区参与”行为,解释变量包括: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政治面貌、最高受教育程度以及民族和宗教信仰,由于我们实证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性别通过影响政治效能感进而影响政治参与,因而将性别设置为调节变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二)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1. 估计结果。由于政治参与是二分变量(“参与”和“未参与”),因此我们构建二元 Logit

表 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定义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是否参加基层选举	是 = “1”, 否 = “0”	0	1	0.48	0.500
是否集体上访	是 = “1”, 否 = “0”	0	1	0.01	0.109
是否写联名信	是 = “1”, 否 = “0”	0	1	0.01	0.085
向媒体反映问题	是 = “1”, 否 = “0”	0	1	0.03	0.169
向政府反映问题	是 = “1”, 否 = “0”	0	1	0.03	0.169
参加抗议或请愿	是 = “1”, 否 = “0”	0	1	0.01	0.085
参加村/居/业委会工作	是 = “1”, 否 = “0”	0	1	0.09	0.285
向村/居/业委会提意见	是 = “1”, 否 = “0”	0	1	0.14	0.343
解释变量					
内在政治效能感	“完全不同意” = 1, “比较不同意” = 2, “无所谓” = 3, “比较同意” = 4, “完全同意” = 5	1	5	2.60	1.172
外在政治效能感	“完全不同意” = 1, “比较不同意” = 2, “无所谓” = 3, “比较同意” = 4, “完全同意” = 5	1	5	2.72	1.053
最高受教育程度	大学及以上 = “1”, 其他 = “0”	0	1	0.04	0.190
民族	汉族 = “1”, 其他 = “0”	0	1	0.91	0.286
宗教信仰	不信教 = “1”, 其他 = “0”	0	1	0.88	0.331
调节变量					
性别	男 = “1”, 女 = “0”	0	1	0.48	0.500

回归模型验证我们的研究假设。对于每一种政治参与形式,我们都运用嵌套模型的方式构建两重回归模型,第一重回归模型(模型1)控制政治效能感,第二重回归模型(模型2)将政治效能感纳入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政治参与的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

变量	基层选举 Logit 模型 回归 1 回归 2	集体上访 Logit 模型 回归 1 回归 2	写联名信 Logit 模型 回归 1 回归 2	参加抗议 Logit 模型 回归 1 回归 2	向政府 反映问题 Logit 模型 回归 1 回归 2	向媒体 反映问题 Logit 模型 回归 1 回归 2	提意见 Logit 模型 回归 1 回归 2	参加工作 Logit 模型 回归 1 回归 2
调节变量								
性别	0.207***	0.413**	0.250*	0.292**	0.110*	0.110*	0.260***	0.220**
	0.263***	0.319*	0.116*	0.171**	0.265*	0.265*	0.181***	0.148*
特征变量								
政治面貌	-0.001	0.121	0.568*	0.173	0.799**	0.799**	0.916***	1.129*
	0.068	-0.033	0.337	-0.077	0.600**	0.600**	0.724**	0.937**
教育程度	-0.706***	0.480	0.178	-1.135	0.597**	0.597**	0.007	-0.095
	-0.631***	-0.390	0.006	-1.301	0.462**	0.462**	-0.105	0.193
民族	-0.207***	-0.283	0.550	0.078	0.002	0.002	-0.213**	-0.525*
	-0.258***	0.470	0.558	0.101	0.007	0.007	-0.186*	0.487
宗教信仰	-0.063	-0.254	-0.638*	-0.646**	-0.349*	-0.349*	-0.179**	-0.142
	-0.059	-0.289	-0.655**	-0.657**	-0.362*	-0.362*	-0.189**	0.149
解释变量								
内在效能感	—	—	—	—	—	—	—	
	0.230***	0.366**	0.505***	0.438***	0.410**	0.410**	0.294**	0.245**
外在效能感	—	—	—	—	—	—	—	
	0.162***	0.190*	0.179	0.150	0.087	0.087	0.144***	0.239**
P 值	0.000	0.000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1)“提意见或建议”指的是向村委/居委/业委会提意见或建议,“参加工作”指的是参加村委/居委/业委会工作;(2)在各自变量中,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类,政治面貌以“党员”、教育程度以“大学及以上”、民族以“汉族”、宗教信仰以“不信教”为参照类;(3)*、**、***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2. 结果分析。由表6可知,个体的性别、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和政治效能感特别是内在效能感均是显著影响个体政治参与的变量,在将政治效能感纳入回归模型(回归2)之后,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对于个体是否参与政治行为之影响的显著性发生了变化,而性别对于表中所示所有类型政治参与的显著影响均未消失,这表明,同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等解释变量相比,性别是更为持续地影响个体政治参与行为的指标。此外,虽然不同维度的政治效能感对于不同类型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由表6可知,同性别类似,政治效能感也是显著影响个体政治参与行为的变量。为进一步验证性别是否通过影响政治效能感进而导致男女两性政治参与水平的不同,我们需分析性别与政治效能感的交互效用,性别与效能感的交互效用模型如表7所示。

表7 性别与效能感的交互效用模型

变量	基层选举 Logit 模型	集体上访 Logit 模型	写联名信 Logit 模型	参加抗议 Logit 模型	向政府 反映问题 Logit 模型	向媒体 反映问题 Logit 模型	提意见 Logit 模型	参加工作 Logit 模型
性别	0.210 **	0.394 **	0.257 **	0.330 **	0.582 **	0.582 **	0.491 **	0.324 **
内在效能感	0.223 **	0.224 **	0.438 **	0.404 **	0.140	0.140	0.441 ***	0.424 ***
外在效能感	0.140 ***	0.222 **	0.144	0.337	0.445 **	0.445 **	0.174 ***	0.250 ***
性别 * 内在效能感	0.034	0.206 **	0.168 *	0.432 **	0.094	0.094	0.006	0.054
性别 * 外在效能感	0.105 **	0.045	0.047	0.032	0.136 *	0.136 *	0.108 *	0.145 *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由性别与政治效能感的交互效用模型可知,性别与效能感的交互项在各模型的估计结果中都对个体参与政治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不同维度政治效能感与性别的交互项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而言,性别与内在效能感的交互项主要对是否参加集体上访、写联名信以及抗议或请愿产生显著影响;性别与外在效能感的交互项主要对是否参加基层选举、是否向政府相关部门、向媒体反映有关小区的问题,以及是否向村委/居委/业委会提意见或建议和参加其工作产生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我们的假设——“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男女两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别”得到性别与效能感交互效用模型的支持。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有关当前中国大陆女性居民的政治参与及其政治效能感,我们可以得出的研究结论有:

- 1. 在地方层面的政治参与中,大陆女性居民均存在同男性相比较而言的相对不足状况。
- 2. 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是显著的,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大陆女性居民在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测量得分上不及男性。也就是说,一方面,大陆女性居民在整体上对自身理解和参与政治之能力的感知不及男性,另一方面,女性居民对于政府回应公民需求的评价与感知不及男性乐观。
- 3. 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在整体上有助于

解释女性在政治参与活动中的相对不足现状。由我们构建的嵌套模型和性别与效能感的交互效用模型可知,女性较低的内在政治效能感主要解释其在集体上访、写联名信以及参加抗议或请愿这一类政治行为中相对不足的参与状况,女性较低的外在效能感主要是解释其在参加基层选举和向政府相关部门、向媒体反映有关小区的问题,以及向村委/居委/业委会提意见或建议和参加其工作中相对不足的参与现状。

(二)进一步的讨论

前文的分析证实:当前,中国大陆女性居民较低的政治效能感对于女性相对不足的政治参与状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此,本文对于如何改善女性居民的民主政治参与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发性思考。政治效能感虽然并非公民政治参与的决定性因素,但因其“被公认为是一种相对稳定持久的主观政治态度”^[12],不少学者主张(既有相关研究成果也证实),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决定是否积极参与政治的较有预测力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我们只证实,女性较低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解释女性相对不足的政治参与状况,但我们没有就不同维度的政治效能感(内在/外在)影响女性政治参与的方向(正向、负向)或程度(强、弱)展开具体探究,这是后续研究应该加以具体说明的内容。其次,本文分析所用的调查提问及数据来自 CGSS2010,而这项调查并非有关大陆居民政治效能感的专门调查,这就限制了我们深入了解居民,特别是大

陆女性居民政治效能感状况及政治效能感对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微观考察。

注释:

① 致谢: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为
本研究提供的数据支持。

参考文献:

[1] 夏书章. 中国梦与社会性别平等[J]. 中国行政管理,2014,(4):6-10.
[2] 佟新. 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
[3] 杨根乔. 论当前我国妇女参政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4):67-70.
[4] 吕庆春. 资源贫乏与政治贫困状态下的政治参与[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6):130-134.
[5] 董美珍. 论女性政治参与能力建构[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1):12-17.

[6] 陈丽琴,卓慧萍. 社会资本获得的性别差异与女性参政[J]. 江西社会科学,2010,(2):199-202.
[7] 师风莲. 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研究[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109.
[8] 孙晨光,刘茜. 城市女性居民的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0):36-43.
[9] Sidney Verba, Nancy Burns. *Knowing and Caring about Politics: Gender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J]. *Journal of Politics*, 1997,(4):1051-1072.
[10] Angus Campbell, Gurin Gerald, Warren E.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4,(6):171-172.
[11] 熊光清. 政治效能感: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进展[J]. 学习与探索,2015,(12):41-47.
[12] 谢秋山,陈世香. 政治效能感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3):88-113.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Efficacy and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XU Chao, WANG Xiao-fa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GSS2010 and the two – dimensional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Political Efficacy,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d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analyzed factors that caused their participation conditions. Statistical analyses suggested that women scored lower than men both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icacy; as for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women involved les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elections at the grass – root level, rightful resistanc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Binary regression and interaction mode based on gender made clear another research conclusion, that is: when other typical effect factor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ere controlled, gender differences in efficacy did help explaining why there is a persistent discrepancy between sexes in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efficacy; internal/external efficacy;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gender differences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

“90 后”女大学生干部的人格特质研究

侯典牧

(中华女子学院,北京 100101)

摘 要:对 1015 名“90 后”在校女大学生进行人格测量,通过对比女大学生干部与普通女生在 16 种人格特质上的差异后发现:女大学生干部在乐群性、恃强性(影响性)、兴奋性(活泼性)、有恒性、敢为性等特质上显著高于普通女生;在忧虑性、独立性等特质上显著低于普通女生。女大学生干部在外向、心理健康、专业成就三种二阶特质上显著高于普通女生,在焦虑性上显著低于普通女生。

关键词:“90 后”;女大学生;人格特质;女性领导力;16 种人格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26-05

一、问题的提出

人格(personality)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迄今为止心理学还没有就人格的定义达成一致的结论。广义的人格是指个体所具有的所有品质、特性和行为等个别差异的总和,这种差异加上身体特征使得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是包括能力、兴趣、态度、气质和思维、情感在内等行为差异的混合体,是个体典型且相当恒定的行为模式^[1]。人格特质理论认为人格是指个体的内部特质,这些内部的特质因素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是行为的原因。所谓特质,是指个体拥有的、影响其行为的品质或特性,它们作为一般化、稳定而持久的行为倾向而起作用。特质被看作一种神经心理结构,使个体以相对一贯的方式对刺激作出反应。特质论并不是把人格分为绝对的类型,而是通常认为存在一些特质维度,每个人在这些特质上有不同的表现。而人之所以有差异,

就在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特质表现,形成不同的特质构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女性领导在组织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女性领导特质的研究将变得重要起来。我国学者李宁^[2](2013)根据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的人格理论,结合其长期的调研,归纳出我国女性领导的特质包括:首要特质——自信独立,自强清廉;核心特质——强而不悍,柔而不媚,重形象,爱家庭;次要特质——爱学习,处事灵活,精力充沛等。该研究用的是经验归纳法。如果用测量法就女性领导特质直接测量女性会更具有科学价值。目前对人格特质进行测量研究应用较多的是 Cattell 的 16PF 量表。

目前在校大学生基本都是“90 后”,在校女大学生干部将是未来国家的后备干部的主力。因此,本研究采用对在校女大学生进行人格测量的方法,通过对女大学生干部和普通女生的人格特质进行对

收稿日期:2017-07-10

基金项目:中华女子学院校级跨学科研究培育项目“女性领导特质与女性领导对于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项目编号:007-1100160104)

作者简介:侯典牧(1969—),男,中华女子学院教务处处长,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女大学生创业就业、女性领导力研究。

比分析,来探究中国女性后备人才的领导特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研究主要针对中华女子学院 2010 级全体女同学 1015 人,她们属于“90 后”。研究对象分为两组,由各班班长、团支部书记组成学生干部组,共 63 人,其他为普通学生组,共 952 人,对两组进行对比研究。本研究之所以选择班长和团支书为学生干部组,是因为她们在毕业时大部分会成为预备党员,成为我党未来的后备干

部。另外,该数据是在大二初期收集的,之所以没有收集学生会干部,是由于大二初期的大学生一般还没有在学生会任要职。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对中华女子学院在校女大学生进行 16 种人格特质量表测试,并对各维度原始得分进行统计。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讨论

(一)16 种特质描述统计分析与显著性检验 (见表 1)

表 1 两组学生 16 种特质描述统计与独立样本统计显著性 t 检验

	类型	N	均值	标准差	t
乐群性	学生干部	63	6.78	1.745	3.618***
	普通学生	952	5.93	1.813	
聪慧性	学生干部	63	6.19	1.683	1.260
	普通学生	952	5.91	1.688	
稳定性	学生干部	63	6.43	1.633	1.602
	普通学生	952	6.05	1.847	
恃强性(影响性)	学生干部	63	5.78	1.782	3.736***
	普通学生	952	4.94	1.715	
兴奋性(活泼性)	学生干部	63	6.52	1.469	4.009***
	普通学生	952	5.72	1.545	
有恒性	学生干部	63	6.29	1.870	2.163*
	普通学生	952	5.82	1.650	
敢为性	学生干部	63	7.33	1.934	5.765***
	普通学生	952	5.91	1.895	
敏感性	学生干部	63	5.98	1.818	1.146
	普通学生	952	5.74	1.592	
怀疑性	学生干部	63	4.40	1.454	0.249
	普通学生	952	4.34	1.626	
幻想性	学生干部	63	5.68	1.268	-0.173
	普通学生	952	5.72	1.520	
世故性	学生干部	63	5.13	1.561	0.532
	普通学生	952	5.03	1.464	
忧虑性	学生干部	63	4.63	1.753	-2.542*
	普通学生	952	5.21	1.731	
实验性(变革性)	学生干部	63	4.62	1.475	-0.223
	普通学生	952	4.66	1.471	

续表

	类型	N	均值	标准差	t
独立性	学生干部	63	4.17	1.530	-2.033 *
	普通学生	952	4.58	1.524	
自律性	学生干部	63	5.89	1.309	1.015
	普通学生	952	5.69	1.501	
紧张性	学生干部	63	5.44	1.758	-1.142
	普通学生	952	5.70	1.707	
	普通学生	952	22.70	3.556	

注：* p<0.05, * * p<0.01, * * * p<0.001(下同)。

由表 1 可知,根据独立样本的统计显著性 t 检验,女大学生干部与普通女生在乐群性、恃强性(影响性)、兴奋性(活泼性)、有恒性、敢为性、忧虑性、独立性 7 项特质上差异显著,其中“忧虑性”“独立性”特质,女大学生干部显著低于普通女生,其他 5 个特质女大学生干部都显著高于普通女生。

高乐群性通常表现为和蔼可亲,容易与人相处,喜欢和别人共同工作,参加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不斤斤计较,容易接受别人的批评,对他人的关注程度高于平均水平,并且很容易与他人交往,待人十分热情。由表 1 可知,女大学生干部在乐群性上与普通女生有显著差异,其乐群性明显高于普通女生。其原因主要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工作职务的需要,工作的开展和顺利完成离不开团体的协作,团体的齐心协力对工作的顺利进行是非常重要的。女大学生干部较普通女生更具乐群性,通过与其他人的接触开展工作,那么高乐群性必是其赢得并胜任其岗位的重要特质。第二,高乐群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喜欢参加和组织各种班级和社团活动,这可以反映出女大学生干部较普通女大学生有较高的组织领导能力。第三,女大学生干部对他人的关注程度高于平均水平,她们容易接受批评,这反映出女大学生干部思维较细腻,虚心,容易与他人打成一片。第四,女性的领导管理趋向于母性管理,她们多采用民主型的领导方式,此种领导方式容易为人所接受,从而提高领导者的管理效率。从这几点来看,高乐群性是女大学生干部所具有的领导特质,也是与普通女生不同的地方。

兴奋性高者通常活泼、愉快、健谈,对人对事热情,浑身上下充满激情和活力,但有时也可能会冲动,以致其行为变幻莫测。兴奋性高者往往精力充沛,女大学生干部除了搞好自己的学习外,还肩负管理班级、对班级活动进行组织协调的责任,这就要求她们要具有高于普通女生的精力,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更好地胜任自己的工作。另外,兴奋性高的人,也容易对他人产生影响。这一点与张宁(2013)的研究基本是一致的^[2]。

高恃强性通常表现为好强、独立积极、自信,喜欢去影响他人。由表 1 可见,女大学生干部较普通女生恃强性高,在生活中其行为可能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她们对自己的主张坚持到底,不轻易妥协,这从一定层面反映出其自身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和责任感,这也是未来做好领导的重要特质。第二,这有利于她们在集体中树立威信,只有树立领导的威信,才能驾驭不及她的人和反抗权势者。第三,她们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喜欢去影响他人,获得他人的追随和肯定。

有恒性高者通常表现为坚持、负责,做事尽职,细心周到,有始有终,所结交的朋友多是努力苦干的人。有恒性是做领导的非常重要的素质,领导要经常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任务 and 有待完成的中长期目标,高有恒性的特质会使其做事有始有终、尽职尽责。

敢为性高者通常表现为冒险敢为,少有顾忌,不掩饰,不畏缩,有敢作敢为的精神,能经历艰辛并保持刚毅的一面。高敢为性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其价值主要在于:第一,其善于利用直觉,抓住机遇,决策果断;第二,其有着超强的自信,

勇于付诸实践;第三,其不怕风险,敢于承担风险,且善于规避不必要的风险;第四,领导经常会面临一些紧迫性的任务,需要其迅速作出决策,并付诸实践。

独立性低者表现为依赖,随群附和,喜欢与别人一起工作和决定问题,喜欢寻求社会鼓励。独立性高者习惯于我行我素,不依赖他人,也无意支配或控制别人。女大学生干部在独立性特质上得分显著低于普通女生,因为相对低的独立性使其行为方式更容易赢得同学们的支持,那些高独立性者往往行为孤傲,不太喜欢和别人一起

工作,这就难以在干部推选中赢得同学的支持,也不利于其融入群体之中。另外,女大学生干部独立性特质低于普通女生,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女生干部乐群性特质高于普通女生的合理性。

在忧虑性特质上,女学生干部显著低于普通女生。忧虑性从情绪上看属于消极情绪,是大家不愿看到的,一般人希望干部要阳光有活力,还要有一定的抗打击能力。

(二)8种二阶因子的描述统计与独立样本统计显著性t检验(见表2)

表2 两组学生8种二阶因子的描述统计与独立样本统计显著性t检验

	类型	N	均值	标准差	t
适应与焦虑型	学生干部	63	4.660	1.7554	-2.367*
	普通学生	952	5.204	1.7658	
内向与外向型	学生干部	63	7.430	1.9098	5.995***
	普通学生	952	5.896	1.9709	
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型	学生干部	63	5.033	1.5968	-0.262
	普通学生	952	5.086	1.5465	
怯懦与果断型	学生干部	63	4.243	1.2921	-1.129
	普通学生	952	4.446	1.3903	
心理健康因素	学生干部	63	24.87	4.989	3.036**
	普通学生	952	22.86	5.104	
专业成就因素	学生干部	63	56.90	9.074	2.199*
	普通学生	952	54.32	9.039	
创造能力因素	学生干部	63	79.38	8.458	-0.954
	普通学生	952	80.38	8.060	
环境适应因素	学生干部	63	22.84	3.690	0.299
	普通学生	952	22.70	3.556	

由表2可知,在8种二阶因子中,根据独立样本的统计显著性t检验,女大学生干部与普通女生在适应与焦虑、内向与外向、心理健康、专业成就4种特质上差异显著。女学生干部在外向、心理健康、专业成就上显著高于普通女生;在焦虑性上显著低于普通女生。

适应与焦虑高分者通常易于激动、焦虑,对自己的境遇常常感到不满意。女学生干部在焦虑性上显著低于普通女生,反过来说就是女学生干部在适应性方面显著高于普通女生。可以这样解释,女学生干部所处的领导环境多是复杂多

变的,这就要求女学生干部必须具备超强的适应性和抗压能力,根据环境的变化采取适应性的应对方式,处变不惊,因此女学生干部较普通女生需要具备较高的适应性、较低的焦虑性。

外向高分者通常善于交际、开朗、不拘小节。女学生干部在外向特质上显著高于普通女生,说明女学生干部多是外向的,她们积极向上,对于生活和工作充满活力和激情,这也是其自身的性格和工作的需要。班干部多是采取民主投票的形式推选出的,外向热情的候选人易于得到大家的支持。另外,领导需要较高的沟通能力,外向

特质的人会主动和别人沟通,这可为其管理工作的开展和顺利完成奠定基础。

女学生干部在心理健康方面显著高于普通女生。健康积极乐观能吸引和感染周围的人,赢得他们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乐观的领导者能给大家带来希望,因此乐观的领导者更具影响力。塞利格曼领导的研究小组选取了从1900年到1984年以来的22次美国总统选举,研究发现美国人选了乐观的候选人18次。在所有选举中,那些原本不被看好的后来居上者,都是比较乐观的候选人。在班干部的选拔过程中大家也会选一个健康乐观的人,换句话说,健康乐观的学生更容易被大家推选为班干部。

16种人格特质大学生版的专业成就特质,其实质是成就动机,专业成就高者一般成就动机高,易有所成就。调查显示,女学生干部在专业成就特质上显著高于普通女生。高校班级学生干部,在推选过程中,对参选者有一定的要求,除了要求候选者性格外向、善于沟通、团结同学、阳光、充满活力外,还要求其比较向上,有追求和抱负。另外,女学生干部之所以去竞选学生干部,也因为其具有比较高的成就动机。根据成就动机理论,领导者要有较高的权利动机和成就动机。

四、结论

第一,女班干部在乐群性、恃强性(影响性)、兴奋性(活泼性)、有恒性、敢为性等特质上显著高于普通女生;在忧虑性、独立性等特质上显著低于普通女生。她们大多性格活泼好动,积极向上,充满活力,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和自信,抗打击能力强。

第二,女班干部在外向、心理健康、专业成就3种二阶特质上显著高于普通女生,在焦虑性上显著低于普通女生。

因为大学的学生班干部都是大家民主投票选拔出来的,具有这些人格特质的人更容易获得同学们的认可。本研究所选择的班长和团支书为学生干部组,一般班级中的班长和团支书毕业时大部分会成为预备党员,成为我党未来的干部,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对于未来我党选拔“90后”女性后备干部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张厚桢.实用心理评估[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179-181.
- [2] 张宁.女性领导特质与事业发展[J].新视野,2013,(6):111-114.

Study on the Personality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 Leadership of the Post-90s

HOU Dian-mu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method of personality measurement on 1015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of the post-90s, this study find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 leadership and general students in 16 types of personal features. First, female college student cadres are more social, dominating, active, persevere and brave than other students. Second, they are less depressed and dependent than others. Third, compared with other students, female student carders are more extrovert, psychologically healthier and achieving higher in career, and besides, they are less worried than others.

Key words: post-90s;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trait; 16PF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女性学建设专题研究 ·

妇女/性别学科建设刍议

——以首批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为中心的考察^①

王 晶, 李乾坤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2006 年至 2016 年的妇女/性别研究以基地为依托, 学科建制有序推进,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无固定专职人员、无经费、无场地的落后状况; 妇女/性别学术研究日益精进, 成果丰硕, 开始影响、推进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 社会性别教育与培训、社会服务初见成效, 其行政合法性、学术影响力、社会认可度逐步上升。但仍存在基地机构建制变动不居、经费来源少且不稳定、主攻方向不凸显等阻碍妇女/性别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问題, 亟需借鉴国内外的有益经验探讨突破这些发展瓶颈的策略, 以推动妇女/性别学科深入发展。

关键词:高校; 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学科建制; 主流化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31-06

妇女学是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产物, 女性学可以说是妇女学中国化的产物, 而妇女/性别学则是在全国妇联授予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成立后使妇女学抑或女性学进一步学科主流化和学术化的产物。因此, 回顾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 10 年来在促进妇女/性别学科主流化中的成就与努力, 总结经验与不足, 对于进一步促进妇女/性别学科建设将大有裨益。

一、妇女/性别学科建设研究述评

关于妇女/性别学科建设的研究, 学界已有不少成果, 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对妇女/性别学科理论的探讨。丁娟、彭珮云、谭琳等认为应

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和基础理论优先的原则”^[1],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新实践不断推动理论创新”^[2]; 魏国英、杨永忠等认为“女性学学科建设要增强理论的原创意识, 走‘综合创新’之路”^[3], “注重跨学科领域中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学习”^[4]。二是对妇女/性别学科价值及意义的探讨。李慧英、杜芳琴、畅引婷等探讨了高校妇女研究组织在“妇女理论研究队伍的形成与研究方式的转变”“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 加强学术横向联系”“提高妇女素质与生活质量”^[5]与“社会性别学学科和课程建设的使命”^[6]等方面的作用和使命。三是对妇女/

收稿日期: 2017-07-01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妇联工作的创新发展研究——以吉林省妇联为例”(项目编号: 2017A6)

作者简介: 王晶(1963—), 女,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东北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从事妇女/性别问题研究; 李乾坤(1986—), 男,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妇女/性别问题研究。

性别研究学科化历程的回顾和评述。祝平燕、罗婷认为中国妇女学经历了“注重女性特色教育和引入社会性别理论两个阶段”^[7]；孙晓梅、仪纓、杜芳琴等梳理了高校妇女研究组织“从拥有‘三无’编制的女性研究虚体学术机构到实体机构”^[8]的曲折发展历程、各自特色及其本土化发展。四是对妇女/性别学科建设面临问题的研究。学者们认为，这一阶段高校妇女研究组织面临着“机构设立不统一”“管理松散”“普遍存在着无固定专职人员、无经费、无场地的状况”^[9]，“妇女研究落后于妇女发展和妇女需求，不能引起妇女和社会的强烈共鸣”，“尚未建构起自身的理论和方法，难以进入学科主流”^[10]，“还不能充分地影响政府决策与社会各界”^[5]，“投入政策不足”^{[11][8]}，“主流学科阻力”^[12]等挑战。五是对妇女/性别学科发展策略的探讨。学者们认为应从“立足现实，开发传统”^[11]，加强“妇女/性别学科理论建设与实践的结合”^[7]，“进行知识的批判、重建和传承，实现妇女学学术的合法化”^[13]，“以机构和机制创新实现妇女学的行政合法化”^{[13][14]}，“以良好的学术信誉与服务社会取得妇女学的社会合法化”^{[13][15]}。

综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妇女/性别学科理论、知识批判与建构、课程建设、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等学科制度层面的探讨较多，且研究成果发表时间大多在基地成立之前，而对基地成立后关于妇女/性别学科建设的新成就与新问题关注比较少，缺少从学科建制层面探讨学科建设的发展与问题。学科建设是个综合系统，它涵盖了教学、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图书资料设备、社会服务平台基地建设等一系列硬件和软件建设。尽管现有研究指出的妇女/性别学科建设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宏观性的建设对策仍然有效，但是，伴随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建设的发展壮大，我们还亟需在总结首批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10年建设成就经验的基础上对该学科建设给予再思考，全面总结基地在促进妇女/性别学科建设上的作用，并针对基地建设学科发展的困惑，接续探讨有助于学科发展的对策，以助推妇女/性

别研究的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

二、妇女/性别研究行政合法性的增强

正如学者杜芳琴所说：“在中国的语境，妇女学主流化和可持续的真正动力在于学校的内部建制、机制创新，然后（或同时）被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目前，行政合法化比学术合法化更要紧迫。”^[13]首批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建成之前，高校系统的妇女研究机构一般都是自发性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行政合法性较弱，其“人员一般为兼职的，研究经费或主管部门拨款或自筹”^[10]，受权威性人物和重要活动的影响较大。在一些高校的妇女研究中心，在‘95世妇会妇女运动热潮后，“一部分教员离开了女性研究，回到本专业教学与研究中去，这也影响了妇女研究在高校系统的进一步发展”^[9]，甚至一度诱发其组织危机。

自从2006年6月全国妇联首次与高校合作建设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以来，妇女/性别研究机构的行政合法性骤然上升，引起了合作高校及相关行政部门的重视与支持，之前机构建制“三无”的状况大为改观。例如东北师范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成立后，学校增加了编制，基地设一个专职副处级行政副主任和1个兼职副主任，两名兼职秘书长，中心主任由学校党委副书记兼任并由挂靠院属机构重新归属校管研究机构，截至目前已有3任校级领导兼任，有效调动了学校各部门资源支持妇女/性别学科建设。2016年，该校基地机构体系进一步完善，增设了科研部、课程部、培训部3个职能部门。此外，由学校领导兼任基地主任的还有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湖南女子学院等。厦门大学基地设立了教学部、学术部、培训部、交流合作部、信息部和社会实践部6个部门协同推进基地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在基地之下组建了8个研究中心，创新了基地组织模式。建成后的基地接受全国妇联的业务指导，改变了之前“各自为战搞研究与教学，缺少宏观的统一指导”^[9]的被动局面。10年来，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自发轮流组织召开了8届基地与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每年的妇女学年会也

设基地建设专题论坛,分享交流基地建设经验,探讨学科建设的问题以及发展对策,助推基地发展。全国妇联还通过设立中国妇女研究个人奖、优秀组织奖激励基地建设,并通过组织专家进行定期评估督促基地的发展。总之,全国妇联对基地的领导力以及各基地组织机构的完善,为妇女/性别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妇女/性别研究的主流化提升

妇女/性别学与以反思批判主流传统学科并游离于主流学科群体之外,以一种超然状态使该学科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的西方妇女学有所不同,它一开始的存在就是为了改变这种边缘弱势状态,以增强妇女/性别学科的主流化和学术合法性。为此,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就如何促使该学科学术研究主流化作了很多努力。

第一,妇女/性别研究议题纳入了社会科学研究主流。基地成立以后,每年全国妇联通过基地征集有问题意识和有理论研究价值的妇女/性别研究议题纳入国家以及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比如“2006~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年累计批准立项的妇女/性别研究课题达86项(是1999~2004年6年立项总数的3.07倍),累计资助金额达635万元。”^[16]“2010~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批准立项妇女/性别研究课题147项,资助金额2442万元。”^[17]“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立项与妇女/性别研究直接相关的课题达43项,占今年全部立项课题的1.14%,比去年增加了0.43个百分点,增幅为历年最大”^[18];“2016年立项项目共42项,资助金额总计为840万元”^[19]。国家、教育部及大多数省市社科基金项目的持续资助有力地支持了全国各地的妇女/性别研究。如东北师范大学基地教师及其培养的博、硕士研究生共出版妇女/性别研究学术著作、教材18部;发表学术论文208篇,其中CSSCI刊物以上论文126篇;完成调研报告16篇。

第二,各高校为妇女/性别研究设立专项基金。厦门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的项目2013年被列入厦门大学繁荣计划中,并给予为期5年的专项经费的支持,每年投入30万用于基地

项目建设与实施。东北师范大学基地争取到基地建设资金,学校社科处设立了妇女/性别研究专项特色扶持项目。

第三,搭建妇女/性别多学科研究平台。厦门大学基地组织、规划、整合了校内分散的女性/性别研究力量,在基地之下组建了性别与文化文学研究中心、性别哲学研究中心、性别与教育研究中心、性别与政治研究中心、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性别与经济研究中心、性别与医学(健康)研究中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中心8个研究中心,将性别视角纳入多学科领域,促进了妇女/性别研究的繁荣。

第四,加强学术交流与研讨。基地成立以来,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韩国启明大学开展3校长期学术研讨活动,每一年半在其中一所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还与两岸四地部分高校建立了有关妇女/性别研究的长期稳定合作机制。东北师范大学举办了8次妇女/性别研究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策划并筹办了亚洲妇女学与亚洲国际传媒会议5次,成为亚洲妇女学中国参与的活跃成员,这些活动的开展使中国妇女/性别研究及基地的学术弱势地位有了较大改观。

总之,10年来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成为对内凝聚妇女/性别研究力量与资源、对外开展学习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催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动了本土化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声音开始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和倾听,一改此前“无声”和“被忽视”的状态。

四、妇女/性别教学的体制化发展

妇女/性别教学的体制化是其嵌入主流教育教学体系,培养本学科方向专业人才的重要举措,是妇女/性别学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校基地的建立加快了课程建设步伐,探索开设了许多新课程,扩大了高校性别课程的覆盖面和普及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本学科及跨学科方向学位点的设立,进一步融入了学科主流。

开展面向高校学生的社会性别教育,传播和培育先进的性别文化,推进性别平等进程既是高

校基地的职责所在,也是其重要的历史使命。可喜的是10年来拥有基地的高校性别课程建设实现了量和质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高校性别教育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如武汉大学基地开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视角”课程被列入“武汉大学创新课程建设项目”。东北师范大学基地在本科、硕士、博士3个层面开设了妇女/性别课程。课程性质有全校通识课、专业必选课、专业选修课、博士研究生方向课。全校通识课程由基地成立前的1门发展到5门,其中有1门面向全校研究生的“性别与教育”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有3门本科通识课程纳入学校教务处设立的核心课程建设项目中。本科专业必选课程和选修课程有6门,其中,在社会学院开设了“性别社会学”“婚姻家庭社会学”“女性社会工作”3门专业必选课程,妇女/性别研究一直被列为该学院学科建设特色方向;在多个院系还开设了多门性别视角的渗透课程。有些硕士点、博士点也开设了妇女/性别研究方向专业选修课程。中华女子学院作为女子院校的龙头从核心课程、基础课程、外围课程3个层面精心打造了41门性别课程,妇女/性别课程体系初步形成。此外,很多基地开设的妇女/性别课程诸如复旦大学的“视觉文化与社会性别”“性别与历史”享誉校园内外。在课程建设基础上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教材,诸如佟新的《社会性别研究导论》、韩贺南的《新编女性学》、叶文振的《女性学导论》等。

另外,学位点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如2006年教育部批准了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本科招生计划,实现了女性学全国首次本科招生;北京大学申报、教育部审查通过,北京大学设立了女性学硕士点,女性学成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硕士专业。云南民族大学首次将“性别社会学”列为社会学博士招生方向之一。东北师范大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党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专业招收性别研究方向博士生。2012年厦门大学获批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博士点,下设性别与公共管理、性别与语言文学、性别与法学、性别与教育学、性别与哲

学5个专业方向,这是国内首创,是妇女/性别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至此,涵盖各个学历层次的妇女/性别人才培养体系初步成形。

五、妇女/性别研究社会服务功能的提升

首批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的建立改变了此前高校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单纯的学术研究导向,积极关注并推进改善现阶段妇女发展的重大问题,积极参与社会服务,为相关群体提供专业性帮助,提升了其整体社会服务功能。

一是开展面向多元的性别意识培训服务社会。如厦门大学基地尝试在面向女干部、女职工的研修班和其他各类研修班中嵌入妇女/性别课程。南京师范大学基地成员不仅配合江苏省妇联儿童部到南京、扬州、无锡等市区县进行儿童防性侵等培训,还携3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自2012年起多次为南京外来工子女举办“青春期教育”的主题夏令营,社会影响广泛。北京大学10年间共举办妇联系统的针对妇女干部的各类培训项目30多个;中央民族大学在2014~2016年间与国家民委人事司、民族干部培训学院举办女专家科研工作与人才成长高级研修班,先后培训少数民族女性专家约150人。

二是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府各类与妇女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出台及相关政策的评估工作,积极助推社会性别平等。如北京大学基地的马忆南教授参与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的修改与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制定与北京市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制定。东北师范大学基地成员的《吉林省百村老年妇女生存状况调查分析》报告,为地方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了现实依据;“吉林省高层女性人才状况研究”课题研究报告为吉林省组织部出台女性高层人才管理办法实施方案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吉林省“女村官成长状况及发挥作用研究”项目成果转化成为2015年吉林省两会议案,基地还承接了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吉林省数据扩展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基地成员在2015年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交的关于“加大对公共场所设置母婴室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强公共政策建设,保障全面二孩政策

顺利实施”“调整产假制度,切实保障女性平等就业”等议案,受到广泛关注,《扬子晚报》还为此作了专题报道。湖南女子学院基地在《湖南省防拐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基础上草拟了《湖南省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为湖南省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度积极建言。

六、妇女/性别学科发展的困境与突破

妇女/性别学科毕竟是新成长起来的来自多学科领域的新兴交叉学科,发展历史比较短,没有从多学科领域独立出来,学科发展仍然面临困境。

首先,学科建制缺失。“所谓学科建制(也称学科外在制度)主要指大学内部机构层面的东西,如组织机构、行政编制、资金资助等。”^[14]由于妇女/性别学科的多学科性,缺少独立学科建制,因此组织机构不健全。目前,高校妇女/性别学科发展主要依托基地,虽然10年来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有力地推进了学科建制的发展,但由于基地没有统一的建制,多为非实体组织,挂靠在某一学院之下,而兼职教师属于不同的院系,使得基地人才队伍建设具有不稳定性,影响了基地的凝聚力,使大多数基地呈现“低迷徘徊”的发展状态,同时基地的经费来源不足,可持续发展令人堪忧。

其次,学科制度不够成熟。“所谓学科制度(也称学科内在制度),主要指学科规范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如特有的研究对象,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特有的概念体系),公认的专门术语和方法论,代表性的人物和经典著作等等。”^[14]虽然妇女/性别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用相同视角和理论以及话语方式分析问题,表明该研究领域的基本范式已经形成”^[20],但是,该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分散还不够整合,学科名称仍处于分化多元状态,妇女/性别研究对象、社会性别研究范式与多学科范式关系尚待梳理,学科范式仍处于多学科、跨学科状态,知识批判解构多于建构,新兴交叉学科生成不足,学科依附性强,独立性欠缺。

鉴于妇女/性别学科目前的发展现状,学科独立还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建设,凝聚整合

多学科妇女/性别研究与教学学术力量,成为当下妇女/性别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一是要加强与完善全国妇联、教育部和高校对基地的三级领导,三者为促进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及学科建设可持续发展而努力,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以及经费上的支持,有效调动校内校外资源,以增强新兴学科发展动力。二是充分发挥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功能,加强妇女/性别研究与知识生产,创新知识,同时健全与完善妇女/性别知识传承的教学体制,加大性别教育与性别意识的培训与普及,充分发挥高校基地培养具有先进性别意识人才的教育功能。

总之,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经过10年的发展,已成为推动妇女/性别学术研究、增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广社会性别教育、实施性别平等培训,提供具有性别意识的特殊社会服务的重要平台,增强了中国大陆妇女/性别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及其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力,成为践行、推进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战略重要阵地。因此,只有加强与巩固基地建设成就,才能建成一个有保障的妇女/性别研究学术平台,使之成为凝聚学术力量,生产新知识,传播先进性别意识,具有代代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学科增长点。

注释:

- ① 本文以2016年10月15日召开的“纪念全国高校首批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成立十周年暨第八届建设会议”的基地工作汇报材料为基本依据,重点考察首批高校基地的突破性发展及发展瓶颈,其他高校的女性/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和2013年新授牌的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但两者内外环境的相似度很高,希冀通过对前者的研究为后者提供一些鉴借,共同推进妇女/性别学科建设。

参考文献:

- [1] 丁娟.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维度与构建的思考[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1, (3): 1-6.
- [2] 谭琳.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J]. 妇女研究论丛, 2016, (4): 5-7.

- [3] 魏国英. 女性学学科定位及理论发展[J]. 妇女研究论丛, 2002, (3): 42-44.
- [4] 杨永忠, 周庆. 女性学的学科地位及其发展[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1, (4): 69-74.
- [5] 李慧英. 我国妇女研究机构的作用、问题和对策[J]. 妇女研究论丛, 1995, (3): 10-11.
- [6] 杜芳琴. “运命”与“使命”: 高校妇女研究中心的历程和前景[J]. 浙江学刊, 2000, (3): 90-94.
- [7] 罗婷, 胡桂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子院校妇女/性别学科建设回顾[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9, (1): 47-51.
- [8] 黄河. 女子院校女性学学科建设回顾[J]. 妇女研究论丛, 2008, (6): 30-34, 39.
- [9] 孙晓梅. 发展中的高校系统妇女研究机构[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1997, (4): 68-71.
- [10] 仪纓. 当代中国妇女研究组织初探[J]. 妇女研究论丛, 2000, (2): 34-38.
- [11] 魏国英. 我国女性学学科制度建设的进展与问题[J]. 中国高等教育, 2006, (24): 47-49.
- [12] 杜芳琴. 妇女学在中国高校: 研究、课程和机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5): 46-52.
- [13] 杜芳琴. 妇女学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1): 44-46.
- [14] 王珺. 学科制度视角下的“妇女学”[J]. 妇女研究论丛, 2005, (S1): 101-103.
- [15] 王金玲, 王平. 从意识觉醒到社会关照: 中国妇女学的发展(1995~2011)[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6): 46-55.
- [16] 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三届会员大会工作报告[EB/OL]. <http://www.cwrs.ac.cn>, 2014-04-12.
- [17] 中国妇女研究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工作报告[EB/OL]. <http://www.cwrs.ac.cn>, 2016-05-24.
- [18] 中国妇女研究会 2015 年工作总结和 2016 年工作思路[EB/OL]. <http://www.cwrs.ac.cn>, 2017-03-10.
- [19] 中国妇女研究会 2016 年工作总结和 2017 年工作思路[EB/OL]. <http://www.cwrs.ac.cn>, 2017-03-10.
- [20] 刘坚, 彭程. 社会性别: 媒介性别形象传播的一个分析范式[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 94-97.

On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Gender Research and Training Base in Universities

WANG Jing, LI Qian-ku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2006 ~ 2016), women/gender studies have been taking root in college women/gender research and training bases. Its institutional system is developing orderly, greatly changed the previous situation of lacking fixed full-time staff, money, or location; its women/gender academic research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ophisticated and fruitful, influencing and promoting the decision-making of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ts social gender education, training and social services have achieved initial success; their administrative legitimacy, academic influence and social recognition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However, some problems remain unsettled: the base institutions are unstable, the sources of funds are scarce,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major concern is not obvious, which have hinder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base. We need to draw on the useful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explore strategies to break through bottlenecks,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women/gender discipline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omen/gender research base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mainstreaming

(责任编辑 王 灵)

女性学研究方法刍议^①

于光君

(中华女子学院,北京 100101)

摘 要:女性学学科性质界定的不清晰是制约女性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关键,在进一步明确女性学的学科性质、女性学的研究对象、女性学的基本问题等女性学学科发展中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的基础上,要批判性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创新女性学研究方法,完善女性学研究方法体系;儒家文化的思维方法为女性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儒家文化的思维方式超越了现代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局限性,部分地解决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性别壁垒问题,实现了不同性别经验的一定层面的可通约性;女性学研究方法存在着历史和现实两个向度,这两个向度是统一的,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有性别意识的”人本主义的统一。

关键词:女性学;研究方法;对立性二分法;对话性二分法;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37-06

建立女性学学科是女性问题研究者们共同的学术追求,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目前女性学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女性学专业教学中给学生讲授的是社会学研究方法,女性学还没有从社会学中彻底独立出来成为与社会学不同的学科。女性学是否应该有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女性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笔者就女性学研究方法问题谈几点自己不太成熟的思考。

一、女性学学科性质界定的不清晰是制约女性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关键

研究方法具有学科工具性,它是服务于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确定相应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明确了,研究问题

清楚了,合适的研究方法也就确定了。相对于理论研究而言,女性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女性学理论的研究,女性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发展迟缓,与女性学学科性质界定不清晰有关。目前学术界对女性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学科,女性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女性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等关乎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尚未达成共识。由于在女性学的前学科化阶段,女性及女性问题作为一个论域引起了很多学科的关注,出现了多学科视角研究女性及女性问题的现象。在推动女性学学科化的过程中,必须对新兴的女性学学科给予一个定位,由于受女性学前学科化阶段思维惯性的影响,以及受对女性学作为一门新兴起学科比其他相近学科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涵盖性的

收稿日期:2017-07-02

作者简介:于光君(1969—),男,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副教授,博士,中华女子学院女子国学教育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学、女性学、传统文化研究。

学科特点进行表达的学术期盼的影响,把女性学界定为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的观点在女性问题研究领域普遍被接受,而且没有厘清女权主义与女性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把女性学学科等同于女权主义,认为女性学是女权主义逻辑上的延伸。对女性学学科性质以及对女性学与女权主义之间关系认识的不足限制了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如果把女性学界定为跨学科的学科的话,那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为女性学所用,女性学就可以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没有必要非得建立和发展女性学专门的研究方法了。另外,女性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这种表述也存在着逻辑问题。按照传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科分类,女性学学科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或者说,女性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人文性社会科学,尽管目前在教育部颁布的专业目录上,女性学是隶属于社会学的二级学科,女性学在学科范式上与社会学有相近之处,但是女性学不同于社会学,女性学的研究对象和女性学的基本问题有别于社会学。从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说,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逻辑前提和学科假定,经济学的逻辑前提是“经济人”假定,社会学的逻辑前提是“社会人”假定,而女性学的逻辑前提则是“有性别的社会人”假定。经典社会学家涂尔干由于确定了“社会事实”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且主张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事实”,使社会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涂尔干这一学术贡献为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至于女性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女性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可能不同的学者有自己不同的观点,但是女性学必须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明确女性学学科发展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这样才有利于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如果女性学就是女权主义的话,那么女权主义研究方法就是女性学研究方法,通过对传统相近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女权主义的批判改造就可以成为女性学研究方法。但是,女性学并不是

女权主义,对传统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借鉴可以丰富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内容,但不能成为女性学研究方法的主要内容,因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由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决定的。尽管女权主义的理念对女性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从学科范式的角度讲,女性学学科不同于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是一种思潮、运动,具有明显而强烈的价值预设,甚至把价值预设信仰化,女权主义的逻辑起点和逻辑假定是男女不平等,女性是“第二性”,其目的是为女性争权推动男女平等的实现。女权主义为女性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是它并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女性学作为一门学科,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关于社会学研究中坚持“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相统一的学术主张为女性学学科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女权主义是一种“主义”,而女性学是一门要研究“问题”的科学。另外,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讲,女权主义秉持“对立性二分法”的原则,把男性和女性对立起来,男性和女性似乎是不相容的,这种线性思维方式和中国社会生活中男女性别关系的事实是有距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秉持的“对话性二分法”^[1]原则更能反映社会生活中男女性别关系的真实情况,用阴阳之间的关系隐喻式地说明男女之间的关系,“男女有别”但不对立,男女之间阴阳互补,能够达致和谐的统一。女权主义过分强调女性的权利,而对女性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和所应履行的义务强调不够。同时女权主义又过分强调具有“女性”这种共同性别属性的女人们的共同利益,而忽视了具有“女性”这种共同属性的女人是处在具体的动态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她们在自己成长的历程中扮演着不同的性别角色,女人与女人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女权主义源自西方文化语境,女权主义的一些主张对于解决中国的女性问题和女性发展问题有些“水土不服”,女性学学科发展不仅要吸收女权主义的思想精华,还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

际,着眼于解决中国女性发展中的问题。所以明确了女性学的学科性质,明确了女性学的研究对象、女性学的基本问题等这些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就能为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根本性问题的解决和对这些问题达成共识还需要从事女性学研究的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二、儒家文化的思维方法为女性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

“五四”以来,由于受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中国的落后和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都归因于儒家文化。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制与儒家文化具有同构性,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儒家文化是父权制文化的代表,是一种压制女性的文化,女性学的学科发展与批判儒家文化在逻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对儒家文化的误读排斥了女性学研究方法对儒家文化思维方法的吸取。而对儒家文化的误读源于对原始儒家与政治化儒家的混淆,因此我们应该吸收原始儒家的思想精华和方法论中的精华,批判政治化儒家的糟粕。儒家文化是非性别歧视主义的文化,儒家文化坚持以人为本,在方法论上,儒家文化秉持一种“主体间性”的方法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对方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且儒家也坚持“男女有别”这种最素朴的性别观,认识到男女之间的差异。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层面上有两种基本的方法论,一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一是人文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秉持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研究对象视为客体,把研究对象“物”化,忽视了研究对象作为人所具有的心理、情感等主观因素,更没有把研究对象的性别作为一个维度进行考虑。人文主义方法论力图弥补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不足,人文主义方法论秉持主体间性的思维方式,把研究对象视为同研究者自己一样的人,解释性理解和理解性解释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传统的人文主义方法论缺乏自觉的性别视角,没有解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性别不同的时候如何跨越性别的界限进行

理解的问题,没有解决“男性经验”与“女性经验”如何通约的问题。儒家文化中基于“男女有别”素朴性别观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是一种有着自觉性别视角的思维方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P171)}这个“人”是有性别的具体的人,“仁者爱人”,这个“人”是没有性别差异的人。儒家文化分别从否定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肯定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个相反的方面着眼,解决互动过程中两个不同性别的主体之间如何跨越性别界限的鸿沟,相互理解的问题。一件事情,“己所不欲”的,也就是自己不愿去做的,对方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肯定也是“所不欲”的,不要违背自己的良知要求去做,这是“仁”的体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P178)}推己及人,立足于自己的经验理解对方的经验,在增进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增进互动对方的利益,在这个层面上“男性经验”和“女性经验”具有一定的可通约性。儒家文化的思维方式超越了现代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局限性,部分地解决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性别壁垒问题,实现了不同性别经验的一定层面的可通约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的思维方式能够为女性学研究方法提供有价值的资源。

三、女性学研究方法是两个向度的统一

女性学研究方法存在着历史和现实两个向度,这两个向度是统一的。在历史向度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超越近代以来关于女性问题的扭曲性建构,正本清源,还原事实。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社会解放思潮的推动下,中国知识界建构出了“压迫”与“解放”的语境,在“压迫”与“解放”的语境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妇女被认为是备受压迫的。为了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一是通过错位对比的方法得出中国文化落后的结论,正如杜维明先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一书的“导言”中所言,“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人又是现代文明大国中集体记忆遗忘、健忘、淡忘、主动忘却和被彻底扭曲最为严重的群体。为救亡图存的

爱国激情所驱动的‘五四’先进分子,主动自觉地采取了以儒家的糟粕和西方的精华决然二分的对比。既然儒家是小农经济、家族社会和专制政治的产物,其文化体现的形式必然是保守、落伍、封建和反动的。因此,中国的国民性可以用阿Q、祥林嫂、差不多先生,乃至随地吐痰、裹小脚、娶妾和抽鸦片为代表。西方的典范则是德先生、赛先生,乃至自由、人权、法治、理性和个人的尊严”^[3]。二是通过对经典文献断章取义式地解读以获取证据成了惯用的方法,而且以当时的价值观作为参照评判过去时代女性的生活,建构出受害女性的形象。“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是出自一种分析上的混淆,即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这种混淆的出现,是因缺乏某种历史的考察,即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考察其所处的世界^[4]。在坚持历史分析法的基础上,通过重新解读经典文献,正确认识历史上女性的生活状况,正确认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and 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截至目前,在女性研究领域仍然在沿袭将被断章取义了的经典文献中的话语作为证据,以证明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事实。例如,女性研究领域经常引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来证明儒家歧视女性,尤其是对不生育的女性的歧视。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式地解读,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到原文的语境中去理解的话,就会发现是我们为了批判的需要而扭曲了儒家的思想。该句原文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5]根据下一句可以推断,孟子所言“后”的本意是履行后代的角色,并非不生育后代的意思。“男尊女卑”也是经常被引用来批判中国传统社会歧视女性的证据,我们只是肤浅地按照现在的语意去理解并曲解了这句话的本意。南怀瑾认为,这句话并非指男的尊贵、女的卑贱的意思,而应该从“天尊地卑”的意思去理解“男尊女卑”。尊卑是两个对立的名词,但“尊”并不是指权力财富的尊贵,“卑”亦不是指下贱。“尊”是指古人对于宇宙不

可知的事会觉得伟大,这是“尊”的真意。而对于地,人们离不开地生活,和地的关系亲切,“卑”就意味着亲近^[6]。“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女性研究领域经常用这句话作为中国古代重视兄弟感情,而不尊重女性的证据,刻意曲解为妻子像衣服一样,可以随便换。其实如果把这句话放在原来的语境中,联系上下文去理解的话,便可发现问题所在。这句话完整的原话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敝,可再缝;手足折,难再续。”^[7]这本来是指兄弟感情与夫妻感情的差异,兄弟间如果伤了和气,就像断了手足一样难以复原,而夫妻间如果出现了矛盾,可以如同缝衣服那样再缝合起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也是被用来证明歧视女性的证据,其实这里的女子不是指所有的女性,而是有一定的特指,钱穆先生对此作了解读,认为此处女子、小人指家中仆妾言。妾视仆尤近,故女子在小人前。因其指仆妾,故称“养”。待之近,则狎而不逊;待之远,则怨恨必作。^[8]

女性学研究方法历史向度上的问题不彻底解决势必影响对现实向度问题的思考,我们习惯于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归因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实,经过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传统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大。在现实生活的向度上,女性学研究方法应避免男女不平等的价值预设,坚持“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相结合的原则,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上合理使用性别分析法。性别分析法是女性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具体方法,但是不能成为女性学研究方法中的基本方法。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关系只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根经纬线似的关系维度,一个具有“女性”这种性别属性的“女人”和具有“男性”这种性别属性的“男人”之间不只是性别关系这一种社会关系,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附加在性别关系之上的内容是异常丰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社会关系与性别关系混

合在一起,而且性别关系未必是这些社会关系中的主要关系。源自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性别分析法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非此即彼。所以在具体应用性别分析法的时候,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对源自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性别分析法的内容进行丰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维方法,把静态的“对立性二分法”发展为动态的“对话性二分法”。不同性别的人扮演着多重动态的社会角色,女性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分别扮演着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歧视女性,那么又如何解释中国的尊母传统和中国的孝文化呢,这是静态的“对立性二分法”所无法解决的。在应用性别分析法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避免男女不平等的价值预设,那样的话只会进入先有结论再进行研究的误区,使研究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另外,也不能夸大性别观念和性别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性别观念和性别关系是由具体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性别观念和性别关系对生活实践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是这种影响作用毕竟是第二位的。所以,在女性学研究实践中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四、建构女性学研究方法体系

女性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科,女性学研究方法是一个完备的方法体系,按照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女性学研究方法体系应该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的收集材料、分析材料的方法。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无法兼顾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与“人”的完整性之间的关系,实证主义方法论以自然科学的范式研究人和社会现象,把人和人和社会现象“物”化,抹杀了人之所以为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特征,实证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人文主义方法论强调不能为了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抹杀掉人的精神特征,作为研究者应该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人文主义方法论是典型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人文主义方法论

在批评实证主义方法论所具有的缺陷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缺陷,人文主义方法论难以达至实证主义那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女性学研究的方法论应该超越传统社会科学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对立,不能为了研究的科学性而抹杀掉人的精神特征,也不能为了理解人而不顾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女性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有性别意识的”人本主义的统一,坚持历史向度与现实向度的统一,在女性学研究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在研究方式和具体的收集资料与处理资料的方法方面,女性学研究方法可以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中的方法,但是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实地研究、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等研究方式以及每种研究方式所包含的收集资料与处理资料的方法都缺乏明确的性别视角,无法彰显女性的主体性,不完全适合女性学研究方法的要求。“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传统的认识论都一直把女性排除在‘知者’或者知识来源的可能性之外;他们认为科学一直都在为男性气质代言,历史仅仅从男性(或者是主流阶层与种族)的视角书写;传统社会学话语的叙述主体一直被看成是男性。这些女性主义者因而提出了另外一套知识理论,那就是使女性成为合法的知者。”^{[9](P20)}因此,可以对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中的这些研究方式以及每种研究方式所包含的收集资料与处理资料的方法进行女权主义式的批评、改造与创新,消除性别壁垒、性别隔阂,实现不同性别经验之间的通约,彰显女性的主体地位,在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中理解具有“女性”这种性别属性的“女人”的生活逻辑,借用女性经验理解所研究对象的问题。具体说来,可采取传统的研究方法+动态的对话性性别分析法+理解女性生活的逻辑这样的模式。另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为女性学研究方法创造性借用,比如,行动研究、叙事研究、口述史、网络分析法等。女性

学在自己学科发展过程中也会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女性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女性学研究方法也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女性学研究方法新在哪里?“新的实证和理论资源:女性的经验;社会科学的新目的:为了女性;新的研究主题问题:将研究者和研究问题同样置于需要分析反思的位置”^{[9](P21)}。所以,在进一步明确女性学的学科性质、女性学的研究对象、女性学的基本问题等女性学学科发展中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的基础上,要批判性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创新女性学研究方法,完善女性学研究方法体系,以促进女性学学科的发展。

注释:

① 感谢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馆长、原女性学系主任韩贺南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 杜维明. 体知儒学[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135.
- [2] 张燕婴,译注. 论语[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3] 杜维明. 二十一世纪的儒学[M]. 北京:中华书局, 2014. 3.
- [4] 高彦颐.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
- [5] 万丽华,蓝旭,译注. 孟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252.
- [6] 南怀瑾. 易经杂说[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104 - 105.
- [7] [明]朱用纯,等. 增广贤文[M].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 90.
- [8] 钱穆. 论语新解[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433.
- [9] 孙中欣,张莉莉.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On Research Methods of Women Studies

YU Guang-jun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lack of a clear definition of women's studies is a key problem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research methods. With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questions that must be answered in this area, such as the subject nature of women's studies, the subjects of women's studies and the basic problems of women's studies, we also critically draw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other subjects, innovate women's research methods,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women's research methods.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Confucian culture provided valuable resources for the research of women, and Confucianism went beyond the limitations of modern empiricism and humanism, partially solved the problems of methodology in terms of gender barriers, and finally reached a certain level of commensurability of different gender experience. There are dimensions of history and reality in women's study method, which are unified closely. It is also essential to insist on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gender-conscious" humanism.

Key words: women study; the research methods; dichotomies; the conversational dichotomy; Confucian culture

(责任编辑 王 灵)

· 性别视角下的萧红专题研究 ·

电影《萧红》意境叙事下的女性意识

丁 媛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摘 要:电影《萧红》多运用色彩语言来实现情境氛围的渲染和思想情绪的表达,用色彩的转换折射出女作家情感选择背后对传统夫权限制下的女性尊严的维护和争取。电影对“脚步”的特写在意指萧红永不停歇的人生旅程和始终不能安稳下来的情感经历的同时,也在以此暗示女作家为突破那个时代下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的两性关系对女性本身的束缚所作出的反抗。

关键词:萧红;意境;色彩;脚步;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J9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43-05

王观泉先生在《怀念萧红》中这样描述萧红拥有超然魅力的缘由:“文字的感觉之美是一点,大约稍稍一读就会被迷住;再就是她的身世让人同情,爱怜之余便更想看看她的作品。”萧红因文学的才情为人瞩目:“越轨的笔致”对生死“力透纸背”的书写体现出她丰盈敏感的心绪和杰出的文学才华;萧红也因坎坷的经历令人怜惜:短暂而颠沛的生命历程、富有传奇色彩的情感履历,以及她那令人扼腕叹息的生命结局。女作家的文学世界与精神家园相互关照、彼此阐释,半个多世纪以来吸引着无数探寻的目光,也留下了无尽被解读的空间。在萧红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霍建起执导,宋佳主演的传记电影《萧红》登陆院线,首次用光影交织的手段再现这位“30年代的文学洛神”美轮美奂的文学世界和透彻深邃的生命感悟。该片甫一上映就引起重重围观,且褒贬不一,堪称瑕瑜互见,虽已过数载,却依然喧嚣未泯,更在与之后《黄金时代》的比较中再次

成为焦点。

其实,用电影形式表现萧红,本身就不失为一次“艺术的冒险”,因为《萧红》作为纪传体影片,激烈的戏剧冲突和紧凑的情节安排势必要让位于对女作家内心世界的探幽和对其文学精神的表现。而后者所具有的难以用具体的“形”来描摹和展现的细腻、丰富的情感特性又令电影这一以再现性和具像感为基本特征的表达方式显得有些为难和力不从心。对此,素有“电影诗人”之称的导演霍建起延续了他一以贯之的“诗化”风格,采用色彩与光线为手段创造出富有意境的意境话语空间,让人物内心情感思绪的流动变幻去推动情节的发展,从而细腻而有层次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意识与情感的演变,使女作家那充满坎坷与不幸的黯淡人生,宽厚悯人的胸怀,深邃又温暖的内心,执着书写的充满苦难、抗争、生存、死亡、轻贱、尊严等主题的文学世界在光影流转中获得再现。影片以女作家多舛流离的情感

经历为线索,用追忆的方式,讲述了萧红的家世、逃婚、爱恋、婚姻、背叛,将一个屡经漂泊、灵魂寂寞、内心忧郁纤细、个性又坚强倔强的萧红呈现在观众面前,最终令观众透过那些浪漫唯美又不失凝重伤感的画面,在思绪千丝万缕的牵引下,在富有意味的镜语形式下,走进那个时代、走进孤独的萧红,与之一同悲伤欢喜,在光影流转里体味她留于世间的半部红楼。

一、色彩与光线中的情感流淌

“自古以来,视觉艺术家就用色彩作象征。色彩的象征意义大抵是文化传承的结果……”^{[1](P26)}与色彩关系最为紧密的艺术类型应该是绘画,“在绘画中,色彩是创作者为世界刻下的标记”^{[2](P34)},本身就包含着主体的内心世界的投射意味。看来,色彩之于视觉艺术具有天然的表意象征功能。而在电影中,“无论视像具有多少主观性,色彩就是世界的客观存在的标记”。“色彩不能接受绘画式的处理,而只能接受戏剧性和心理学的处理,如果有象征意义,象征也应当在具体事实的展现中找到自己的显见依据。”^{[2](P64)}也就是说,电影作为复制和传播的技术手段,对色彩仅仅是客观的再现。而当电影以艺术作品的身份显现时,色彩跟随影像序列就具有了表意的功能,能够“讲故事”,能够“创造出符合情境的心理氛围”,能够被赋予“象征的意义”,能够生成丰富的意境^{[2](P65)}。只是这些意义的表达、情感的蕴含、意境的获得要依靠审美主体的心神体悟,即所谓的让色彩“接受戏剧性和心理学的处理”。这时,影片中的色彩就“往往是一种潜意识因素,它具有强烈的情绪感染力、表现性和氛围感,而不是理性因素”^{[1](P12)}。

电影《萧红》就运用了大量的和谐的色彩语言来实现情境氛围的渲染和思想情绪的表达,并以色彩的跳跃、对比凸显女作家在遭遇沉重身心压迫时对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顽强追求。

具体而言,霍建起导演将淡青和墨灰这两种冷色作为背景环境的代表色调,在引起观众孤独、无望的视觉联想中唤起一种压抑的滞涩感,以突出主人公贫病交加下的生存窘境、凄惶无助的生命状态和濒临绝望的沉重心理压力。在萧红被汪恩甲抛弃在小旅馆的时候,可以说是她人

生中最为绝望的时刻,身怀六甲、背负欠债、没有自由地被软禁在小阁楼里,等待她的可能是即将被卖到妓院的可怕未来。这时的主人公头发凌乱、眼神绝望,深灰色的衣衫与周遭昏暗的环境融为一体,逼仄的阁楼里,灰蒙阴沉,或浓或淡的青灰色背景给观众沉重的压抑之感,加之女主人公指间升起的丝丝缕缕的蓝灰色香烟气息,更使人感到无奈、惆怅和绝望。再比如,萧红逃婚离家,一心求学的画面:主人公快步地行走在冬天的北京,影像的背景颜色是一片灰蒙暗淡,令观众在感到冬天的肃杀、萧瑟之外,也深深体会到人物生活的窘迫、求学的艰难。而这些令人倍感消沉的色彩作为背景大面积地充斥着荧幕,也同时暗喻着萧红一心逃离的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和她权宜下栖身的汪恩甲,他们之于萧红的身心压迫是多么的沉重:父亲的绝情已令她无路可退,委身之人又陷她于无路可走之境地,在那个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的两性关系的年代里,萧红身处绝境!

但与青灰色相对,红色总是零星地、跳跃地、偶尔也大面积地出现在影像中,并用以代表一种积极的反抗的力量。如因求学逃婚的萧红身着的红色棉袍,无疑是灰色背景下的亮点,它与背景色形成明暗、冷暖的鲜明对比,在此对比下,萧红对家庭的反抗,对父权桎梏的突破,还有她倔强独立的性格呼之欲出。而与青灰色带给观众的压抑、滞涩感受不同,此刻的红色还有了些许活泼、浪漫的味道,让人感受到希望和力量,这与萧红逃婚离家、独立求学的情节相呼应,在创造意境的同时也起到了叙事的作用。

另外,在这部影片中,颜色还成为诠释感情的工具。萧红与萧军、端木之间难以言说的伤害、背叛、婚姻等一系列复杂的情感纠葛在色彩的变换中获得了释放的空间,冷暖色彩的交替在为没有真实内容的情感赋予形式和材料的同时,其本身的象征意义也为意境的表达创造了条件。色彩的倏忽转换也折射出女作家情感选择背后对传统夫权限制下的女性尊严的维护和争取。

萧红被抛弃在道外东兴顺旅馆,身怀六甲,独困在昏暗的阁楼里,每日看书或在墙壁上刻字画画,生活没有希望、没有未来。萧军来了,萧红

点亮小灯,室内瞬间有了淡淡的、黄色的光亮。二人初遇,倾心交谈,一见如故。昏黄的光线不断交错映照在彼此的脸上,周围一切都在暗影里,甚至萧军有时也只有暗暗的轮廓,唯有萧红的面庞,总是处在黄色的光晕下,显得那么温柔,那么祥和。氤氲的黄色慢慢升腾,让观众感到原本压抑的气氛中有了些许的暖意。爱情开始了,“从天而降的萧军,给我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还让我得到了梦幻般的爱情,我曾经为之舍生忘死,遍寻不到,众叛亲离……”在萧红娓娓道来间,原本昏暗逼塞的阁楼似乎明亮宽敞起来。灯光散发出的幽幽暗黄依旧充满希望地亮着,而阁楼那唯一的窗子也成为温暖阳光的通道,这阳光是明亮的、动人的黄色。萧红在微弱的灯光下沉思、凝视、期待,二人在充满阳光的房间里拥抱、亲吻、相爱。温暖的、明亮的黄色充满了银幕,它不是饱和度浓烈的金色,显得刻意又紧张,它是稀薄的、淡淡的,甚至是透明的,却又如空气般无处不在,充满了整个画面,“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四周无边的黑暗”。观众于这黄色渲染的浪漫唯美中感受到了女作家对于爱情的期许追求,以及爱情来临时的喜悦和惆怅。而叶落知秋,满地飘落的黄叶不仅喻示着季节的转换,同时意指二人创作上的收获——合著《跋涉》的发表。这真是一段幸福的日子,尽管二萧情感上的伤痕已经隐隐闪现。但银屏里烛光摇曳、灯光明亮,依旧是温暖的黄色色调,使观众仍然感受到了二萧摆脱了生存的困境后,那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未来。

当萧红在被萧军“情感上出现的散步”深深伤害后,萧红遭遇了爱情与友谊的双重背叛。失意的她与端木在酒吧里聊天,画面的主色调依旧是黄色,烛光、灯光在变幻闪烁。只是这黄色不再稀薄清淡、温暖柔和,而是飘忽不定、摇曳暗淡的。同时,葡萄酒的猩红,沙发椅背的暗红,还有酒吧里若隐若现的红色灯光已经悄然地侵入了画面。尽管黄色依然占据着银幕的较大面积,但红色的切入却显得那么势不可挡,使观众的视觉张力于色彩的对比中受到挑战,而也正是在这色彩的转变下,观众感受到了萧红对萧军的深深失望和与端木情感的初见端倪。萧红与端木的婚礼场面,红色彻底成为了主色调:红烛、红桌、朱

窗、红衣、新人胸前佩戴的红花……红色象征着喜庆、欢乐,让人感到温暖、奔放、喜悦和热情,但这中国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色彩之一同时也是寓意暴力、血腥、疯狂的危险颜色。导演用饱和度和较强的红色使观众体会到了萧红那透着丝丝惆怅的喜悦,同时也暗示了女作家未来那不可预知的新的情感困境,“热恋没有维持多久,我们的感情就陷入了僵局……我深感和萧军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清醒的画外音与寓意幸福和杀戮的红色,共同烘托着主人公婚后的无奈和无助,令观众感受到了那个躲在明亮颜色之后的萧红的孤独与寂寞,对情感的躲避与追逐。

众所周知,在色彩中,红、黄、蓝是最为纯净、最为鲜艳的三原色,它们之间不同比例的调配可以形成周遭世界的五彩缤纷,但其他任何颜色是无法调配出纯粹的红色、黄色和蓝色的,它们彼此之间更是无法通过任何形式的配比、过渡而成为彼此。影片《萧红》将这三原色中的黄色和红色作为营造女作家情感世界的背景手段,以此强调了萧军与端木是萧红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选择。而这种情感选择行为正是萧红在用“爱也离开”的方式表达对女性尊严的捍卫,对传统夫权压制的积极反抗。

萧红离开萧军,不是因为不爱,否则电影也不会运用阳光般温柔的黄色营造二人的情感,阳光给予万物以生长的能量,如同萧军拯救萧红于危难。她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3]萧红选择离开仍然爱着的萧军,原因多而繁杂,归结起来是不能对萧军刚硬的自负施加给自己的伤害保持缄默,不能容忍他对自己身体的痛楚、精神的需要所显现的冷漠,不能对萧军婚姻中的背叛视而不见,在萧红看来,这些“萧军式的男子汉”的行为是对自己人格上的轻视和侮辱,是“大男子主义”对女性尊严的无情蹂躏。因此,萧红感到,“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3]体会到萧军施与的痛苦,本身就是萧红敏锐洞察传统夫妻不

平等关系的情感表现,而敢于在爱的同时解除痛苦,即“爱也离开”的行为也正是她对男主女次、夫唱妇随的传统夫妻关系的反抗。萧红离开萧军与端木结合,这两段情感意境的创造在影片中分别用了黄色和红色加以表现,而正如“黄”与“红”之间永恒的不可调和,萧红与萧军的矛盾亦是不可能解决的。“红”与“黄”的截然分明,即至最终红色取代黄色,恰是萧红用毅然离开还爱着的萧军去选择“可以对自己轻声说话”的端木的方式对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夫为妻纲”“男尊女卑”之观念的愤然反击,是对女性尊严和主权的捍卫,对夫权牢笼之于女性身心自由限制的突破。这里姑且不论选择方式和结果的对错,萧红的选择行为本身即是一种勇敢的自省。

二、“脚步”特写下的丰富意味

电影《萧红》采用“脚步”作为主体意象,运用特写镜头,结合声音、色彩等电影元素共同作用于观众的审美感官,让观众在特殊的影像画面里体会到导演蕴含在电影中的对萧红世界的独特解读。

影片多次摄入匆匆的步履:情景一:萧红逃婚初到北平,生活困顿,深秋时只穿一双黑色布鞋,银幕上黑鞋白袜伴随着被秋风卷起肆意飞舞的枯黄落叶,生活的凄怆与落魄不言而喻。主人公旁白:“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了堕落或者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这里的“脚步”意味着离开:逃离故乡、逃离安排的婚姻,伴随着主人公的旁白,萧红的无奈和寂寞的情绪也溢出了画面之外。情景二:汪恩甲来到北平,二人同居,银幕上再次展现她的步履,黑色的皮鞋还有齐到脚踝的红色棉袍。主人公旁白:“我们在一起了,北平似乎也不那么冷了,但我心里总是有种说不出的委屈。他不是我期待的人,这样的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可正像鲁迅先生说的,梦是好的,否则钱是重要的。”此时的“脚步”影像中双脚穿上了皮鞋,一方面直观上告诉观众此时与汪恩甲同居后萧红经济状况好转,但反之也证明萧红此刻的情感选择的基础不是出于感情需要,而是经济所迫,加之略有解释性质的旁白,萧红不甘和委屈

的情感被自然地表现出来。同时,影像中的脚步匆匆,也暗示了女作家此刻心中的彷徨与不安。情景三:萧红生育后出院,在马路上,萧军为她绑紧松开的鞋带。破旧的连鞋带都断掉的棉鞋、萧军绑鞋带的双手、满地的落叶占据了整个屏幕。此处没有任何旁白,但无声却胜过有声。这里是唯一一处“脚步”意象的静止画面,似乎意味着一直行走着、逃离着的萧红终于停靠下来,无论在情感抑或生活上都稳定下来,因为她有了萧军作为依靠。但“绑紧鞋带”的时间是十分短暂的,萧军最终给予萧红的稳定与安宁是短暂的,预示着后面二萧之间的相处是抵牾多过和谐的。除以上情景外,还有最后拉着睡着的萧红的奔跑的马车……此刻的萧红身在马车之上,身虽静依旧行不止,象征着这位作家终生未安的生命历程。

电影是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艺术,电影空间意识的建立所依靠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镜头的选择,而摄像机对“象”进行俯仰观察、远近大小的选取往往依据对“意”的表达。电影艺术的这一审美观念与文学创作中诗人对意象的审美观照方式如出一辙,所谓寄情于景、托物言志即是此意,只是文学创作采用语言,而电影艺术则利用技术手段实现这一审美理想。电影《萧红》对“脚步”意象的摄取运用了特写的镜语表达方式。在以上情景中,萧红的脚步占据了大银幕几乎90%的面积,排除了其他杂质而突出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进而强化了“脚步”实像的内涵和外延。普多夫金将特写镜头之于意象的突出强化作用进行过更为细致的阐述:“由于特写可以使观众看到不带背景的细节,观众就可以从他们的视野中排除那些多余的东西,就可以不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专心注意于细节,银幕上表现出的形象更能获得最明了、最显著的效果。”导演对于“脚步”意象的特写安排,就是在“立象以尽意”,在这部电影里,“脚步”不再是纯粹的局部呈现,而是包含着更为丰富意味的影像,是传达深刻意境的手段。

具体而言,通过“脚步”影像的特写,观众们可以更为深刻地去体味“萧红令人同情的身世”。这份“同情”既是对她总是所托非人的情感选择的不幸的爱怜,也是对其不断辗转、不停漂泊的

命运的叹息。在情感上,萧红始终在行走:委身怀孕、遭遇抛弃、坠入爱河、遭遇背叛、走进婚姻、陷入另一个错误。萧红与萧军相伴的几年烦恼大于欢愉,而迫切地投入到与端木的婚姻中亦使她发现“是一个更大的错误”。这种阴差阳错的情感选择使萧红始终没有获得她一直企盼的安宁和稳定,反而令她要消耗更多的心力去结束一个又一个问题。而在人生旅途中,萧红离开呼兰县城,走过哈尔滨,北平,上海,山西,西安,武汉,日本,香港,她渴望停泊和安息,无奈还要继续上路,而且是独自一人,最终也只能在碧水蓝天中深情回望着她执意逃离的故乡。可以说,“不停地行走”是她无所归依的情感世界和流浪般的匆匆人生的标记,也是她救赎自己的唯一手段,尽管这逃离般的行走是那么的被迫和无奈,“我为什么总是一个人走路呢?过去,在哈尔滨,后来,在日本,这回在重庆。我好像是命中注定要一个人走路的。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啊。逃难的时候,你看看,成千上万的,跑警报的时候,几十上百万的。到了重要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只能是一个人。这是为什么……”^[4]也正是在“行走”中,萧红不断书写,最终构筑了她的文学世界。

其实,电影用对“脚步”的特写在意指萧红永不停歇的人生旅程和始终不能安稳下来的情感经历的同时,也在以此具像暗示女作家为突破那个时代下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的两性关系对女性

本身的桎梏所作出的反抗:不屈就父亲的包办婚姻就离家,尽管从此无路可退;不甘忍受萧军的精神奴役就分手,尽管依然爱着。萧红永不停止的行走使她身心俱疲、代价斐然,但她依旧义无反顾、未曾徘徊。另一方面,萧红的“行走”本身虽然意味着离开,但也提示着追寻:离开原地,总归要走到一个终点,达到一个目的、获得一种结果意义上的胜利。对于萧红来说,一方可以让她平静写作的乐土,一种建立在平等、温暖、有爱上的两性关系,最终建立一个纯粹的女性精神的家园就是她始终追求的目标。虽然萧红的人生经历和结局并没有显示出她追寻的成功,但相较于单纯离开的被动和消极,追寻本身即意味着对各种可能性的积极探索。“离开”是萧红在女性意识不断觉醒过程中的反抗,而“追寻”则是她最终不断渴望走向自我的积极尝试。

参考文献:

- [1] [美]路易斯·詹内蒂.认识电影[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 [2] [法]让·米特里.电影美学与心理学[M].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文学出版社,2012.
- [3]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161.
- [4] 梅林.忆萧红[A].季红真.萧萧落红[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1.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Film *Xiao Hong* from Artistic Conception Narrative

DING Yuan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erbin 150018, China)

Abstract: The film *Xiao Hong* uses the color language to create the situation and the atmosphere and to express its ideas and feelings. It employ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ors to show women's protection and fight for their dignity under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onstraints veiled by the writer's emotional choice. Meanwhile, the close-up of "footsteps" in the film refers to Xiao Hong's endless life journey and unsettling emotional experiences on the one hand, and implies her rebellion against the bounds of women in a male-centered society at that time.

Key words: Xiao Hong; artistic conception; color; footstep; female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性别视角下的萧红专题研究 ·

影像视域中的作家萧红

郑 薇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摘 要:两部以东北作家萧红的人生经历为蓝本拍摄的电影《萧红》和《黄金时代》,让萧红进入大众视野,人们通过屏幕阅读她的作品,感受她的人生,体会她对爱与自由的执着追寻。萧红自觉意识的觉醒与抗争,在那个时代,也终因没有获得经济地位而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是大时代下的小女子。两部电影都对历史进行了个人化的解读,以他者视角对地域文化和人物形象进行了想象与建构。

关键词:影像视域;萧红;想象与建构

中图分类号:J9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48-04

2013 年、2014 年两部以东北作家萧红的人生经历为蓝本拍摄的电影《萧红》和《黄金时代》上映。以女作家为蓝本拍摄的电影在国内外并不多见,在短期内连续上映两部作品足见作家本人的影响力。的确,像萧红这样短暂而传奇的人生经历在令人唏嘘感叹之余,还会让人产生更多的好奇与疑问,而关于她的情感经历,正如《黄金时代》结尾处她自己所说的:“我在想,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看,但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两部电影上映后也的确遭遇了票房与口碑、艺术虚构与对作家误读等充满争议的讨论,不管争议的结果怎样,影像中的女作家萧红已借此进入大众视野,人们通过屏幕阅读她的作品,感受她的人生,体会她对爱与自由的执着追寻。如今再看这两部电影,它们都以独特的风格在

电影史上留下值得回味的一笔。

一、觉醒与抗争——大时代下的小女子

“我离开家那年不到二十,前几年在山西遇见丁玲,她跟我一样也是逃婚出来,白薇也是,谢冰莹也是,真是一个盛产娜拉的时代”,这是电影《萧红》的开篇,在香港病重的萧红对骆宾基回忆起自己的往事。成年后的萧红只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与一个爱的人共度人生。她不断地逃离,却又不幸地一直在时代的漩涡中,在父权社会与战火交织的乱世,将其所追求的自由变成一次次无奈的逃离,从呼兰到哈尔滨,从青岛到上海,从武汉到山西、重庆,再到香港,从异乡到异乡,直到生命消逝。像娜拉一样,出走成为其追求自由与爱的象征,然而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过,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电影中萧红借用鲁迅的话道出了

收稿日期:2017-06-16

作者简介:郑薇(1976—),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影视文化、网络文学研究。

她的困境: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者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事实上,萧红每次命运的转折几乎都跟经济的窘困有关,也几乎每次都因为钱而向社会、向男性妥协。两部电影都对她的生存困境作了详细的描述,19岁的萧红逃婚离家,为了寻找一个能资助她上学的人,与已经结婚的表哥陆哲舜来到了北平,后来因为陆哲舜遭到家里的经济封锁,没有经济来源的二人只好回到哈尔滨。此时萧红接受了未婚夫汪恩甲的帮助,影片《萧红》中有这样的镜头:萧红从北平回到哈尔滨,被未婚夫汪恩甲找上门来,与汪恩甲在饭馆吃饭,萧红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食物,狼吞虎咽地表达了她的饥饿,汪恩甲则一脸怜悯地望着她。正如萧红自己所说,尽管她并不喜欢汪恩甲,但接受他的帮助比接受别人的帮助更体面一些。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欠了旅店几百块的房钱,汪恩甲以回家要钱为名一去不返,怀孕的萧红无力支付房租,被旅馆老板关进破旧的阁楼,无路可走的她给报社写信求助。可以说,这是萧红自觉意识的觉醒:她一次次向命运抗争,一次次在父权社会遭遇困境,又一次次没有妥协地寻找出路。然而,在萧红与娜拉的时代,女性即使觉醒,也终因没有获得经济地位而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她们只能是大时代下的小女子。

萧红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抗争,在那个时代显得惊天动地,她对爱与自由的追求处处碰壁,让她遍体鳞伤,她一生中短暂的黄金时代是在日本的那段时间。因为与萧军感情出现问题,她打算投靠已经去日本的弟弟,不巧弟弟已经回国,她住在朋友的家里,在那里她暂时远离了动荡的时代,也远离了个人情感的困扰。她在给萧军的信里写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尽管萧红形

容自己是在笼子里,但相对于少年时的逃离与成年后的漂泊,那真是她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短暂的黄金时代。

电影《黄金时代》正是因此命名,人们期待在影片中看到一个形神兼备的萧红,想象着风姿绰约的萧红,电影呈现的不仅是萧红一个人的传记,也是那个大时代的记录,其以客观、平实、间离、多点的叙述方式讲述了时代的变迁和人物的命运。影片以萧红自述开头,导演没有采用一般电影的封闭性叙事,而是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中不断穿插有画面的旁白,采用戏剧间离的效果,让演员演着演着转身面对镜头、面向观众开始叙述那些无法用画面和情节展现的历史背景、故事情节转折的原因等等;从萧红曾经打过交道的朋友、作家、家人等视角来叙述萧红不同阶段的经历和生活,甚至还提供了对萧红、萧军恩爱情仇的不同版本的解释。这让演员和观众都不断在真实与虚构、在入戏与出戏之间反复,时而被故事情节感染,时而又必须跳出故事客观地看待历史与人物。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也给观众带来了迥异的观影体验,3个小时的片长,几乎演绎了萧红短暂生命的全过程,出场的作家、文人近三十位。多点叙述方式一方面给观众提供了更多的史料与信息,让观众更加客观地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同时也由于拼盘式的叙述方式,脱离了一般观众的观影预期,需要有一定的文学以及历史知识的储备,甚至需要通过自己的想像来弥补故事情节。“这些人物被一件一事情拼凑起来,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或者那么选择,我们难以把握他们的性格逻辑和情感逻辑。多数人物显得浮光掠影,若即若离。”“萧红逃婚、送子、猜忌、分离、逃难,萧军的相濡以沫、离情别恋、毅然决然,甚至端木、骆宾基这些人物与萧红的暧昧而复杂的关系,也都就事论事,让观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1]

尽管电影的票房收入并不理想,但史诗般对大时代与人物命运的全新呈现方式,可谓中国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想象与建构——他者视角下的人物形象

尽管导演和编剧最大限度地给观众提供了客观的史料,但两部电影仍然对历史进行了个人化的解读,从他者视角对地域文化和人物形象进行了想象与建构。《黄金时代》中,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对萧红作了介绍和解读,有时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陈诉。电影中的鲁迅被演绎成一个温柔长者的形象,全然不是人们印象中嬉笑怒骂的呐喊者。电影中,汪恩甲是穿着睡衣从旅馆离开萧红的,他在欠下房钱且萧红怀孕即将临产时为何出走,又去了哪里,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用这样一个方式离开,表明他可能是临时性的匆忙离开,也可能是故意不辞而别,电影这样呈现其离开的方式暗示了他命运的各种可能性。这是电影创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再叙事,“想象对历史的重要性表明,历史经过现在的再叙事,它的本来面目已经丧失了唯一性和确定性,历史事实以文本的方式存在”^[2]。

如果说《黄金时代》是以比较开放的态度展示了大时代中人物命运的各种可能性,那么《萧红》则融入了更多男性视角的想象与建构。“文学想象的虚构力量侵入历史,‘现在’开始有权把‘过去’纳入再阐释的视野,叙事者/作者主体的主观意识自觉进入历史、反思历史,以期获得新的意义。”^[2]电影《萧红》即对地域文化、作家形象都进行了他者的想象与建构。伊瑟尔指出:“文本可以顺理成章地看作是虚构、现实与想象相互作用和彼此渗透的结果。虚构将已知的世界编码,把未知的世界变成想象之物,而由想象与现实这两者重新组合的新世界,即是呈现给读者的一片新天地。”^[3]

《萧红》给观众呈现的新天地,即是以他者视角对历史人物与商业元素融合构成的。电影上映前就引起了很多关注,这位在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由哈尔滨姑娘宋佳扮演。电影外景也大部分取自哈尔滨,这无疑也是一次展示东北地域文化、自然风情的好机会。电影还选择了3月8号妇女节的档期在哈尔滨举行了隆重的首映仪式,让萧红在她百年诞辰

之后,以光影的记忆回到故乡,可谓意义非凡。影片以诗意流畅的电影语言与多舛流离的情感为线索,再现了萧红传奇的一生。令人赞叹的是电影在视觉效果方面传达出的美感:伏尔加庄园里的俄罗斯风情、中央大街的异国建筑、落满黄叶的街道、白雪皑皑的冰雪美景、光影中定格的人像等,都呈现出了诗意而柔美的华丽,以及油画般抒情而优雅的气质。作家出身和生活的地方的风俗人情、自然景观作为故事的背景,成为参与叙事的动力。影片独具匠心的设置,使我们看到了美丽的中央大街,俄式教堂以及浪漫的雪花。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东北乡村的生活场景:萧红的父亲、母亲一边吸烟袋一边商量萧红的婚事;萧红祖父去世家里办丧事的场面中,出现了萨满跳神的镜头。但如果稍有了解我们就会知道,萧红的父亲烟酒不沾,而萨满舞是满一通古斯语族在敬神、祭祖时的仪式上跳的,也是不应该出现在汉族人的葬礼仪式上的,这些都是以他者视角对东北地域文化符号性的想象。

电影对萧红同样作了男性视角的想象,将她物化成为“美丽的女作家”“每个接近她的男人都会爱上她”,成为他者眼中的女性形象。电影在绚丽的影像和诗意抒情的形式下,缺少对人物精神上的塑造,反而陷入了电影宣传海报上写的“一个女人与六个男人”的情感故事的窠臼。

电影中萧红将生下的第一个孩子送人,萧军对抱走孩子的人说:“等孩子长大,告诉她,她亲妈是位美丽的作家”。结尾处端木蕻良在萧红的墓前感慨:“为什么每个接近她的男人都会爱上她,哪怕她身怀六甲,贫病交加,生命垂危。”这似乎在暗示:这个作家因为美丽而令人赞叹,女人也因为被男人爱上才有存在的价值。尽管萧红的自我意识和对自我主体意识的认知,体现在她对读书、自由、爱的追求中,也体现在她对命运的选择和取舍中,她以抗争的方式实现了身体和精神的出走。但是,电影中的萧红,无论是离家去北平上学,还是被困旅馆无路可走、求助报社、给鲁迅写信,每一次遇到困境,最终都是得到男性的帮助,陆哲舜、萧军、鲁迅、端木蕻良、骆宾基等

等,男性似乎成为拯救她的唯一力量。

萧红因为经济上的困境,不断寻找依靠,这是时代的悲剧,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但在影片中由于缺少对史实的交代,也没有相应的情节和逻辑支撑,我们只看到她不断追求新的爱情目标,而看不到她与时代和父权社会的抗争。萧红与萧军热恋时,“每天的全部内容就是为了见到他”和“等待见到他”,而当萧军移情别恋时,怀着萧军的孩子,她很快爱上了端木蕻良,电影中还暗示,在上海以及在病重期间,她还与鲁迅、骆宾基关系暧昧。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对弱势群体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他们无法表达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这里编剧、导演乃至观众都以他者的身份展开了对萧红的想象和建构,这种想象和建构基于他们各自的利益需求而偏执一方,最终呈现了一位众说纷纭的女作家形象。那么影像中的作家萧红是真实的萧红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毫无疑问,今天的电影产业已成为资本利益下的商品,20多年前尹鸿曾感叹:“电影终于名正

言顺地成为了一种电影游戏:它消除了时间感,排除了历史意识,它也割断了与现实的真实性联系,而成为了一种自我体系、自我的封闭的游戏文本”^[4]。透过屏幕,“观众失去了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对电影的观看已经不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仅仅是一种可以把思维关掉的娱乐行为”^[4]。这也许是类似文艺片商业化道路上的牵绊,但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文化对作家的误读,如何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作家形象,展现给观众一个值得尊重的、富有人性深度的作家的公众形象,仍然是这类题材电影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尹鸿.《黄金时代》为何遭遇票房惨败[J].中国报道,2014,(11):86.
- [2] 乔以钢. 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132.
- [3] [德]伊瑟尔. 虚构与想象[M]. 陈定家,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6.
- [4] 尹鸿. 告别了普罗米修斯之后——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电影[J]. 当代电影,1994,(2):60-67.

Xiao Hong the Writer Revealed in the Films' Image and Horizon

ZHENG Wei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erbin 150018, China)

Abstract: The two movies – *Xiao Hong* and *Golden Age* – based on the life and experience of northeastern writer Xiao Hong's, brings her back to people's sight. Her life and works are watched in those two movies and her persistent pursuit of love and freedom is strongly felt through the screen. Xiao Hong's awaking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rebellion are both in vain and she remains to be a dependent little woman of male power for the lack of independent economic status. Both movies explore grand history in the life of an individual, visualize and reconstruct local culture and characters from the other's perspective.

Key words: image and horizon; Xiao Hong; imag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妇女史研究 ·

妇女的自我感受：郑琼与杨牢的婚姻情感生活^①

李志生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 要:自我感受是社会性别理论的重要内容,用以考量妇女生活的真情实感。考察妇女自我感受的结果,或可改变对历史问题的成规固见。妇女自我感受的获得,一般取自于女性自己的书写——女性材料,但唐朝的妇女写作不盛行,留下来的女性书写有限且真伪难辨。因受限于史料,唐时妇女自我感受这一命题,一直是研究中的难点。选取郑琼与杨牢的婚姻情感生活,以郑琼的婚姻心理和感受为研究重点,通过对郑琼情感世界的分析,借以提出一种在女性史料缺失时,考察妇女自我感受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自我感受;女性史料;同理心;文化史;夫妻情感

中图分类号: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52-10

对妇女自我感受的强调,是社会性别理论(Gender)的重要贡献^②,而以妇女的视角进行观察,“寻找妇女在过去历史中的声音”,或可改变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对此,美国学者孙康宜曾谈到:

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对我们这些在美国学院中作研究的人启发特别大,它使我们惊喜地发现,原来西方女性主义的某些论断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而“五四”以来把妇女完全说成是封建礼教牺牲品的话语也过于绝对化^[1]。

学者们对众多明清女性材料的运用、对女性自我感受的探究,不但颠覆了这一时期妇女受压迫的传统认识模式,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明清社会的认识。妇女自我感受的获得,一般取自

于女性材料,明清时期的女作家众多,学者可以依此而展开对妇女自我感受的探寻。但唐朝时,妇女的写作并不盛行,留下来的女性书写不但有限,而且有些还真伪难辨^③。如此,唐时妇女自我感受这一命题,因受限于史料,就成了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女性史料匮乏,我们就不得不重拾男性书写。至于本文,关于郑琼与杨牢的婚姻情感生活,就不得不主要使用男性材料,特别是相关当事人的墓志。但对这些男性材料,我们改换思考方式,从而作出新的解读,即在对相关史料作历史学解读后,以“同理心”的方法^④,分析相关男性史料中的妇女体验,并辅之以其他心理学理论,以发掘妇女的自我感受。

杨牢,中唐时期的著名文人,其妻郑琼,弟杨宇,弟妻杜綰,这4位杨氏家族成员的墓志都流

传于世,因此,为我们留下了一份较完整而宝贵的家族生活资料^⑤,更为我们透露了郑琼与杨牢隐秘的婚姻情感世界,使我们可以透过性别视角,特别是郑琼的感受,来观察他们的喜乐悲哀。

撰写本文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对史学“科学化”的反思。史学“科学化”的最大弊端,是“见物不见人”,而忽略“人们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的日常经历”,就无法了解人们的真正“需求”,也就无法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2]。历史和现实相似,大的数据固然重要,但拥有海量数据,也未必能够了解人类和人类的动机,目前世界上掌握数据最多的公司是谷歌,它得出的感觉就是如此^[3]。至于唐代妇女的婚姻,学者的研究取径一般也是基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诸如婚龄、生育(次数、间隔)、卒年等,而这些数字背后的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我们鲜有所知。本文希望以这一个案研究,来探讨郑琼这位女子在婚姻中的真情实感,以此而推及千千万万像她一样命运的女子。

一、杨牢的出身和德性

中国古代的妇女是被定义为“从人”者的,“妇人从人者也”,“嫁从夫”(《礼记·郊特性》),婚后的妇女,须围绕丈夫或夫族生活,故而对郑琼婚姻情感的探讨,也要从她的夫君杨牢谈起。

杨牢,弘农华阴人,出自于关中郡姓之家。关于士族对家门、家风的意义,钱穆先生总结说:“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4]在杨牢身上,就极具士族文化的这两大特征。

杨牢自少就颇具孝道之内行,他还曾被誉为“孝童”,称名于一时:

始,河南人杨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显,以书荐于尹曰:“执事之部孝童杨牢,父茂卿,从田氏府,赵军反,杀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丧,虑死不果至。牢自洛阳走常山二千里,号伏叛垒,委发羸骸,有可怜状,讎意感解,

以尸还之。单縗冬月,往来太行间,冻肤皸瘃,衔哀雨血。……闻牢之赙丧,潞州偿其费,其葬也,滑帅赙之财……”^[5]

杨牢父死于长庆元年(821年)的镇州(今河北正定)王廷凑兵乱,杨牢以至孝之诚,单身赴叛镇以求父尸的“壮举”,深深感动、震撼了其时之人。

成年后的杨牢步入仕途,任官于外。此时,是其弟杨宇承担起了养亲之责,这可见杨牢的《赠舍弟》一诗:“秦云蜀浪两堪愁,尔养晨昏我远游。千里客心难寄梦,两行乡泪为君流。”^[6]“尔养晨昏我远游”一句,既说明了杨宇的奉养老母,也表明了杨牢远于晨定昏省的愧疚,更彰显了杨氏兄弟间的友悌。杨牢对弟弟的情谊,还表现在他为杨宇撰写的墓志中:杨牢对爱弟早亡的痛挽与忿怨,对他才高八斗但命运多舛的抱恨,对爱弟品行的赞叹,等等,都使读者感到了一种摄人的真情。杨牢兄弟所展现的这种兄友弟悌,正是士族家风的体现。

杨牢也极具经籍文史的修养。早在六岁时,他就现诗才:“六岁时就学归,误入人家,乃父友也。二丈人弹棋次,见杨氏子,戏曰:‘尔能为丈人咏此局否?’杨登时叉手咏曰:‘魁形下方天顶凸,二十四寸窗中月。’父友惊抚其首,遗以梨栗,曰:‘尔后必有文。’”^{[7](P317)}成年后,杨牢更是“学深《左传》,尤博史书,百家诸子,咸在于口”,“其文好古,其书以诗,自得于天……时辈之中,所谓拔乎其萃也……有集卅卷”^{[8](P2358)},有“诗集六十卷”^{[7](P317)}。故在其年刚27(虚岁28),即登进士第^⑥,以这样的年龄中举,是被时人视作年轻有为的——“在诸生为少俊”^{[9](P2294)}。

杨牢的经籍文史之学,一是得益于家学传承,二是私学的养成。杨氏家学深厚,这在杨牢兄弟墓志中都有提及,“家世进士”^{[8](P2358)};“王父讳稷,文行高于时而困于不遇;皇考讳茂卿,字士蕤,元和六年登进士科”^{[9](P2294)}。杨牢兄弟也都曾就读于私学,杨牢参加科举考试,就是“始自乡荐”^{[8](P2358)},而乡荐是指地方州县从私学选拔、考试诸生,取合格者,荐于礼部贡院参加科考;杨

字也是“有从师久不能辨者”^{[9](P2294)},此“师”也当是私学之师。

综此,杨牢出身于关中高门之家,有着其时社会推崇的孝悌之德和文学之才,在“少俊”之年,就已登科为进士。正是杨牢家昔日的门第与他耀目的才华,引来了一个婚宦两全家族的联姻。

二、郑琼的出身和婚配

郑琼,依其夫杨牢为她撰写的墓志,出身于一个婚宦两全的高门之家:父系“荥阳人,当魏孝文时,族氏为山东第一,显于时固矣”;母系,“外祖赵郡李公”^{⑦[10](P2214)}。父母两系均为唐时的头等士族——荥阳郑氏和赵郡李氏。但杨牢对郑琼本宗和外宗门第的这些记载,并不能从其他史料中得到佐证,所以暂时无从判断真伪。退而言之,不论真伪,这并不妨碍杨牢对夫人高门的认同,并以此为傲。

郑琼父母两系的从宦也同样显赫,祖郑侑,官至河中少尹(从四品下),父博古,在其病故时,任官盐铁司、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品级不高但职位清显。外祖李峦,官至户部尚书(正三品),外祖母何氏,受封息国夫人,母为何氏嫡出^[11]。可见,郑琼的祖辈——祖父和外祖,任官都达到了高级职位。

相比之下,杨牢的家世就要黯淡许多。首先,弘农杨氏虽也属高门士族,但它的声望无法与一流的山东士族高门相较。其次,杨牢父祖的仕宦也乏善可陈,“(曾祖)括,皇钟离令。祖稷,皇乡贡进士。考茂卿,皇进士及第、监察里行”^{[8](P2358)},祖父连任官的资格都未取得,父亲所任的监察御里行也非正官。如此,郑琼父母选择杨牢为婿,家族背景当非考虑的重点,为说明这一问题,请先来看表1杨牢和郑琼的主要生平年代:

表1 杨牢和郑琼的主要生平年代(以虚岁计)^⑧

	郑琼	杨牢
生年	元和四年(809年)九月,	贞元十七年(801年)
进士及第		大和二年(828年)春 ^⑨ ,28岁
婚年	大和二年(828年)七月,20岁	大和二年(828年)七月,28岁
婚姻存续期	约14年	大和二年(828年)至会昌元年(841年)
卒年	会昌元年(841年)五月,33岁	大中十二年(858年)正月,58岁
夫妻年龄差	8岁	
夫妻卒年差	夫晚于妻去世17年	

依此,杨牢于大和二年(828年)春进士及第,七月完婚,也即这桩婚姻是在杨牢科举中第后促成的。这也就明确表明,郑琼家主要看中了杨牢的才华及未来仕途。当然,杨牢的“孝童”声名,或也是他们看中的德性之一。郑琼与杨牢的联姻,也体现了唐后期择婿重人物的特点。

三、杨牢的任官经历和人格特征

以事后的情况看,杨牢虽颇具才华,但仕途的发展,特别是后期,并不十分顺畅。关于唐代文官的理想仕进蓝图,赖瑞和在《唐代基层文官》一书中谈到:

中晚唐的基层文官当中,最成功、入仕条件最好的,是一个进士出身,又考中制科或博学宏词者。他往往先在京城任校书郎,然后通过他父执辈的世

交关系,被某个相熟的节度使或观察使,辟为掌书记(最佳)、推官巡官(其次)。如果他没有考中制科或博学宏词,以致不能马上任正规京官或外官,则他先到幕府任巡官或推官(如韩愈),其实也很不错。

单就任官层次和年龄而言……校书郎、正字和赤、畿县尉,正是本书所论的基层官员,任官年龄约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拾遗、补阙、员外郎和郎中,可算是中层官员,任官年龄约在三十五到四十五岁之间。至于中书舍人、给事中、中书侍郎、中书令和宰相等,则属高官,一般年龄约在四十五岁以上^[12]。

以此衡量,杨牢早期的仕途,确是循着这条唐代文官理想之路推进的:“及从时解褐,初授崇文馆校书,次任广文馆助教,次授大理评事,充充海观察推官,又奏监察里行。□职于平卢节度,岁满□□□中侍□□充岭南节度使掌记……还归上京,□州□□□□朝一为著作郎,一为国子博士。”^{[8](P2358)}但在杨牢去世时——他时年57岁,依照赖瑞的分析,他的理想职位应当是中央的如下之官:中书舍人、给事中、中书侍郎、中书令和宰相,但他仅止于外官的河南县令(正五品上),虽然从品级上,已达通贵之列,但其任职的重要与清浊,显然无法与那些理想高官职位相比。

单以杨牢的文学和吏干,他应当是有机会进达于中央紧要官的。关于他的吏干,其墓志记,在充任岭南节度使掌书记时,“所至裨补,正道斯行”;担任河南县令时,“故事有以□姓入军便为军吏者,上官特庇,牧宰不能追之。公下车搜访,悉补乡□□□朝廷大仰正直”,因此还受到了皇帝的褒赞:“古人能官,何以过也!”^{[8](P2358)}所以,杨牢仕进的蹭蹬,必是事出有因。首先是他的性格。关于杨牢的性格,史书记“性狷急”^{[7](P317)},也即心胸不宽、性情急躁、性格耿直。以现代心理学分析,这就是明显的神经质人格特征。现代心理学指出,高神经质个体倾向于有心理压力,不现实的想法、过多的要求和冲动,更容易体验到诸如愤怒、焦虑、抑郁等消极的情绪。他们对外界刺激反应比一般人强烈,对情绪的调节、应对能力比较差,经常处于一种不良的情绪状态下。而在杨牢身上,这些心理特点就多有反映。

如杨牢对待父尸,前面谈到,其父横死于镇州(今河北正定),其家则居于洛阳,他的兄长或是惧死,但两地相距遥远,也确会使人产生畏难情绪。但他面对这一难题,选择的是义无反顾,以超坚韧的意志,在隆冬时节,行走二千里山路,以至“委发羸骸”“冻肤皴痂”而无悔,这的确是一种特殊人格的体现。但他的这种人格特征,也严重妨碍了其与上司和同僚的关系,“累居幕府,主人同列多不容”,这无疑对他的仕进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他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是其神经质人格特征的写照:“在青州幕,奉使出,得疾,不诊脉服药而殒”^{[7](P317)}。

因为性格而影响了仕途,但杨牢对自己的才华又相当自负,“时辈之中,所谓拔乎其萃也,其自负之心又愈于此矣”^{[8](P2358)}。自认才华横溢、胜于众人,但又得不到上司的赏识和同僚的认可,这就导致了杨牢经常处于愤怒、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中,所以“其辞多怨恚”^{[7](P317)}。

杨牢后期仕进的阻滞,或也与其妻郑琼和弟媳杜綰的去世有关,即他失去了官场的强力家族奥援。在此先介绍一下杜綰的情况。杜綰,出自京兆杜氏,相较于郑琼,杜綰的家族背景更为显赫:

祖杜黄裳 —— 妻赵郡李氏

父杜宝符 —— 妻清河崔洪女

姑杜黄裳女 —— 夫京兆韦执谊

姑杜黄裳女 —— 河东裴瀚

从祖杜黄裳杜亚 —— 范阳卢氏

与杜黄裳家族联姻的,几乎都是名门望族,杜綰之母更是来自山东第一高门清河崔氏。其家族的仕宦更是鲜夺,祖父任宪宗朝宰相;从祖亚,至官淮南节度使;姑丈韦执谊聪俊有才,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第,年仅二十余,即拜右拾遗、翰林学士,并在顺宗朝任宰相;二伯胜,宣宗朝几致宰相,卒官天平军节度使^⑩。

依照郑琼和杜綰的墓志,郑琼逝于会昌元年(841年),杨牢时年40岁,杜綰亡于两年之后(会昌三年,843年),杨牢时年42岁,他正处在赖瑞和所说的中层向上层发展的关键阶段。而如下面所分析的,郑琼和杜綰的去世,或许都是因为夫妻感情问题造成的,所以,她们的去世,可能对女方家族造成了一定伤害,由此而牵涉到了她们的配偶杨牢和杨宇兄弟。杨宇的仕途,或可对此推测作一旁证。

与其兄一样,杨宇也颇具才华:

及弱冠,好学,敏于文义六经微奥,有从师久不能辨者,反复机席间,心惟目想,已自晓解。又善属文,每下笔辄有新意锋彩明健,如摅霞振英,虽劔刀不拘,而理必归正。由是当时文士如李甘、来择辈,咸推尚之。时陇西李公名汉称最重,一见所作,遂心许不可破。明年,为礼部主司,果擢居上第,年方廿八,在诸生为少俊^{[9](P2294)}。

杨宇的才华得到了其时文士和权臣的赏识,所以在当进之年,即中进士,与其兄一样,也是一个“在诸生为少俊”的例子。中进士后,杨宇的仕途起点也不低:“坎坎浮世,卑穷不伸,凡入仕一十八年,方至国子助教。”^{[9](P2294-2295)}关于杨宇的仕进,这些文字其实也没有透露太多信息,但他的仕途起点,还是可以推测到的。杨宇28岁中举,入仕18年,去世时45岁,也就是他在登入科第后,是直接获得了官位,并未“守选”。按,在唐代,即使考中进士或明经,一般也需“守选”——等候三(进士)到七年(明经)左右,才能被分配到官职。杨宇的仕途起点虽然不错,但后期的仕进却出现了严重阻滞,在他去世时,为官仅至从六品上的国子助教,更令人费解的是,他的散品更低至从九品上的文林郎,位居文散官二十九阶的倒数第二阶。在其妻杜綰去世时,杨宇年36岁,也正处于中层向上层攀升的阶段,因而也不能排除杜綰去世的影响。

杨牢的人格特征,不仅妨碍了他的仕途,也严重影响了他夫妻感情及其妻郑琼的身体健康。

四、郑琼和杨牢的婚姻情感生活

郑琼的父母自认为女儿觅得了如意郎君,但事与愿违,因种种原因,郑琼在14年的婚姻生活中,都未能与夫君建立起恩爱、和睦的关系,也就是郑琼夫妻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这从杨牢为妻子撰写的墓志就可看出。在这一墓志的通篇文字中,对妻子的赞扬仅占极小的份量,像陈辞地称,“夫人自为杨氏妇凡14年,迁徙不暇,贫窶不怨……未报其勤,以至于此”^{[10](P2214)},以及对妻子宽容接纳自己的别宅妇/幸婢的褒扬,另外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对妻子自闭性格、沉湎于自我的描述。

前面谈到,郑琼出自一个婚宦两全的高门之家,结婚时20岁,此属其时女子的正常婚龄^⑩;夫婿才华横溢,甚为时议所属;婚姻存续14年,育有4女,无子,子女的数量也在唐代家庭子女数的正常值范围内^⑪。这些基本数据显示,郑琼的婚姻状况总体正常。但其实,她的婚姻质量并不高,她的情感生活并不美满。我们先来看一段她的墓志:

牢年三十,在洛阳,尝于外有子。

既訖,夫人未之知,一旦为侍婢失语所

漏,方甚愧恐。夫人曰:“久以君无男用,忧几成病,今则且愈当贺,奈何愧为?”因以锦纈二幅赏侍儿能言,不弃隔我子于外,蚤令知母恩。内此婢,遂收养之”^{[10](P2214)}。

杨牢的这位幸婢,其实就是一房别宅妇。所谓“别宅妇”,“是男人养在别处的、不合法的、一般瞒着妻子的情妇”,“‘妾’是法律上允许的、合法的、一般得到妻子同意的小老婆”,“传统习俗(特别是‘妒妇’们)阻挠纳妾,于是‘别宅妇’出现了”^[13]。因“别宅妇”有可能对社会(户籍问题)和家庭(夫妻感情)造成双重影响,所以唐玄宗时,曾大禁过别宅妇。而杨牢的这位别宅妇,可能就对郑琼和杨牢的夫妻生活,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依郑琼的墓志,杨牢30岁时,也即大和五年(830年),于洛阳与幸婢产子;而郑琼在会昌元年(841年)33岁离世时,长女“李方九岁”^{[10](P2214)}。以此推算,女李当出生于大和七年(833年),此时郑琼24岁,距成婚已有5年;而女李小庶子3岁,也即幸婢的怀妊,是在杨牢与郑琼结婚的次年。我们即使假定杨牢“初授崇文馆校书,次任广文馆助教”时,身居长安,而郑琼在洛阳;或其后杨牢于洛阳任官,而郑琼留于长安,但他每年也是有假期,并可以返家团圆的。关于唐代内外官的长假日,其时的《假宁令》规定:

诸元正、冬至并给假七日(节前三日,节后三日),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腊各三日(节前一,节后一日)……内外官五月给田假,九月给授衣假,分为两番,各十五日^[14]。

即使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7天尚不方便往返,15天则是在可返家时间内的。况且,唐代官员宦游时,一般是携家带眷的,像赴任岭南节度掌书记的李翱,其妻还在半路的衢州产下一女。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杨牢与郑琼的感情一直不甚和睦,特别是在初婚的前几年时间里,夫妻的感情更是寡淡,所以在他宦游时,并不经常携郑琼同行,这也由郑琼去世的情况得到证明。郑琼逝于洛阳康俗里的家中,而其时杨牢正担任兖海沂密等州都团练观察等使下的推官,任官地为沂州

(今山东临沂),其时的夫妻二人也处于分居状态。夫妻经常是两地生活,那么杨牢的私生活,也就不在郑琼的视线内了,所以也才有了“(庶子)既毗,夫人未之知”的后话。

郑琼与丈夫关系的不融洽,以杨牢的看法,原因之一或许是郑琼无子,以致使丈夫“忧几成病”。关于郑琼的生育,其墓志记,“生四女,长曰李,次曰引,次曰书,次曰马”^{[10](P2214)}。在唐代,子嗣对一个家庭确实极为重要,唐人普遍认为无子主奠,是十分可悲之事^⑩,并且《唐律》也以“无子”,为女子“七出”之首要^{[15](P267)}。所以对于无子,杨牢夫妻两个都颇感不安,而郑琼更是愧怍有加,故而在她得知庶子的消息后,不但接回了此子,还接纳了庶子之母——“纳此婢”,郑琼的宽容与柔顺也因此展现无疑。另按,此幸婢起码在被正式接纳为家庭成员后,就当被放良为妾了,“婢为主所幸,因而有子;即虽无子,经放为良者:听为妾”^{[15](P257)}。

而问题是唐人纳妾是比较普遍的,杨牢完全可以以正当的方式纳妾或幸婢,而不必私养别宅妇,并由此而产生“愧恐”,杨牢自己都认为,郑琼并非悍妒之妻,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也即来自妻方的纳妾、幸婢压力,也并不存在。如此,杨牢就当对郑琼另有所忌。实际上,杨牢忌惮的并不是其妻郑琼本人,而是她的家族背景。前面谈到,唐人做官是需要政治奥援的,像科举的温卷、官位的迁转——以父执辈的世交关系谋得节镇的官位,等等,都需要朝中有人援助,而杨牢以郑琼为妻,除了她的门第外,最重要的还是需要获得其内、外族高官族人的支持与提携,所以 he 不想与郑琼及其族人交恶。

但杨牢对郑琼又实在无法建立起感情,而且以他偏狭的性格,也不会就此作太多改变。在郑琼以不妒之德“纳此婢”后,杨牢对妻子的感情或稍有改善,这也算是他对郑琼宽容柔顺的回报,所以其后与郑琼又相次产下了三女。但正妻与幸婢的矛盾还是存在,而且还是在同一屋檐下存在着。关于唐人与妻、妾的生活和感情,陈尚君先生指出:

因为妻有其位而备于礼,既是家族荣耀的象征,又是道德礼仪的楷模,而妾则出身卑微,仅以色艺事人,大致可

以借用前人论词的话来概述,即妻庄而妾艳,在家庭中分别担负各自的角色。从唐人墓志中,还很难深入地了解他们私人生活的具体状况,但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男子的性需求更多地会在妾的一方得到满足^[16]。

这不但可以解释郑琼5年未生育的原因,还可说明郑琼、幸婢与杨牢的情感关系。杨牢的墓志显示,在他去世时是有两子的——“遗命二子”,这个次子或也是这位幸婢所生,而且还是在进入杨家、与郑琼阖宅共处时所生。

在幸婢依然是丈夫身心第一寄托的情况下,郑琼的感受又如何呢?我们再来看她的墓志:

夫人性闲默澹重,不喜华饰,每亲戚会集,以一出户犹登山涉江。在夫家凡十四年,于晨夕侍问,鲜及庭砌,未尝出行。去家仅逾年,夫人之姊既寡,告别适淮海,以车舆召夫人,语分离。夫人辞曰:“某闻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门,今姊虽远诀,且束于圣人之教,不得尽私爱,不敢往。”其姊竟不能强。遂就其家而诀去^{[10](P2214)}。

郑琼不喜交际、过着人际关系中的“孤独世界”,性格悲观,神经质。依据夫妻心理学的分类,她与杨牢完全符合“沉默寡言型”的自闭式夫妻关系,而在人际交往中,这种交往方式最为消极,“这种将自己闭锁起来的方式,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通常都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交往中产生自闭的原因有很多,其一是自尊心的低落与自卑,因而会出现无法与别人交往的情形,从而呈现一种儿童性自我状态,也即“面对精神上的痛苦、纠纷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会采取儿童时代的防御手段。当儿童遭遇精神上的痛苦的时候,他们学会将身体、心理封闭在自己的壳中,来保护自己的安全”^{[17](P24-28)}。依照杨牢的看法,郑琼的沉默寡言和自闭,是源于她固有的性格,“性闲默澹重,不喜华饰”;但以郑琼的心路分析,她在本家时或许是内向、敏感的,但自闭应是在婚后出现的,因为在她“去家仅逾年,夫人之姊既寡,告别适淮海,以车舆召夫人,语分离”,她是坚持不往,她们姊妹一同长大,姊妹当深知她的性格,如果在本家时她就是自闭

的,她的姊姊理当不会产生“以车輿召夫人”的想法的。

郑琼婚后产生自闭,当是诸多无奈现实造成的,如无子,但更重要的,还是丈夫的情感不在自己身上。夫妻心理学指出,“性是你表现你的爱的一个途径”,“不论我们怎么‘说’,行为语言永远不能装假。言语的说谎太容易,但要控制你的身体使它说谎,却太难”^{[17](P130)}。郑琼是敏感的,在她的一生中,或与丈夫身处两地,或虽同居一个屋檐下,但丈夫另有所爱,对此,她都心知肚明,她只能“将身体、心理封闭在自己的壳中,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得不到丈夫的爱,会使妻子产生悲观情绪,郑琼也是这样,对此,她的墓志记:

然性本悲怯,每自疑不寿,固云:吾年七岁时,在京城,有以《周易》过门者,先夫人为吾筮之,遇乾之剥,以吾之寿不能过三十。由是以佛道二教,恳苦求助。因衣黄食蔬,三元斋戒,讽《黄庭》《道德经》,余日则以《金刚》《药师》《楞伽》《思益》为常业,日不下数万字。晦朔又以缗钱购禽飞,或沉饭饱鱼腹。以是恳急,因致愁惑。又恶闻哭声。及丕吉口语,常令小儿持笔,题其户牖岩壁之上,为大吉长寿字,每一览之则暂喜,如违客得家信。庚申年,夫人尝得疾,服药未效,因自以《焦氏易林》筮之,遇中孚,既恐惑,因多恶梦,既逾年而终^{[10](P2214)}。

依杨牢所说,郑琼的悲观情绪,主要来自幼时母亲为她卜筮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更来自她对自己寿命的担忧,这或许是诱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得不到丈夫的爱,这从郑琼阅读并以之占卦的《焦氏易林》,就可推断。《焦氏易林》是汉代流传下来的一部《易》学著作,它描写了众多的妇女人物与形象,也展现了这些妇女的情感世界,智宇晖对此的研究显示:

作者为了形象喻示卦象的含义,以现实人生和情感现象作为取喻之源,却不经意中展现了女性丰富的生活世界。在女性的情感领域,她们的等待与孤独成为作者反复表现的一个方面,而缺乏

对幸福快乐层面的关注,这样无意中透露了封建时代女性情感世界的一个主导性特征:无助与无奈^[18]。

这实际就是郑琼婚姻情感的写照,她虽然在庶子童年前,并不知道他及其生母的存在,但以她的敏感,丈夫的心与身的向背,她是完全能够揣测、体会到的,所以,她也是在等待与孤独、无助与无奈中度日的。《焦氏易林》的这种女性观,正契合了郑琼夫妻生活中的悲观感受。

婚姻中第三者的介入,不但会影响妻子的情绪,可能还会损及妻子的健康,致其气郁而罹疾,因唐代的相关医案有阙,我们就选取3个明代医案,来对此进行说明,它们来自明代著名女医谈允贤的医著《女医杂谈》:

病例1:“一妇人年四十三岁,其夫因无子娶一妾,带领出外,妇忧忿成疾。”^{[19](P2-3)}

病例2:“一妇人年五十六岁,得患,嗝气半年,诸药不效,某询其故,云因夫贵娶妾,忧忿成疾。”^{[19](P12)}

病例3:“一夫人年三十二岁,生四胎后,十年不生,因无子,甚是忧闷,某询其故,乃因夫不时宿娼。”^{[19](P13)}

这3位妇女或因丈夫纳妾,或因丈夫眠花宿柳,而“忧忿成疾”。同样的感受,还来自于一位更知名的才女王端淑(1621—1701年),她有一首诗的题目就是《甲申春,予脱簪珥为(夫)簪子纳姬,暱甚,与予反目》,此诗描述了她出资为丈夫纳妾,而丈夫却对聪明可人的陈姬疼爱有加,并与她反目,这使她不但极生郁闷,而且生活在被弃的恐惧与绝望中,“捐弃应知难复旧,徘徊寂寞伴凄风”^[20]。当然,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妾的普遍化与合法化,已使很多嫡妻对此习以为常,并予正面接纳。但以人性的正常反应,妾的存在无疑会对嫡妻造成负面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因人而异、程度有别而已。

再回到郑琼,虽然她对丈夫的别宅妇予以了极大的宽容与不妒,但她的内心感受,或与这4位女子无异。郑琼在33岁的韶华之年就去世了,其或许就是长期忧忿郁结、健康日渐糟糕的结果。我们再举两个唐代的案例:

例1:李頔妻卢氏。李頔,名相李绛次子,卢

夫人虽门第颇高,但父祖为官不显。卢夫人 13 岁出嫁,“嫁二年而寒暑为恙,若心智眩悸,然故常膳由减,步履微艰”^[21],19 岁即离世。卢夫人在婚后身体的迅速转衰,或与李頔之妾章四娘的存在有密切关系,这从卢夫人和章四娘的墓志可以看到。卢夫人的墓志为娘家人所写,而章四娘的墓志则出自李頔之手,“更重要的是,志中有句如‘頔主章氏十有二载,至于情义,两心莫辩。衔涕编录,万不纪一’,十足是恋人的口吻”。陈弱水先生对卢夫人的夭逝,提出过疑问:“卢氏的婚姻可能并不美满,她所谓的身体长期不佳,到后来归返本家,是不是都跟无法与丈夫建立紧密的关系有关?”^[22]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例 2:唐思礼妻王太真。唐思礼在给亡妻所撰的墓志中称,王夫人“幼德敏慧,丽质天成。容止毕修,婉淑有裕”,“善于音律,妙鼓胡琴”,德、

貌、才俱佳,并能极尽为妻之“淑德”,特别是“又有女奴,每许侍余之栉。以己之珍玩之物,俾自选以宠与之,其宽容柔顺卹下如此也”。这种看似不妒的态度,或是因为王太真自己的多年无子,“夫人来归余室,周七年矣。或曰:嗣事甚严,宜有冢子。于是祈拜佛前,志求嫡续”,她最终产下一子,但“不育,夫人方在蓐中,而伤惜之情,不觉涕下。三更,夫人无疾,冥然而终于河中府官舍”。在她去世时,有庶出的“一男曰丑汉,今七岁,一女曰遂娘,始三岁”^[23]。在王太真婚姻生活的 7 年中,长时间面对的是自己的无子和“女奴”的得宠与产育,王夫人原本“依归佛”,她或也以这种方式寻求精神和情感的解脱,但最终还是 23 岁,因产子问题“忧忿成疾”而终。

最后还有郑琼的妯娌杜綰。我们也依杨宇和杜綰的墓志,揣度一下他们的婚姻生活^⑨:

表 2 杨宇和杜綰的主要生平年代(以虚岁计)

	杜綰	杨宇
生年	元和十一年(817 年)	元和二年(807 年)
进士及第		太和八年(834 年),28 岁
婚年	开成四年(839 年),23 岁	开成四年(839 年),33 岁
婚姻存续期	4 年	开成四年(839 年)至会昌三年(843 年)
卒年	会昌三年(843 年)二月,27 岁	大中五年(851 年)八月,45 岁
夫妻年龄差	10 岁	
夫妻卒年差	夫晚于妻去世 8 年	

杜綰于开成四年(839 年)、23 岁时嫁给杨宇,会昌三年(843 年)27 岁去世,生一女周,时年两岁;杨宇大中五年(851 年)去世,此女 10 岁,同时,“他出二男,长者甚愚不可齿。次曰阿门,性仁敏,九岁临丧,有哀节”^{[9](P2295)},如此,这位长男至少已有 10 岁或以上了。由此看,杜綰婚姻中的人际关系也同样复杂,她与丈夫的情感中间,同样有第三者的存在。而这样的夫妻关系,或也促使她与本家的关系一直很亲近,在杨宇为妻子撰写的墓志中,仅有 60 字来形容杜綰的为妇、为媳、为母之德,但却有 131 字来描述她与本家父母的至亲关系,在杜綰成婚后的生活中,本家与夫家孰轻孰重,从这里就可见一斑。

作为娣姒的郑琼和杜綰,生活中交集的时间并不长,杜綰于开成四年(839 年)与杨宇结婚,进入杨家,而郑琼在两年后的会昌元年(841 年)就

去世了。虽然如此,两娣姒应当是有所交往的。按,郑琼于会昌元年逝于东都康俗里,两年后,杜綰终于洛阳的尊贤里,在两位女子生命的最后阶段,都生活在东都洛阳,她们并未阖族共居,但两家的距离并不远,康俗里与尊贤里都位于洛阳城南,康俗里居定鼎门街东第四街从南第二坊,尊贤里则在长夏门东第二街从南第二坊,两坊间仅隔另两坊。另外,在郑琼去世时,杨牢的母亲也在东都,“(长女)李方九岁,枕其尸,哭绝良久,有如天成。祖母怜其哀,恐至毁灭,遂命置他室”^{[10](P2214)},杨牢的母亲或许是在儿媳去世时,暂往杨牢家协助处理丧事的,平时还是跟随次子杨宇生活,也就是杨牢诗中所说的,“尔养晨昏我远游”。婆母在,儿媳定当按时前往问安,所以,婆母在杨宇家时,郑琼自当前往。这样,婚姻并不幸福的郑琼、杜綰两娣姒,或许会对自己的婚

姻感受有一些交流,也以此暂时排解一下心中的郁结。

五、赘语

在《论缠足的起源》一文中,高彦颐先生就文化史的特点指出:“文化史并不仅是引入新的课题或拓展史料;它更是转变历史的目的和历史学家的自我认知。文化史并非是对历史真理和确定性的研究,它更多的是在于解释和商讨的过程:在文字和实物,现在和过去,历史学家和历史话题之间。对于缠足起源的探讨,与对其他历史话题的研究一样,它的最终分析是为了探讨未知的和不可知的。”^[24] 本文就是循着文化史的这一思路撰写的,特别是对男性书写与女性体验之间的缕析,以不同时期妇女同理心所作的分析,都是本文所作的尝试。笔者希望通过对郑琼情感世界的分析,提出一种在女性史料缺失时,考察妇女自我感受的路径。文中所作的探讨不是结论,只是就这个问题所作的一种解释和商讨而已。

注释:

- ① 特别感谢“中国古代社会性别史原典选读”一课的所有老师与同学,特别是张绍峰和段舒扬两位同学。
- ② 在琼·斯科特提出的社会性别理论的第一命题中,四个构成之一就是“主观认同”,她强调,“历史学家们应该研究性别认同内容构成的方式”(《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刘梦译,载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68-169页)。
- ③ 像著名的《女论语》,对其争论就极多。参见拙著《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6-108页。
- ④ 所谓“同理心(empathy)”,是指一个客体人性化的过程,即感觉我们自己进入别的东西的过程,又叫做换位思考、神入、共情,指站在对方立场设身处地思考的一种方式。
- ⑤ 目前对郑琼、杨牢夫妇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生平和文学成就。参见周晓薇的《杨牢进士及第年分辨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第41页;王七一、周晓薇的《唐代书目补遗二十四种》,《渭南师专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1期,第44-45页;胡可先的《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第47-59页;顾纪忠的《杨牢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第39-40页;张海燕的《唐荥阳郑琼墓志释文校

补》,载邓章应主编的《学行堂语言文字论丛》第4辑,2014年,第201-214页;曹圆的《唐代诗人墓志丛考》第二章第二节,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40-41页。

- ⑥ 传统史料记杨牢于18岁进士及第,据周晓薇的辨证,其当是虚岁二十八岁中第。见周文《杨牢进士及第年分辨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第41页。
- ⑦ 以下对郑琼墓志的引用,参考了张海燕的《唐荥阳郑琼墓志释文校补》一文。
- ⑧ 本表主要依据郑琼和杨牢夫妻墓志的记载,并加以推算而成。
- ⑨ 唐代科举放榜时间一般在二月,但也有早到正月、晚到三月的情况。参见吴宗国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 ⑩ 以上部分参考了王力平的《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68-172页。
- ⑪ 参见蒋爱花的《唐代家庭人口辑考——以墓志铭资料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146页。
- ⑫ 参见张瑞华的《唐代妇女的生育研究——以墓志资料为研究中心》第二章,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8-13页;蒋爱花的《唐代家庭人口辑考——以墓志铭资料为中心》,第145-149页。
- ⑬ 卢公墓志铭记:“公何不幸,独受天罚,身歿无嗣,人□主丧”(《唐代墓志汇编》,第1935页);窦夫人也是“殁于韶岁,有女无男,虽闻哭泣之声,而无丧祭之主,此又痛中别有痛”(《唐代墓志汇编》,第1630页)。
- ⑭ 本表主要依据杜綯和杨宇夫妻墓志的记载并加以推算而成。

参考文献:

- [1] 孙康宜.老领域中的新视野——西方性别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探索和突破[A].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959.
- [2] Alf Ludtke. Introduction[A].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C]. New Jersey: Princed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VIII.
- [3] 薛巍.小数据的挖掘方法[J].三联生活周刊,2017,(17):148-149.
- [4]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A].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C].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7.171.
- [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91.

- [6] 全唐诗(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99.6599.
- [7] 王诤. 唐语林[M]. 周勋初,校证.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8] 李绂. 唐故河南府河南县令赐绯鱼袋弘农杨公(松年)墓志铭并序[A]. 周绍良. 唐代墓志汇编[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9] 杨牢. 唐故文林郎国子助教杨君墓志铭[A]. 周绍良. 唐代墓志汇编[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0] 杨牢. 荥阳郑夫人墓志铭[A]. 周绍良. 唐代墓志汇编[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1] 韩愈. 息国夫人墓志铭[A]. 韩愈,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 韩昌黎文集校注[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484-485.
- [12] 赖瑞和. 唐代基层文官[M]. 北京:中华书局,2008.10.
- [13] 黄正建. 唐代“别宅妇”现象小考[A]. 邓小南. 唐宋女性与社会[C].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253,259.
- [14] 仁井田陞. 唐令拾遗[M]. 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661.
- [15] 长孙无忌,等. 唐律疏议[M]. 刘俊文,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6] 陈尚君. 唐代的亡妻与亡妾墓志[J]. 中华文史论丛,2006,(2):55.
- [17] 柏桦. 夫妻心理学[M]. 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
- [18] 智宇晖.《焦氏易林》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J]. 齐鲁学刊,2012,(4):111-114.
- [19] 谈允贤. 女医杂言[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
- [20] 王端淑. 映然子吟红集[M]. 清刻本.42.
- [21] 周绍良,赵超.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12.
- [22] 陈弱水. 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53.
- [23] 唐思礼. 亡妻太原王夫人墓志铭[A]. 吴钢.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C].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250.
- [24] Dorothy Ko. *Search Footbinding's Origins*[A]. 邓小南. 唐宋女性与社会[C].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409.

Women's Self – Perception: Zheng Qiong and Yang Lao's Conjugal Feelings and Marital Life

LI Zhi-she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elf – perception is important content in Gender theory and a useful tool to measure women's marital feelings. The research of women's self – perception might change fixed views of some historical topics. Acquisition of women's self – perception often comes from female writings. However, women rarely wrote in the T'ang Dynasty, thus leaving us some documents hard to tell real or faked. Therefore, women's self – perception is a tricky area in women's studies of the T'ang period because of scarce materials. The article chooses a couple Yang Lao and Zheng Qiong to analyze their marital feelings, especially Zheng Qiong's psychology and feelings. The article would like to provide a new method for studying women's self – perception when female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scarce. The discussion is less a certain conclusion than an interpretation or proposition from a cultur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self – perception; female documents; empathy; cultural history; conjugal feelings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妇女史研究 ·

《山东省志·妇女团体志》 编写视域下山东妇女发展研究

田梅英,王域霞,窦艳秋

(山东女子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摘 要:基于《山东省志·妇女团体志》编纂的视角,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透析 1995~2005 年山东妇女的发展。10 年间,山东妇女参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不断提高,参与决策与管理的队伍不断壮大,受教育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保障,妇女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妇女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妇女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山东妇女发展的原因和经验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全心全意为妇女群众服务、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推动妇女工作社会化、民主化和法制化,以男女平等作为妇女工作的基本宗旨、以提高妇女素质为长期战略任务,妇联组织拥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妇女工作新路子。解决妇女发展中的不足,需从重点、难点问题入手,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和教育,强化政府的主体责任和妇联的自身建设,进一步唤起妇女内心深处的主体意识。

关键词:《山东省志·妇女团体志》;山东妇女发展;经济社会;妇联组织;男女平等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62-07

1995~2005 年,沐浴着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妇女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本文将基于《山东省志·妇女团体志》编纂的视域,对 10 年间山东妇女发展作一浅显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并得到广大妇女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一、山东妇女的发展

(一)参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不断提高

妇女的经济地位直接制约着妇女在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婚姻、家庭、法律中的地位,从而成为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在社会地位

诸要素中居于关键性的核心位置。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劳动、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10 年间,妇女参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深度及广度不断提高,妇女就业再就业机会逐年增加。2005 年,山东省全社会从业女性 2650.1 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 46.3%,比 1995 年增加 589.3 万人,其中城镇单位从业女性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比例比 1995 年提高了 2.1 个百分点^①。通过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实现再就业的女性为 70.5 万人。山东省表彰“全省就业再就业

收稿日期:2017-07-10

基金项目:山东省妇联妇女/性别研究课题“1995—2005 年《山东省志·妇女团体志》编写视域下山东妇女运动研究”(项目编号:2016SDWR15)

作者简介:田梅英(1963—),女,山东女子学院基础部教授,主要从事近代女子教育、儒家文化与山东女性、女大学生思想教育研究;王域霞(1977—),女,山东女子学院基础部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窦艳秋(1966—),女,山东女子学院基础部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家庭教育研究。

优秀个人”,其中女性占52.2%。妇女就业层次提高。女性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比1995年提高了7.1个百分点,就业层次提高。以女性为主的个体工商户61万,占全省个体工商户的35%,女民营企业企业家12万多人,占企业家总数的19.6%。众多女企业家脱颖而出,科、教、文、卫、金融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女性从业人数上升,一大批知识女性跻身于高科技领域和新兴产业。山东是农业大省,农业总产值名列全国第一,妇女占农村劳动力的65%,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主力军。2004年全省转移农村女性劳动力59.8万人,占劳动力转移总人数的46%。以妇女为主创办的农业龙头企业329家,市级以上“妇字号”龙头企业115家,其中省级以上的23家。国家级“三八绿色优质工程”9个、省级60个、市级73个。全省80070名女性从事草柳编加工和风筝、年画等传统文化产品制作;在粮食、蔬菜、畜牧、林果、水产、花卉、中药材、茶叶等各大主导产业中,妇女是从业人员的骨干力量;在商贸、流通、旅游、服务业等领域,妇女发挥着重要作用,女经济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二)参与决策与管理的队伍不断壮大

妇女参政议政作用与妇女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争取与男性平等参与政治生活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2004年底,山东省各级党政机关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比例比1995年提高了4.47个百分点。地(厅)、县(处)级女干部占同级干部总数的比例分别比1995年提高了4.08和7.92个百分点。省、市、县(市、区)、乡镇党委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备率分别比1995年提高了100、59、33和48个百分点。市、县、乡三级政府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备率分别比1995年提高了12、46和5个百分点。省、市、县三级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备率分别比1995年提高了28.2、15和5.6个百分点。妇女参政议政水平提高。省、市、县(市、区)人大女代表所占比例分别为20.55%、21.6%、23.34%;政协女委员所占比例分别为16.33%、20.63%、20%~35%。208个乡镇由女性担任书记或乡长。农村妇女进“两委”的比例达到73.4%。2004年全省村级换届精减村官11万人,但女村官却增加了5000人。女党员数量增加,2004年年底全省女党员占党员

总数的比例比1995年提高了17.02个百分点。广大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决策及管理的范围明显扩大,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意识显著提高。

(三)受教育权利进一步得到保障

教育对妇女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可使女性获得职业上的社会资格和认定,而且不断改变着妇女的社会角色,影响着女性的生活质量。增加女性教育的机会,是促进女性综合素质提高,参与社会生产和社会决策的重要条件。10年来,山东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全省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2004年,山东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9年,比1995年增加1.1年。女性接受义务教育基本得到保障,性别差异基本消除。全省小学适龄女童净入学率达到99.93%,女生初中三年巩固率为99.32%。初中升高中段比例达到7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2005年,全省普通高中在校生达到196.58万人,女生占45.21%。普通高校在校生117.13万人,女生548188人,占46.84%,比1995年提高8.98个百分点,总数居全国第一。研究生在校生数36818人,女生占48.71%,比1995年提高14.54个百分点。成人中等、高等学校接受教育的女生人数分别占在校生总数的48.74%和53.67%,职业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在校女生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比1995年提高2.18个百分点;通过“春蕾计划”全省募捐3500多万元,建起17所春蕾小学和39个春蕾班,资助12.5万余人次的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城乡妇女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广为普及。2005年,800多万名农村妇女接受农业新技术和标准化知识培训;3.8万余名妇女接受上网知识培训;31万余名妇女获农民技术职称,比1995年增加27万余名;300多名妇女被外聘传授技术,8500多名妇女被聘为科技副乡镇长、村委副主任。

(四)妇女健康状况持续改善

妇女是人类自身生产及抚育后代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妇女的健康权曾是妇女解放的主要目标,妇女健康是健康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10年来,山东妇幼卫生经费支出逐年增加,妇女卫生保健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妇女平均预期寿命明显提高。2004年,全省妇幼卫生经费支

出 7811 万元,比 1995 年增加 2051 万元。全省县级以上妇幼保健机构 166 所,80% 的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完成了无危房,以及人员、设备、房屋三配套的“一无三配套”建设,各级综合医院都设有妇产科,乡镇卫生院都配备妇幼保健专业人员,妇女卫生服务网络建设进一步加强。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妇女平均期望寿命为 75.99 岁,比男性高 4.98 岁,比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 3.66 岁。孕产妇安全分娩率不断上升。2004 年,全省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住院分娩率分别比 1995 年提高 8.36、11.32 个百分点。孕产妇死亡率比 1995 年降低 29.3%,孕妇产前医学检查率达 96.92%,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 98.65%。

(五)妇女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消除歧视、虐待、残害妇女的社会现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女性地位的根本体现之一是通过立法来确定和赋予妇女权利,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制不断健全。山东省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逐步建立完善起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内的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体系及法律援助体系。省、市、县、乡建立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站)679 个,妇女法律服务热线 309 个,妇女维权法庭、合议庭 138 个,家暴致伤鉴定中心、家暴报警服务中心 422 个,家暴庇护所 14 所。生育保险社会统筹覆盖面增大。2004 年底,全省 17 个市、115 个县(市、区)实行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参加统筹职工 390.8 万人,比 1995 年增加 270.2 万人,其中参加生育保险的女性人数达到 164.1 万人,占参加生育保险职工总数的 42%。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权益基本得到维护。2004 年,全省各级认真贯彻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加大对违反女职工特殊保护规定案件查处力度,促进有关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全省 84.3% 的企业认真执行女职工“四期劳动保护”规定。妇女劳动就业和获得经济资源的平等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妇女人身权利进一步得到保障。侵害妇女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受到严厉打击,强奸、拐卖妇女案件比 1995 年大幅度减少,社会丑恶现象受到明显的遏制;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其依法维权的意识

和能力有较大提高,有效预防了家庭暴力案件的发生。

(六)妇女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1. 促进妇女发展的工作环境不断改善。山东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妇女工作,把促进妇女发展作为实践“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将妇女发展目标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程,纳入各有关部门的职能范围,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切实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加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建设,建立健全了会议协调、目标责任、示范管理、监测评估、表彰激励等工作制度,初步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妇女工作管理机制。各级人大、政协积极发挥监督作用,定期视察、检查《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山东妇女发展纲要》执行情况。各有关部门把推动妇女事业发展列入本部门重要职责,在确定工作计划、制定政策措施、检验工作成果的过程中,认真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各方面为妇女事业发展提供支持。全省形成党委政府领导,人大政协监督,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共同推进妇女发展工作的新格局,为妇女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促进妇女发展的法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各级、各有关部门重视制定出台法规政策,依法维护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家庭等方面的权益,为促进妇女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山东省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妇女工作的意见》。省政府先后于 1995 年和 2001 年两次颁布实施 1995~2000 年和 2001~2010 年《山东妇女发展纲要》。省委、省政府制定下发了《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省人大出台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等专项法规,《山东省生育保险办法》已列入 2005 年立法计划。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在制定下发的《山东省就业促进条例》《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办法》《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发展党员工作意见》等法规政策中,对维护妇女就业、土地承包、卫生保健、参与

决策与管理等方面的权益作出了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多次联合下发促进妇女就业再就业、农村妇女科技培训、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妇女病防治等的工作意见,就妇女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制定政策措施。2004年全省妇女儿童工作会议提出,2005年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为妇女儿童至少办10件实事。目前,全省有16个市及大部分县(市、区)研究确定了本地为妇女儿童要办的10件实事,并逐步明确责任部门和完成期限,其中8个市以市委文件制定下发10件实事方案。

3. 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社会舆论环境逐步形成。山东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妇女发展舆论环境建设。省委、省政府举行“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报告会,邀请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作专题报告,时省委书记张高丽等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及省直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听取了报告。各级通过举行报告会、发表电视讲话、撰写署名文章等形式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将《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纳入全民普法规划。各级各有关部门重视营造妇女发展的舆论氛围,根据职能,结合业务,加强宣传。各级宣传、文化、新闻、出版等部门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妇女发展纲要、相关法律法规等列入宣传计划,刊发文章、开设专栏、制作专题,广泛宣传。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党校、省妇联等部门和组织联合下发文件,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各级党校教学内容。广泛开展宣传培训活动,连续多年开展妇女发展纲要宣传月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理论研讨活动;全省各级层层举办培训班,加强对各级党政领导和妇儿工委成员的培训,培训全省县(市、区)妇儿工委主任、市妇儿工委成员1000多人次,增强各级做好妇女工作的责任感。全社会关心尊重妇女、重视支持妇女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浓厚。

4. 妇女生存生活环境进一步优化。2005年,山东省实现生产总值(GDP)18468亿元,比上年增长15.2%,位居全国第2位。财政总收入3342亿元,比上年增长24.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744.8元,比上年增长13.8%,农民人均纯收入3930.6元,比上年增长12.1%。强

大的地方经济及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为妇女的进步和成长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厚的物质条件。各级积极组织动员城乡妇女参与文明城市、文明乡镇(社区)、文明村庄建设,广泛开展“五好文明家庭”“美在家庭”“平安家庭”“和谐家庭”等创建活动,引导妇女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立平等、文明、和睦、稳定的新型人际关系。围绕“大而强,富而美”的社会主义新山东建设,大力推进生态省建设,山东省妇女生存生活质量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

二、山东妇女发展的成因和经验

第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广大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妇女发展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毫不动摇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妇女工作全局,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政所急、妇女所需、妇联所能的交汇点上,结合妇联性质与职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为妇女群众谋利益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结合,让广大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实惠和进步。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妇女工作融入党的事业大局,以党的主张作为妇女发展的时代主题,转化为广大妇女的自觉追求和实际行动,运用具有吸引力、凝聚力的活动载体,动员妇女全面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才能有效地推动妇女实现自身的解放与发展,也使山东省广大妇女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

第二,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中心内容,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加快发展,是山东省工作的大局,也是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妇女是一支蕴含着巨大智慧和潜能的人力资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广大妇女的广泛参与和自觉奋斗,同样,妇女也只有在参与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经济参与是妇女参与社会的前提,参与经济发展是妇女不断解放的根本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动员和团结广大妇女参与经济发展,是妇联组织在全局工作中的定位和

方向。

第三,坚持全心全意为妇女群众服务,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是妇女工作的基本宗旨。代表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是妇联的基本职能,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与一切轻视、歧视和侵害妇女儿童的现象作斗争,实现法律规定的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家庭生活中的各项平等权利,是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现,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妇女解放运动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时刻把妇女群众所需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妇女工作才能得到广大妇女的拥护和参与,才能焕发生机和活力。

第四,妇女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只有加大协调力度,积极争取社会力量,共同推进妇女事业,开创社会化工作格局,才能使妇女发展的路越走越宽广。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时代,只有推动保障妇女权益的立法、执法、监督工作,把维护妇女权益纳入民主化、法制化轨道,才能有效地推动法律上的男女平等成为社会现实。

第五,提高妇女素质,是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长期的战略任务。妇女解放的程度取决于妇女自身的素质。提高妇女素质,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乃是妇女解放运动最根本的宗旨。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素质得到全面提高,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女性的整体素质与时代的要求仍存有距离,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妇女自身权益的实现和男女平等的进程。山东省各级妇联把提高妇女素质置于突出的战略地位,以培养“四有”“四自”女性为目标,常抓不懈,为促进女性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妇联组织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是推动妇女发展的重要组织保证。作为党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妇联适应变化的社会形势和妇女需求,以党建带妇建,充分发挥参与、教育、代表、服务、联谊的职能,转变工作作风,强化服务意识,真正把妇女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基本尺度,广大妇联干部顾大局、讲团结、求奋进的团结精神,勤于实践、勇于探索、超越自我的创新精神,负重进取、

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以及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争创一流的良好氛围,多渠道多方式组织引导山东妇女投身于经济社会建设,把妇女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最广大的妇女群众之中,使妇联组织富于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妇女运动于生动活泼中促进着妇女的进步和成长。

第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妇女工作新路子。在新形势下妇女工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各级妇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冲破固有的模式和思维定势,以创新、创业、创造精神去开创妇女运动新纪元。突出贡献重点,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机制,使山东省多项妇女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山东省的“三大网络”“大姐”就业创业服务机构、“美在家庭”“巾帼文明队”工作,拥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山东省妇联的工作品牌,极大地促进了妇女运动不断深入向前发展。

三、山东妇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由于受社会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改革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妇女发展中还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妇女就业再就业难度大;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在一些地方还得不到落实;妇女“四期”特殊劳动保护规定在有些民营企业没有落实;城镇职工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工作进展不平衡;婚前医学检查率比1995年下滑;性病、艾滋病的蔓延成为威胁妇女健康的隐患;部分乡镇卫生院产科设施比较落后,农村医疗水平较低,制约农村妇女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等。上述问题是山东省妇女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也需要在发展中解决;需要党和政府及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更需要妇女自身持续不断的努力。

(一)以《山东妇女发展纲要》为抓手,致力于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山东妇女发展纲要》涉及到妇女与经济、参政、教育、健康、法律、环境六大领域,是指导和推动山东省妇女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00年,山东省已完成实施1995~2000年《山东妇女发展纲要》的任务,2005年正在进行2001~2010年《山东妇女发展纲要》的中期评估。肯定成绩,正视不足,以《山东妇女发展纲要》为抓手,强化相关部门的责任意识,以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为重

点,重视解决女性就业问题,强化对城乡妇女就业、创业技能培训、择业指导和服务,有计划地开发适合女性就业的岗位,为下岗失业妇女提供就业帮助,促进妇女广泛而深入地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强对女职工劳动保护的监督检查,特别是“三资”、民营企业中的女职工劳动保护。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加强对已实行生育保险统筹地区的规范化管理。加强妇儿工委及其办公室的建设,建立起更好地适应新情况新问题的宣传与工作机制,引导群众自觉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完善相关的法规政策,加大资金投入,统筹城乡妇女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向着家庭式迁移发展,确保促进妇女发展的法规政策落到实处。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加强调查和妇女理论研究,力争形成一大批情况详实、分析透彻、建议可行的调查研究成果,为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符合实际又具有前瞻意义的参考依据。

(二)深化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优化妇女发展环境

男女平等是妇女解放与发展的核心概念,尽管受社会背景和妇女运动状况不同的影响,男女平等概念的涵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的内容为:在承认男女两性生理差异的前提下实现性别平等,而不是男女都一样;女性承担着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特殊任务,有着与男性不同的生理特点,不能用男性的价值尺度要求女性,女性有适合自身特点的事业和工作,并且在某些方面比男性做得更出色;男女两性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女性不是被束缚的对象,男性也不是妇女解放的对立面,要在合作互助中和谐发展。妇女解放从女性做独立的社会人过有尊严的生活开始,到与男性建立和谐互助、平等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止。受历史传统以及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不良社会风气和错误思潮的影响,现实中男尊女卑、性别差异的现象依然存在;在经历了男尊女卑和男女平等绝对化的偏差后,社会及个人对男女平等观念还存在多种误区和盲点。要继续深化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任重而道远。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党校、高校,切实将其纳入各级党校、高校教学内容,强化各级领导干部和社会各方面的国策意识;加强妇女解放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研究,推

动高等院校女性学学科建设,培养女性学和社会性别研究专业人才;加强宣传培训,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准确把握妇女发展中的重点任务,增强性别意识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优势,净化社会空气,弘扬先进性别文化,理清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质与内涵,使社会及妇女自身正确认识女性价值,为消除性别歧视营造健康向上的外部环境。

(三)强化政府的主体责任,提高妇联的工作水平

妇女解放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目标之一,没有社会的进步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和发展,反之亦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解放妇女,国家是主导,政府是责任主体。新中国成立后把男女平等写入宪法,中国政府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把男女平等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把妇女发展的主要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规划的实施作为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切实加强领导。把规划实施情况纳入省及各级政府督查范畴,将事关妇女事业发展的重点指标纳入科学发展综合考核体系,纳入各部门各单位工作考核内容,层层落实责任,定期检查考核,确保规划顺利实施。把男女平等体现在法律、政策、部署工作的各个环节,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全方面,确保发展惠及千千万万个山东妇女。妇联是妇女运动的引领者。各级妇联应不断提高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走出机关、走向基层,沉下身子,拓宽工作渠道,创新工作手段,用科学务实的态度看最真实的情况、听最真实的声音,根据不同妇女群体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妇女群众工作,代表好、服务好不同群体、不同层次妇女的利益和诉求,帮助广大妇女排忧解难,让妇女工作常做常新、充满活力,进一步提升妇联工作的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不断开创妇女事业的新局面,也让妇联成为山东省妇女发展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

(四)唤醒妇女的主体意识

妇女解放和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妇女自己。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妇女解放的内涵包括3个方面:妇女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

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自身压抑中解放出来。这3个方面既有对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等外部环境和条件的规定,也有对妇女自身条件的要求,只有把内外部条件结合起来,才能使妇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在儒家文化的熏陶及圣人精神的感召下,山东女性崇德重义、中规中矩、勤劳节俭、吃苦耐劳、善良忠诚,以大局为重,社稷情怀始终如一,但山东女性也是全国女性最为保守、传统、中正的一个群体,犹如中华民族的长女,守成有余,创新不足,拙于开拓和引领,长于适应和执行。女性的藤蔓意识、夫贵妻荣思想与男性的好汉情结、官本位的价值追求并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各利益群体分化、竞争激烈、妇女面临诸多新挑战的背景下,这极大地

制约着女性潜能的发挥,锈蚀着女性的进取和创新意识,窄化了女性的发展空间,也压抑着男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影响着男女两性的和谐和经济社会的和谐。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山东女性需要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唤醒内心深处的主体意识,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男女平等的理念,树立起终身教育的理念,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中赢得尊严,实现自我,为山东经济社会的更快更好发展创造新辉煌、拥抱新精彩!

注释:

① 该文所有数据均来自《山东省志·妇女团体志》,拟于2017年年底出版。

Study of Women's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Examined with the Editing of *Shandong Provincial Annals: Women's Collective Records*

TIAN Mei-ying, WANG Yu-xia, DOU Yan-qi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diting of *Shandong Provincial Annals: Women's Collective Records*, with the Marxist theories on wome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1995 to 2005. During this decade, women in Shandong involved mor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ticipated more in decision-making and management; their rights for education are protected, health conditions improved, and their other legal rights are protected. In all, women were developing in more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Reasons for the above achievements include upholding the leadership of CPC, focus on development, supporting women in all aspects, persistent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promoting women's cause in a social, democratic and legal perspective.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should be the fundamental rule,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whole quality should be the long-term strategy, women's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authoritative, and open-mindedness and respect for truth are also important. Defects in women's movement should be tackled accordingly as well. Among others, teaching of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strengthen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and women's federation, awakening of women's subjectivity are a few essential measures.

Key words: *Shandong Provincial Annals: Women's Collective Records*; Shandong women's develop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women's development;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责任编辑 赵莉萍)

论《列女传》的刻印和传播

靳 力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宋元明清时期,《列女传》的刻印呈现出官、私两旺的盛况。从刻印的主体来看,有官府和私人两种类型;从刻印的内容与形式来说,有插图本、纯文字本与增删本等;从刻印的国别划分,有中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刊本;从流布的形式而言,有刊印《列女传》的单行本与被类书、旧注称引者;另外,还有对《列女传》补注、校注、集注等研究著述的刊行。而就传播来看,多样化的传播路径,广袤的传播范围,多重性的传播效果,极大地增强了《列女传》的传播力,使之不仅畅行全国,而且还远播域外。《列女传》的刊印与传播互为依托与因果,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效果明显,对当时民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而切实的影响。

关键词:《列女传》;版本;刻印;传播;图书;出版业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69-06

西汉刘向“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1](P1957)]编次而成的《列女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反映妇女生活的历史故事集。该书的编撰,主要针对元、成之际,外戚擅权、后妃逾礼的社会现实,根本目的在于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礼制。刘向所倡导的礼制思想、女性教化理念,在《列女传》这部将女性德行与国家兴衰治乱相关联的著述中,得到很好的阐释。由此,《列女传》因契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为“化民成俗”、影响深远的女教典籍。而在体制上,《列女传》的文本极似史书,真实性辅以故事性使之在形式上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与《列女颂》《列女图》一并构成了严谨而完善的传播体系,在当时的传播条件下达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2]。早在西汉末年,《列女传》一书已流传至

边郡,就是很好的例证^[3]。其后,为《列女传》作注、颂、图者,代不乏人。例如,东汉的班昭、马融等曾为之作注。又如,据《隋书·经籍志》载,三国时期的曹植,曾为之作颂——“《列女传颂》一卷。”其注曰:“曹植撰。”^[4](P978)]再如,东晋的著名画家顾恺之为《列女传》作图。凡此种种,无疑都极大地增强了《列女传》的传播力。尽管如此,在隋、唐之前的抄本时代,图书的复本制作周期较长,成本很高,这就使《列女传》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上述自东汉到魏晋所作《列女传》的注、颂、图,今皆佚,就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直到雕版印刷技术较为成熟的宋代,这种状况才得到根本改观。《列女传》被广泛刻印,流传甚广,已成为民众,特别是妇女的必读之书。现仅就《列女传》刻印与传播等问题,叙论如下。

收稿日期:2017-06-30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古代图书市场与儒家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1BLSJ01)

作者简介:靳力(1968—),女,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献学、出版文化研究。

一、《列女传》的刻印

(一)官、私刻印的《列女传》

宋代以降,刻书活动的经营者主要包括官府和私人两种,私人刻书又分家刻与坊刻两种类型。明代官刻的《列女传》主要有以下几种。据明代周弘祖所撰的《古今书刻》所载,明朝中期,南直隶苏州府和江西临江府均刻印了《列女传》。另据明代徐图的《行人司重刻书目》所载,行人司于万历年间刻印了《列女传》。此外,据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载,明朝正德年间刊行六卷本刘向的《古列女传》。由该书作序者为辽州知州与汝州知州,推测此《古列女传》应为官刻之书。清朝后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为重振儒学,由曾国藩倡导,始建江南官刻书局。其后,各省纷纷效仿,湖北武昌设有崇文书局。出于“维世道”“正人心”等目的,崇文书局刊刻了《列女传》。

明清时期私家刻书风气甚盛,大多集中于富饶且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如江浙一带。许多刻书家,如清代的鲍廷博、顾广圻、阮元等,都是藏书家,因藏书而提倡刻书,在刻印《列女传》方面贡献良多。明朝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黄鲁曾所刻印的刘向《古列女传》七卷、续一卷,被收入《汉唐三传》,故又称为《汉唐三传》本,影响较大。明末太仓张溥就是根据此本,于崇祯年间重校刊行《古列女传》。明代徽州的黄嘉育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刊刻刘向的《列女传》,为私人刻书中的精品。鲍廷博以业商致富,致力于藏书与刻书,所刻《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收书207种,内容广泛,校刊精良,世誉善本。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鲍廷博得到万历年间汪氏增辑的《列女传》十六卷,重印此本,为知不足斋印本。顾之逵好藏书,家多宋元善本,为吴中乾嘉时期四大藏书家之一^[5]。他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得到建安余氏《列女传》之内殿本后,于嘉庆元年(1796年),请其弟顾广圻整理刊印。顾广圻喜校书,所刻印的小读书堆本《列女传》为难得之精品。这由后人对《列女传》注释、校勘多选用此本作为底本可见一斑。阮元精通经学,长于考证,家有文选楼,小琅嬛仙馆藏书、金石甚富。道光五年(1825年),其子阮福按照南宋余仁仲勤有堂

《古列女传》行格图画影摹刊行,为《列女传》小琅嬛仙馆本,又称“文选楼丛书”本,简称“阮本”。

坊刻是以刻印图书为主营业务,以获取利润为终极目的,极具鲜明商业特性的图书出版业^[6]。《列女传》因受众众多,社会需求量大,易获利,而成为坊刻业主乐于刻印的图书。早在宋代,福建建安余氏就以刊书为业,世代经营,历时700余年^{[7](P293)}。传世的《列女传》刻本就是以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为最古^[8]。明代坊刻业最发达、最集中的是南京、杭州、福建建宁府建阳县等地,均有《列女传》的刊刻、重刊、重印。明代南京的书坊在全国城市中位列首位,于万历年间达到鼎盛期。其中,以唐姓十五家为冠,刻书数量也最多^[9]。唐锦池文林阁重印了黄嘉育的《古列女传》。明代杭州书坊刻书最多的是胡文焕的文会堂。据记载,胡文焕刻印的图书达450多种,其中就有以黄嘉育本为底本略加改进模仿翻刻的《列女传》。福建北部的建阳县是我国古代印刷的重镇,到明朝嘉靖年间已成为当时全国印刷业的中心。《古今书刻》著录明朝中叶建宁府书坊刊刻《列女传》一种,《(嘉靖)建阳县志·书坊书目》著录坊刻《列女传》一种。至清代,《列女传》仍然是各地书坊刻印的书目。有印刷传统的地区自不待言,就连地处闽西山区的福建四堡也加以刻印。现在确有具体记载或见实物的,四堡书坊共刻印图书489种,马益保的翼经堂、邹步蟾经营的堂号为云深处的刻书坊均刻印了《列女传》^{[7](P316-339)}。

(二)形式与内容各异的《列女传》

《列女传》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据《汉书·楚元王传》载,《列女传》的篇数为八篇,包括传七篇、颂一篇。班昭注《列女传》,分传每篇为上下,合颂成十五卷。其后,《列女传》十五卷本流行,原八卷本渐佚。北宋嘉佑年间,集贤校理苏颂、长乐人王回对《列女传》先后进行整理,将全书删为八篇,包括七篇传、一篇颂,称《古列女传》。属后人掺入的二十传,以时相次,号《续列女传》。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武夷人蔡驥在苏、王定本的基础上,整理刊刻《列女传》,题《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或通题八

卷^[10]。现在所见各种刻本的《列女传》都由此而来,只不过在各种心态作用及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出现的形式与内容不同罢了。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其后随文注曰:“《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1](P1727)}。由此可知,刘向编撰的《列女传》分传、颂、图三部分。插图配画既可增强读物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使空洞的说教变得生动形象,又符合我国古代读书左图右史的传统。《后汉书·皇后纪》载顺烈皇后小时候好史书,“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11]。可见《列女传》的价值观已随列女图等的流传,开始深入人心。宋代福建刻书的版画水平很高,形成了粗犷古朴的建安派画风。建安余氏作为坊刻业主,为追求利润,便附以列女插图,并署名“晋大司马顾恺之图画”,以迎合读者崇古心理,使《列女传》更为畅销。明代图书多以精美的插图吸引读者。许多刻印图书者,特别是坊刻业主都争相聘请技艺高超的图版雕刻能手,并让知名画家为图版起稿画样。于是,多种插图本的《列女传》在赫然冠以“全像”等字样的形式下应运而生。例如,南京唐富春的富春堂刊刻了《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万历十五年(1587年),藏书家茅坤又增补了唐富春刊的《列女传》。又如,万历年间的汪氏增辑《列女传》十六卷,号称风俗画家仇英为之绘画,刻工讲究,为精致婉丽、气韵生动、刀法精细徽派名版。再如,黄嘉育与唐锦池刊刻的《古列女传》,插图精美,似出仇英一派手笔^[12]。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七》中尝言:“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13]这在明人所刻的《列女传》上表现得格外突出。许多《列女传》的改编本对刘向的原著随意增删,使刘向的《列女传》面目全非。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命解缙等人在刘向《列女传》的基础上,重编《古今列女传》三卷,收录虞夏至明朝可为“永作世范”女性的懿言嘉行。因刘向《列女传》中的第七卷《孽嬖传》为背节弃义、指是为非等的反面教材,与圣旨相违,故遭到了封杀删节。古谚曰:“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明代的许多官、私刊刻的《列女传》都

相沿此例。例如,明朝正德年间所刊刘向的《古列女传》、唐富春刊刻的《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以及茅坤增补唐富春所刊的《列女传》,都缺失了第七卷。与之相反,有的刻印者擅自篡改,增添内容。例如,黄鲁曾刊本在刘向《列女传》原书每传的颂言之后,增加了自己新创的四言赞文。不仅如此,有的刊刻者还将本地列女增添入图书。例如,徽州汪氏以自己的亲戚徽州汪、程两姓女子事迹,增补刘向原书,使《列女传》由七卷扩充至十六卷。其书后因鲍廷博的重印,以及图画精美而被后世推崇。

如前所述,刘向编撰的《列女传》是配以图画的。不过,在汉代社会,丝帛虽是优良的书画材料,却过于昂贵,难以广泛使用,也不易长久保存。而古代图书在流传过程中,常遭水火、兵燹等厄运,易受毁散失。王回在《列女传》序中,并未提及亲见列女图;蔡骥在《列女传》跋中,也未言及列女图。由此可知,汉代的列女图至宋代盖已佚亡。至于南宋建安余氏所刻的《古列女传》,上图下文,插图多至123幅^{[7](P228)},并云顾恺之绘画,实是坊刻业主惯用的招揽生意、吸引读者的一种营销手段。此“晋图”实为宋画,应是题中固有之义。加之古代雕版图画成本较高,工艺繁复,一些私家刻印者或因资金所限,或出于疑古等原因,往往省略《列女传》的插图,使《列女传》成为纯文字刻本。例如,黄鲁曾刊本《列女传》就没有图画。又如,顾广圻认为建安余氏的《列女传》图画非顾恺之所画,而有余氏所补绘,故在付梓时,未将图画摹刻刊行,顾氏小读书堆本《列女传》由此便没有了插图。

(三) 韩国、日本刻印的《列女传》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早在东晋时期,汉文图书已在朝鲜流通。至宋代,儒家经典已在朝鲜半岛广泛流传。明朝后期,中国古典小说大量传入朝鲜,其中就有《列女传》。出于教化的目的,《列女传》在韩国不仅以中文直接翻刻,而且早在1543年还被翻译成韩文予以刊行,并有多次再版记录^[14]。宋元明清时期,大量中国图书输入日本。据粗略统计,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约占中国古籍总数的70%^[15]。这些古籍

在日本加以翻刻,以广流布,被称为和刻本,《列女传》位列其中。例如,胡文焕刊刻的《列女传》传到日本后,于日本承应二年(1653年)翻刻为《新刻古列女传》。现在,日本多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均收藏此种翻刻胡文焕文会堂本《列女传》^[12]。

(四)类书、旧注中的《列女传》

《列女传》进入流通领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发生内容文字的缺损,这在抄本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为之所作的注释、颂、赞、图等,甚至今已亡佚。不过,借助于类书、旧注中的称引,《列女传》的部分篇目内容得以重现。虽是吉光片羽,但愈显弥足珍贵,对《列女传》的整理完善多有裨益。《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多摘录了《列女传》的内容。《世说新语》《水经》《文选》《史记》等图书的名家注解中,亦多次称引《列女传》。现仅就类书与《史记》注释中所涉的《列女传》,简而述之。隋末唐初的虞世南在隋代任秘书郎时抄辑而成《北堂书钞》。该书多处引用《列女传》,版本有明代万历年间陈禹谟校刊的《补注北堂书钞》等。唐高祖时,欧阳询等人编纂了《艺文类聚》。该书征引典籍有1431种,其中就有《列女传》。《艺文类聚》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南宋刻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初学记》是开元年间唐玄宗为便于诸皇子写作诗文时查找典故辞藻,命徐坚等人编纂的。该书有十多处引注于《列女传》。国内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无锡安国的桂坡馆刻本,较通行的为乾隆时期的古香斋袖珍本。北宋初年,李昉等人编纂《太平御览》。该书征引典籍多达2579种,多处称引《列女传》。《太平御览》的版本很多,宋代刻本较为流行。现存《史记》旧注有三家,即刘宋裴驷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家旧注对《列女传》多有称引。现存三家注最早的版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

(五)《列女传》研究著述的刻印

清代以前对《列女传》校勘注释的著作,现今已经亡佚。清代考据学甚盛,古籍的校注备受关注。反映在《列女传》的校勘、注释、疏解等方面,

则有王照圆的《列女传补注》、梁端的《列女传校注》、萧道管的《列女传集解》等研究著述的相继面世。

清朝嘉庆年间山东栖霞郝氏家刻《列女传补注》八卷、《叙录》一卷、《校正》一卷。前两部分为王照圆所撰,《校正》一卷系臧庸、王念孙、王引之、马瑞辰等人的研究成果。校勘者为郝懿行的儿子郝文虎与女儿郝文则,后又经郝懿行的表弟海阳人赵铭彝的覆校^[16]。现有嘉庆十七年(1812年)郝氏晒书堂刻本。梁端的《列女传校注》八卷,有道光十一年(1831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后收入振绮堂丛书。萧道管好考据之学,著有《列女传集解》十卷,有光绪年间刻本,后收入《石遗室丛书》。

二、《列女传》的传播

(一)多样化的传播路径

在我国传统社会,统治者大多十分重视妇女在稳定社会秩序、调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于是,出于这种政治意图的考量,《列女传》便成为官府刻印的必选图书。一方面,官府可直接出面,以充裕的资金作为保障,从底本、校勘、刻印、装帧等方面,确保《列女传》的刻印质量;另一方面,官府又可依托非同寻常的行政权力,以非市场化的营销形式,强行将官刻本的《列女传》颁行天下。例如,明朝永乐皇帝即是以此使《古今列女传》印本在城镇与广大农村乃至穷乡僻壤的全国范围内流传。

私家刻本的刊印群体往往由官吏、地主、商人等组成,其目的或是为宣传其著述,或是为传布其喜好的图书古籍。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家人、好友、门生等又多参与图书的校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校勘质量。因此,私家刻印的图书大多底本好、校印精、纸墨优良。不过,由于缺少了谋利的动力,私家所刻图书的流布范围通常有限。而一些专业研究成果的深奥难懂,也制约了其向民众的普及。为扩大其影响力与传播力,一些私家刻本的《列女传》也借助于官方的力量进行传播。例如,光绪八年(1882年),王照圆的《列女传补注》被官员进呈御览。上谕“博涉经史,疏解精严”等首肯评语^[17],的确为当时学者

所称誉的这部《列女传》研究著述的传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坊刻业主刻印的《列女传》,主要通过图书市场进行销售、传播。宋元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两代,在图书刻印业较发达地区、主要城市与交通枢纽,通常都有图书市场的存在^[6]。例如,明代的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已成为全国图市重要的集散地。而至清代中前期,通俗图书销售已经拓展至乡间村落^[18]。如此方便的图书销售网络,使长途贩运图书成为可能,极利于《列女传》的传播。例如,前述清代福建四堡的马、邹两姓家族,总共近700人有在外销售图书的经历,遍及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各省。在西达重庆,南至海南岛,北到曲阜的更远地区,也有四堡书商的足迹^{[7](P318)},其刻印的《列女传》便随之行销各地。

(二) 广袤的传播范围

宋元明清时期刻印的《列女传》,传播地域很广,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还远播国外。就国内而言,主要得益于便利的交通,统一的全国性图书市场的日趋完备与成熟,以及遍布于城乡各处的图书销售网络。相关情况,之前已有叙述,故在此不再赘言。现仅就《列女传》的域外传播,简而述之。

清代以前,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特别是在亚洲各国中,不仅是经济大国、强国,而且文化发达昌盛,处于先进国家之列。其高度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甚为外国尤其是亚洲邻国所羡慕。外国把输入中国图书作为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而中国政府则把图书输出当作其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列女传》由此便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当时,《列女传》传入外国主要有5种途径:中国政府赐赠;外国使臣从中国带回;中国使臣赐予外国;外国商人从中国购买;中国商人带入外国。例如,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暹罗(今泰国)有使臣来访中国,明朝政府便“赐赉有加,并赐《列女传》百册”。同年九月,明朝政府的礼部受命装印《列女传》一万本,以“给赐诸番”^[19]。

(三) 多重性的传播效果

伴随着宋元明清时期《列女传》多种刻印本的出现,庞大的刊印数量,加之多样而行之有效

的传播方式,使其所宣扬的价值观等,在对世人特别是妇女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其多重传播效果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列女传》的刻印与传播,在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推进文化进步与学术发展,保存古代文献,以及助推汉文化圈形成与汉学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与《列女传》的传播如影随形,《列女传》的母仪、贞顺、节义三传中的女性形象,已为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各阶层所普遍认同,熏染成风,可以促进家庭的和谐。而其宣扬的伦理道德因契合“三纲五常”的儒家文化,得到统治者的肯定与提倡,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作用较显著。另外,《列女传》倡导妇女恪守封建伦理道德,安心于生产劳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利于经济的发展。此外,随着一些相关《列女传》图书逐渐走向平民化与通俗化,给了下层劳动妇女读书识字的机会,有利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列女传》的研究成果,如王照圆《列女传补注》的相继刊行,则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与演进。《列女传》传至宋代,原八卷本渐佚。得益于宋人的整理与刻印,八卷本的《列女传》才大行其道。这已成为保存古代文献的成功范例。最后,汉文化在向国外传播的历史进程中,宋元明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大量《列女传》刻印本向国外输出,使中国文化远播域外,对输入国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颇利于以汉文为中心的东亚、东北亚文化圈的形成,也对国外的汉学研究趋于成熟有所助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宋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列女传》的刻印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强化皇权统治与压迫妇女的工具,消极作用不可低估。其倡导的节烈等理念,固化为禁锢妇女思想行为的习惯势力,是与追求人身自由、个性解放等近代社会发展潮流背道而驰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诸如此类的封建旧礼教的陈词滥调,常与《列女传》的传播相伴而行。

总之,《列女传》的刻印与传播互为依托和因果。一方面,形式与内容各异的多种《列女传》版本的刻印,为其传播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与路

径;另一方面,传播渠道的多元与畅达,又为《列女传》的刻印提供了出路。这种良性互动效果明显,使《列女传》在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对民众,特别是对妇女的生活、行为、思维与价值理念等的切实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超过“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应是不争之事实。

参考文献:

[1]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左康华.《列女传》的传播机制及其当代启示[J]. 现代哲学,2013,(3):112.
 [3] 吴敏霞.《列女传》的编纂和流传[J]. 人文杂志, 1988,(3):124.
 [4] 魏征,令狐德棻.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5] 范凤书. 中国私家藏书史[M].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1. 362.
 [6] 张弘,韩帅. 明清时期坊刻图书业经营之道探析 [J]. 东岳论丛,2014,(11):5-9.
 [7] 宋原放. 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8] 张涛. 刘向《列女传》的版本问题[J]. 文献,1989,

(3):250.
 [9] 王毓铨. 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30.
 [10] 张涛.《列女传》注释·前言[M]. 济南:山东大学 出版社,1990.
 [11]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438.
 [12] 刘赛. 明代官、私刊行刘向《列女传》考述[J]. 明 清小说研究,2008,(4):198-200.
 [13] 叶德辉. 书林清话[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50.
 [14] 刘僊俊. 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研究[J]. 九 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20.
 [15] 杨琳. 古典文献及其利用[M]. 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4. 190.
 [16] 唐桂艳. 清代山东刻书史[D]. 济南:山东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2011. 758.
 [17] 郭蓁. 清代女诗人的成长与家庭教育[J]. 东岳论 丛,2008,(5):30.
 [18] 向敏. 清代中前期图书市场探析[J]. 出版科学, 2011,(6):98.
 [19] 南炳文,汤纲. 明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474-1475.

On the Different Versions and Spreading of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JIN Li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y, both official and private versions of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were prosperous. From the subject of engraving, there ar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ponsors; and from the content and illustrations, there are illustrated books, plain text and added or deleted books, and so on; from the countries that produce such books, we have China, South Korea, Japan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and from the existing forms, there are printed booklet, collections and excerpts; in addition, some research works of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are published, such as annotations and variorum editions, etc. The diverse spreading paths, the vast scope it reached and the multiple effects all enhanced its publicity, making it not only popular in China, but well-known abroad. The publishing and spreading of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obviously benefit each other as mutual cause and effect, which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people's life at that time.

Key words: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version; engraving; communication; books; publishing industry

(责任编辑 鲁玉玲)

论新世纪拐卖妇女叙事

刘传霞

(济南大学,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新世纪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的拐卖妇女叙事,向陶醉在现代化想象中的当代人暴露了一个底层百姓的生存世界,探讨了拐卖妇女犯罪的复杂性,打破了人们头脑中关于拐卖妇女犯罪的一些刻板印象,既让人们看到与现代化相伴的金钱崇拜以及古老的传统性别文化观念对人性的扭曲,又让人们目睹了这一犯罪的受害者们的深重苦难、痛苦挣扎,发现了底层百姓在与苦难命运抗争中所闪现出的人性之光,感受到了他们的坚忍与大爱。对新世纪被拐卖妇女叙事而言,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艺术家们怎么进入才有可能更接近真实的确是一个问题,同时,如何通过叙事改变人们的理念和认知,消除拐卖妇女犯罪,为被拐卖妇女的人生出路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关键词:拐卖妇女;新世纪;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75-08

买卖妇女是人类的古老罪恶之一,从古到今、从中到西,这种罪恶交易都在或显或隐地发生、进行着。在女性没有获得人权的时代,买卖妇女是合法的。妇女没有独立的人身地位,从属于父家和夫家,这两个家庭的掌权者以及其他掌握女性生存权的人,都可以公开地买卖妇女。进入主张平等、人权的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和政府都制定法规条律禁止买卖人口,严厉打击人口贩卖,买卖妇女成为非法犯罪。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从法律政策上保障妇女权益,严厉打击买卖妇女的犯罪行为,并且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使买卖妇女这一古老罪恶在中国大陆基本消失。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启动,买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开

始浮出水面,1990 年代随着社会转型和人口流动,买卖妇女的犯罪活动一度猖狂,甚至出现职业化、集团化的倾向,买卖妇女犯罪活动发生地也由四川、云南、陕西等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扩展到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买卖妇女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活动,与其他刑事犯罪不一样,它侵害的不仅是财产和身体,更是人的精神和心理,它严重地践踏人的尊严,击碎女性的主体性,给女性和社会都带来极大的伤害,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动摇。因为有国家政策法规的保障,当代中国妇女不再是夫家的财产和商品,妇女获得一定自主权,所以当代被买卖的妇女绝大部分都是被拐卖的。有研究妇女问题的社会学学者将“被拐卖”解释为“人或/和物被骗后又具有出卖意

收稿日期:2017-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视阈中的十七年女性创作研究”(项目编号:16BZW152)

作者简介:刘传霞(1965—),女,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山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主要从事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研究。

图的欺骗者以获利为目的进行出售”^[1]。在中国大陆被拐卖的妇女大多被人贩子贩卖到农村,被迫与当地男人缔结婚姻,作为传宗接代或发泄欲望的工具。文学是人类认识现实、体验生活的场域,也是人类干预现实、创造生活的场域。在新世纪伊始,具有强烈人文情怀的当代作家就将目光投向拐卖妇女这一严酷的社会问题,创作了一批书写涉及拐卖妇女犯罪的作品,如小说类有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2000年)、星竹的《中西部》(2000年)、刘增元的《断侔子》(2000年)、鲁人的《买媳妇》(2001年)、胡学文的《飞翔的女人》(2002年)、王安忆的《姊妹行》(2003年)、葛水平的《喊山》(2003年)、蒋韵的《北方丽人》(2003年)、李锐的《青石碾》(2005年)、阿来的《自我拐卖的卓玛》(2007年)等;影视类有沙碧红导演的电视剧《又见花儿开》(2003年)、《明天我不是羔羊》(2006年)、李扬导演的电影《盲山》(2007年)、胡明钢导演的《嫁给大山的女人》(2009年)等。这些作品涉及这一犯罪行为的方方面面,通过具象化的故事和形象,创作者们一方面对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拐卖妇女犯罪高发的原因进行探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问题进行追问,对中国传统性别文化观进行质疑,对人性的复杂性进行勘探;另一方面关注被拐卖妇女、买入妇女的男性及家庭命运,通过他们多种多样的遭遇写出这一犯罪活动的受害者的身心创痛以及无奈、认命、抗争、救赎等复杂心理。

一、城市幻象与妇女被拐卖

中国大陆拐卖妇女犯罪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且被拐卖妇女大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陕西等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偏僻乡村。其实,中国城乡之间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在计划经济和政治文化大一统时代这种差异性被遮蔽。在与农业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道德教化和现代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下,处于闭塞状态的贫困乡村,处于相对平稳之中;乡民在物质困乏之中大都保持善良平和之心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都市化和商业化以及现代传媒业的发展,乡村的闭塞与“宁静”被打破,城乡之间的差异与距离日

益凸显。韩少功在解读中国城市爆炸原因时指出:“九十年代以后视听传媒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包括电视‘村村通’工程,使乡村信息闭塞的状况得以缓解,也使很多乡下人对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别和文明差别耳闻目睹,有了突如其来的强烈感受,难免巨大的心理震荡,难免急迫的变化要求。”^[2]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现代传媒都在制造城市生活神话。乡村与城市原本是一个并置的空间概念,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性话语叙述中变成了先后的时间概念,城市成为现代文明的符码,先进、自由、富裕、五光十色、充满机会,而乡村成为愚昧文化的代码,落后、封闭、贫穷、单调沉闷、没有出路。乡村与城市的差异被叙述为文明与蒙昧冲突,逃离乡村奔赴城市意味着挣脱愚昧奔向文明。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快速发展给乡民进入城市提供了机会,进城打工的确也给乡民带来物质生活上的显在改变。在这种话语鼓动与现实诱惑之下,离开乡土成为心怀梦想的青年人的自觉追求与行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离乡进城不仅是男性的追求,也是期冀改变命运的女性的选择。一方面,由于城市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女性需求量大,女性更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另一方面,在乡土女性不承担自我家族繁衍与光宗耀祖的责任时,女性更容易离开乡土,所以在中国离乡进城大军中青年女性占据很大的比例。

巧巧(《谁家有女初长成》)、红叶(《断侔子》)、银鱼(《北方丽人》)、杜鹃(《又见花儿开》)、石秋果(《明天我不是羔羊》)等单纯的青年女子都是怀着到城市开阔眼界、改变命运、过上新生活的梦想,被人贩子以带她们到深圳、广州等大城市打工的名义被拐卖到更加贫困闭塞的山村而跌入黑暗之中。这些被拐卖的青年女子都来自贫困的山区,摆脱贫困、改变受苦受穷的生活是她们逃离乡土的重要理由,但绝不是唯一的理由。她们的行为里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追求,厌倦日渐凋敝的乡村生活,渴望见识外面的世界,追求流光溢彩的生活也是从乡村出走的原因。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追求

理想并敢于付诸行动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标识。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批判或指责巧巧、银鱼们这些生活在大山皱褶里的女性走出大山看世界的愿望和行动,况且由于传统性别文化观念的规训,身处被大山怀抱或者围困的乡村的女性,其精神、身体、心理都受到相当大的束缚,其生存空间极其逼仄狭小。问题是中国社会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城市化为目标的现代性话语,严重地割裂了乡村与城市,造成城乡间的新对立,而现代媒介构建的城市幻象又制造了乡村女性对城市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片面的认知。这种对城市与乡村的偏执化、刻板化认知不仅增加了乡村女性被拐卖的风险,而且还严重扭曲、异化了人性。为了实现城市梦,这些单纯的青年女子往往会孤注一掷,放弃每个人原本应有的羞耻感与道德感甚至生命。在被拐卖的真相暴露之前,巧巧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怎样能到深圳,所以当人贩子在路途上骚扰她时,她没有发出反抗之声,而是质问“哪天到深圳”。李锐的《青石碾》中那个被拐卖到陕西偏僻山村的四川妇女“马翠花”原来是拐卖妇女的人贩子“郑三妹”,正是渴望成为城市人的身份欲望让她走向犯罪的道路,成为在她家乡拐骗妇女、贩卖人口集团的主犯之一。

二、金钱崇拜与拐卖妇女犯罪

金钱最初是人类为方便交易而创造的一种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或符号,以后渐渐“具有价值表现、价值度量、交易中介、价值贮藏等的职能。这种职能源自于交易世界的认同”^[3]。金钱古已有之,但是金钱被当作宗教一样来崇拜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使金钱职能和功用发生了变化。“在前现代人生目标乃是一个恒定、潜在的生活目的,而不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刺激’。如今,金钱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不断的精神状态,如今,对金钱的渴望就成了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4]西方现代社会尤其美国社会的发展史表明,合理或有度的金钱崇拜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它会刺激个人、家庭、企业、团体等为了自身

更好、更高地发展而发愤图强,从而带来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的整体富裕强大。但是,“当个人金钱崇拜不合理时,狂热崇拜或过界崇拜下的行为,就一定会对外部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人人都想侵害他人的利益,并且事实上人人也都在谋求侵害他人的利益,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的对立和社会生存环境的恶化”^[3]。

当代中国金钱崇拜出现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启动以后。在“文革”时期,每个人都会或自觉或被迫地交出个人的权力与利益,国家集体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个人的欲望都被压抑到最小化。到了改革开放时代,随着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启动,不仅个人欲望表达与获取都具有了合法性,而且对金钱、财富的追求还拥有了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获得国家政府相关部门的嘉奖与鼓励。对金钱财富的追逐使中国社会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不仅部分人、阶层获取了财富,而且国家社会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随着政治权力对个体管控的日益松动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钱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大,金钱越来越深地参与到了个人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建构之中,而且成为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金钱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物质生活,还是个人的社会身份。金钱崇拜逐渐成为一部分人的唯一人生目标。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金钱崇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对从极端政治专制时代走出转而进入现代化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而言,不仅因为缺失宗教文化的规约,而且传统诚信、友善的道德价值观被击碎,现代平等、人权从来都没有充分建立起来,因而,金钱的作用被无限放大,金钱崇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远远大于西方现代国家。“以金钱为标准的等级形成,并且差别越拉越大,阶级、阶层对立和阶级、阶层对立意识形态形成,社会因为金钱的狂热追求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磨擦和斗争,并且还酿造出了人类个体或群体的大量悲剧。”^[3]在当代中国,这种被金钱崇拜所鼓荡的极端事件、犯罪更加触目惊心。

狂热的金钱崇拜扭曲人性,将人完全物化。在金钱崇拜的控制之下,人们不仅敢于不断地突破人类在文明社会形成的被人们共同认可的道德底线,把人情、人伦、诚信、友善等人类道德底线规范置之度外,而且不惜触犯法律法规。拐卖妇女这一违背人性、违背现代文明的犯罪之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死灰复燃与转型社会流行的金钱崇拜有关。在这一时期拐卖妇女已经不是个别犯罪,而是一个重要的犯罪类型。也许初始的犯罪者是个人的偶然性行为,后来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拐卖妇女犯罪已呈现组织化、家族化、集团化。从事妇女买卖的人男女老少、各个阶层都有,他们完全被金钱所控制,不仅将受害的妇女当成没有灵魂的物化商品,而且自身也变成没有人性的金钱奴隶,乡情、友情,甚至亲情等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都被金钱欲望所吞噬。

人贩子不仅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而且许多还是有乡邻亲戚关系的熟人,更令人诧异的是还有遭遇过惨痛被拐卖灾难的妇女。曾娘(《谁家女初长成》)是巧巧表舅的远亲,就是她以招工的名义,组织人把自己家乡的姊妹们一批一批地倒卖给其他人贩子,从中牟利;白彩馨(《断侔子》)当年也是被人以招工的名义卖到山西山区,可是她在经过买家摧残之后不仅认命,而且开始从事拐卖妇女的营生,不断地把她的乡亲拐卖到这山区,甚至她把自己的远方亲戚17岁的初中生党红叶拐卖到山村,使其遭受非人般的摧残与蹂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由高一功导演、赵冬苓编剧的电视剧《满天星》里的周慧,这个美丽的女子在经历两次被拐卖之后,最后自己做起贩人勾当,把自己从一个被他人买卖的受害者赵巧萍变成买卖他人的施害者周慧,而她长大成人后的儿子在遭受情感挫折后也加入到人贩子的行列。当然,被拐卖妇女由受害者转身而为施害人贩子,这其中不排除被打入黑暗牢笼之后女性对社会的报复与反抗,但是能够将这行动付诸实施也是源于对金钱崇拜的信服。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被拐卖的女性都是无知、见世面少的,因而盲动、轻信,所以容易遭遇拐卖。新世纪的被拐卖妇女叙事打碎了人们的

这一刻板印象。如果说巧巧、李玉英(《中西部》)、哑巴红霞(《喊山》)被拐卖的部分原因是她们没有文化知识,缺少应有的判断力,在被拐卖的过程中丧失了一次次的逃走机会的话,那么其他几位女性却并非如此。党红叶、分田(《姊妹行》)、杜鹃、石秋果、周慧等都是接受过中等教育,具有自觉、理性追求、聪明伶俐的女性,白雪梅(《盲山》)还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城市生活过的当代大学生。麦子(《飞翔的女人》)一个为寻找被拐卖女儿,多年走南闯北与各色人打过交道的坚韧女人,在寻女的过程中同样遭遇被拐卖,甚至连郑三妹、周慧这些精明的做过人贩子的妇女也没能逃脱被拐卖的命运。郑三妹在被通缉的路上被自己的同乡拐卖到山西;在从事了多年贩卖人口的罪恶买卖之后,周慧为了救儿子又被与自己合伙做买卖的同伴卖掉。随着买卖妇女犯罪的猖狂,被金钱利益所驱使,买卖妇女犯罪的发生形式不仅是拐卖,还有更加原始野蛮的掠劫抢夺。鲁人的《买媳妇》一开始就把这种惨无人道的买卖妇女交易展现在人们面前:“人贩子总共带来了五位女子,为了避免买货人挑肥拣瘦。五位女子全装在了麻袋内,被系好口,就像一袋袋粮食那样,堆放在房间里的一角。五位分别交了两千元钱的男子,在人贩子的带领下,各自挑选了一只麻袋。”^[5]四川偏远山区的民办教师玉棉就是在傍晚归家的途中被人贩子掠走装进麻袋之中待售的女人之一。在《谁家女初长成》中,边防站站长、刚从军校走出的金鉴曾有两段同一腔调的话语,一段是当他听到巧巧编造自己辍学的生活与经历时对巧巧发出的慷慨激昂的说教:“你们先是拒绝受教育,选择无知,无知使你们损害自己的长远利益,长远的利益中包括你们受教育的权益,包括你们进步、文明的物质条件,你们把这些权益和条件毁掉了,走向进一步的无知愚昧——越是愚昧越是无法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而越是没有教育越是会做出偷伐山林这样无知愚蠢的行为!”另一段是得知巧巧的真实身份与经历后,违背众人的意愿,坚持将巧巧送交司法机关时的自我辩护:“是她从拒绝受教育,因而变得愚昧、虚荣、轻信,是她的无知

送她去任人宰割,送她去被人害,最终害人,最终送她去死的。”^[6]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中持有这种论调的人很多,尤其在以悲天悯人自居的知识分子之中。在物质至上、金钱崇拜的时代,面对着巧巧这些遭遇被买卖这一摧毁人性罹难的妇女,这种包含着人文情怀的论调既是空白无力、高高在上的,也是不道德、反人性的。

三、传统性别文化观念与被拐卖妇女的命运

买卖妇女是一种残酷、非人道的罪恶,人贩子为了控制、驯服被拐卖的妇女,在被拐卖的路途中往往就恐吓威胁、殴打辱骂她们,甚至强暴蹂躏她们,有的更因为逃跑失败被殴打致死、致残。新时期的被拐卖妇女叙事对此作了一些揭露和批判。鲁人的《买媳妇》中的玉棉“自四川到山东,这一道她在人贩子的挟持下,挨过许多次打,也受过许多次污辱”^[5]。《断侉子》中的党红叶因为反抗,被人贩子白彩馨丈夫殴打并强暴。如果说人贩子因为利益驱动摧残被拐卖妇女,那么,“买媳妇”的男性及其家庭、乡民,甚至党政干部、有过同样凄惨经历的妇女,这些并非凶恶之人为什么也加入对被拐妇女的摧残与迫害的行列,成为施害者或帮凶呢?

在人类发展史中有相当长的时期男性占据霸权与主体地位,妇女处于屈从客体地位,妇女被当作家庭私有财产被男人掠夺、霸占、交换、抛弃。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盖尔·卢宾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妇女受压迫是在以交换女人为基础的亲属制度下产生的。亲属制度是男人有支配妇女身体之权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内,男人在彼此交换女人之间,用以达成联盟,或者得到地位,又或者作为互惠往来的礼物。”^[7]婚姻是这种交换的最基本形式。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建立了男女平等的婚姻观,但是妇女被作为家庭私有财产、作为男性交换的物品的陈腐传统性别文化遗存仍然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现代婚姻中的“彩礼”就是这种文化遗存的表现形式之一,一些贫困山区出现“光棍村”的原因之一就是男性家庭出不起“彩礼”费用,而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如山东、浙江、广东频繁发生从云南、四川等贫困山区

“买媳妇”的事件也是基于此,这些地区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当地解决婚姻问题的男性及家庭选择花较少的钱从贫困山区“买媳妇”。

既然被拐卖的妇女是男性及其家庭花钱买来的商品,那么,这些妇女就被视为男性家庭的私有财产,他们就获得了对妇女的绝对掌控权、支配权,而这些妇女也就丧失了一切人身权利和自由。这种理念不仅被男权文化既得利益者——乡村的一些男性所接受,也被男权文化受害者——部分女性内化,甚至接受了一定现代文化熏陶的知识青年和代表国家政府的乡村干部、政府工作人员也自觉遵从或无奈接受。正是这种传统性别观念的存在,使得平时善良质朴的乡民会显示出“狰狞”面目,变成没有人性的凶手、打手、帮凶;也是这种观念导致妇女一旦被拐卖到乡村就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逃脱,整个乡村各个阶层的各种力量就会构筑一个严密的天罗地网共同监视、管控被拐妇女,制造着、观看着、鉴赏着被拐妇女的人生悲剧。

《断侉子》里的党红叶、金枝女被拐卖到乡村后,都遭遇过被男性买家转卖和残酷毒打的痛楚,乡民和乡村干部对违法人口买卖和对妇女非人道的摧残不仅不加阻拦反对,反而认为合理合情,加以袒护、鼓励、怂恿。党红叶的“嫂子”当年被迫嫁给党红叶“丈夫”的哥哥,曾经作过激烈反抗、遭受过非常惨烈的毒打,现在却毫无怜悯与同情之心,成了囚禁党红叶的严厉看管者;身为村长的赵扛印认为,人贩子解决了他们村男性打光棍的问题,不仅为村里猖獗的妇女买卖做挡箭牌,而且鼓励村民以暴力方式来驯服试图逃跑的女性;身负保证社会治安、打击人口买卖的派出所熊所长因为金钱利益放任拐卖妇女犯罪在当地泛滥。《中西部》里被拐卖的李玉英被强暴的一幕实在令人咂舌,村里一群妇女帮忙、教唆买媳妇者石天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人的观看中完成了对她的强暴,强暴完成之后竟然是全村人杯盏交错地庆祝。在《盲山》里黄德贵老实懦弱的父母置白雪梅绝望、恐惧、羞耻、身心痛楚于不顾,竟然帮助儿子按住白雪梅,让儿子强暴了她;乡村干部漠视白雪梅的求助;邮递员把白雪梅求

助的信件交给黄家;司机因为白雪梅交不起车费就拒绝其搭车并出卖她;黄德成——黄德贵的表弟,一个温文尔雅的乡村教师,他同情白雪梅并救助过割腕自杀的她,但是也是他不敢、不愿帮助白雪梅逃走,在白雪梅身上满足了他的情欲之后选择了躲避;当公安机关前来解救被拐妇女之时,全村村民出动,用武力阻拦解救行动。

其实这种男主导/女屈从的性别文化观以及中国社会极端重视传宗接代的生育文化不仅伤害女性,也伤害了那些性情温和的男性。正是这种性别文化观让这些男性倍受歧视,承受极大心理压力,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大和男子气概,他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做出伤害被拐卖妇女的行为,黄德贵、二有(《断侉子》)、石天等男性之所以要“买媳妇”并不是为了满足性欲,而是为了完成父母强加给他们的传宗接代的家族任务;面对买来的“媳妇”一开始他们并不想用暴力征服,但是,他们对女性的退让却遭到全村人的耻笑,并面临在村里丧失做男人资格的危险。所以,从某些层面来讲,对被困在贫困山区被迫参与拐卖妇女的男性来说,他们的人生也是一场悲剧。

在经过最初的抗争之后,被拐卖的妇女的命运大致两种,一种是认命,接受现状,留在被拐卖的家庭,甚至在被解救后又回到买入的家庭。被拐卖妇女之所以会放弃逃跑、被解救的机会,最终选择留在被拐卖家庭,大致有3种情况:一是相比买入她们的地区,被拐卖妇女的家乡更加贫困,回乡后她们的生活更加辛劳贫苦;二是买入妇女的男性忠厚老实,勤劳能干,对被拐卖的妇女还比较尊重、有些许呵护,那些在家乡备受歧视、冷落的女性在买入的家庭中反而感觉到“温暖”;三是生儿育女后,割舍不下对儿女的牵挂。玉棉被善良的买家兰采和送回贫穷的老家后又选择了归来;在贫困的丈夫家倍受歧视的李玉英对实诚的石家人和当地的生活产生留恋,拒绝被解救;巧巧若不是发现自己不仅要娶郭大宏的媳妇,还要娶傻子二宏的媳妇,体会到人伦道德底线被突破后,她有可能就选择留在山村做养路工郭大宏的“妻子”了;银鱼生儿育女多年之后,获得回乡探亲的人身自由,但她在探乡之后却又自觉地归来,与丈夫、孩子艰难地生活在

贫瘠的异乡。

这些被拐卖妇女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选择留在流入地与买入自己的男性生活在一起,其背后都是深深的无奈、满满的伤痛。其实,许多女性想回去也回不去了,一旦遭遇被拐卖,她们就失去了家、失去了家园。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女性的身份焦虑主要是来自社会的道德规训”^[8]。在中国乡村甚至城镇针对妇女的单向度贞操观仍然左右人们对女性人生价值的认知,人们关心女性贞操超过她们的生命,将失贞妇女视为可耻、可憎、可鄙的,失贞妇女甚至其家人都会遭到唾弃。妇女被拐卖很难挣脱被强暴的厄运,这种创痛本身必然会带来妇女,尤其是未婚妇女“身体和心理主体性的粉碎性毁灭”,可是,更大的伤害与毁灭来自包括家人、朋友在内的社会对她们的歧视、拒斥、敌视、仇恨。玉棉被兰采和送回贵州老家后,因为“失贞”被任教的学校开除,被丈夫责骂、殴打、抛弃,无处可去的时候她才回到老实厚道的山东人兰采和身边。李玉英被解救回来以后,他的丈夫并没有任何兴奋感,反而唉声叹气、愁眉苦脸,被深深的羞耻感控制,被人耻笑为“窝囊”,当李玉英再次失踪时,他忧虑的不是妻子的生死去向,而是如何从妻子被拐卖事件中追讨钱财。《姊妹行》里水的父母知道女儿被拐卖后拒绝分田要去找寻的提议,以“嫁哪里不是嫁”理由让其自生自灭;同样分田虽然全身而归,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因为怀疑分田已经失去贞操,乡亲、父母、未婚夫等已经将分田从他们的生活中剔除了。

在这种贞操观念和性别文化观念规约之下,“强奸体验和任何创伤性体验一样,是一场永不能结束的事件。它不是一次性发生并结束,而是不断延宕的。在事件发生之后,受害者永远成了一个“被强奸过的女人”,并有可能在任何一个不经意的时刻变成‘二次强奸’的二次受害者。正是因为这种重复性,给受害者带来了比事件本身更具毁灭性的打击。”^[9]从主体与心理建构层面来看,这种无形、非暴力的伤害,比遭受拐卖、强暴的伤痛更严重,来自亲人、无辜人的“二次伤害”或者说“二次强奸”会让被拐卖妇女彻底绝

望,如果受害的妇女自己也将这种物化女性的“贞节观”内化成自我规训与自我认知,那么,在内外双重精神双重围困之下,被拐妇女原本就脆弱的主体性必然会彻底崩溃。

在残酷现实的打击与围剿之中,并非所有被拐卖妇女都安于现状,顺从命运。第二种被拐卖妇女拒绝与反抗女性被物化的传统性别文化观念,在困顿生活、坎坷命运中努力保持生命的尊严,动用各种人生智慧寻求救赎,搭建起女性的自我主体,维护人性的尊严。《飞翔的女人》《姊妹行》《盲山》塑造了一个个“不放弃、不抛弃”,努力自我救赎的被拐妇女形象。

《飞翔的女人》中的荷子,一个女儿被拐卖而在寻找女儿过程中自己也遭遇拐卖的普通乡村妇女,在她瘦小而衰弱的躯体内却有强大的内心力量与坚韧的精神,不向现实妥协,不向命运低头,顶住来自家庭、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坚守做人的道德与良知,与人贩子和不作为的公安执法人员斗争,居然依靠一己的力量抓到人贩子,惩罚了邪恶的犯罪者。这个来自社会的最底层的苦难而不幸的妇女,在与苦难与罪恶斗争中获得了生命的超越,成为一个在生命尘埃中飞翔起来的女人。

《姊妹行》是王安忆依据在山东省妇联采访时听来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短篇小说,作品书写了两次姊妹行,第一次是中国乡村妇女受难之路,第二次是底层妇女自我主体成长建构之路。分田因为去探望在徐州当兵的未婚夫,与小姐妹水结伴而行却遭遇人贩子,分别被拐卖到穷乡僻壤给陌生男人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分田保住女性贞洁并逃回到了家乡,可是归来的她却不被家乡人所接纳,在寻求他人、妇联组织等帮助都无果的情况下,分田居然孑身一人沿着被拐卖之路重新行走,成功营救已经为人母的小姊妹水,最终带领水再次主动离开故乡,开启了奔往上海的第二姊妹行,到包容开放的现代大都市寻求新的人生之路。从被拐卖归来后对自我贞操的无力辩护、寻求他人作为自我证明,到勇敢地踏上孤身解救同命运小姊妹之旅,再到决绝地告别家乡,姊妹俩携手奔向大城市,一路走来,分田这个活泼单纯、未经世事的农村青年妇女,从“一个残

存父权文化意识、主体意识匮乏的女性”,一步步锻炼成为“一个已经抛弃传统性别规范,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具有明晰自我意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女人”^[10]。

电影《盲山》的主要故事线索就是决不放弃的“出逃”。大学生白雪梅为了帮助家里还清债务急于寻找工作而被拐卖到狭隘封闭的山村,经历了被强暴、被毒打、被迫怀孕生子、被欺骗等的一系列身心摧残,她却从未动摇过逃出去的意念。因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追求,不认同山村中所流行的不平等的女性文化规范,不认命也不认输,她就像一个击不倒的斗士,一次次失败之后总结经验调整策略再次投入战斗。最后,终于在她帮助过、教育过的天真孩童的帮助下,被公安机关解救出“牢狱”。在逃出去的最后关头,电影中同样被拐卖来的妇女陈丽因为听到孩子的哭喊声放弃了逃走的机会,而雪梅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身后追跑着的婆婆和襁褓里的孩子,毅然向前奔去。对电影的这一结局有人批评“这样的弃子行为,很难说是一种文明”^[11],其实这种批评过于抽象而高调,在这种极端的特殊境遇之下,苛责女性母爱缺失,无疑是对女性自我生命、自我主体的剥夺。

新世纪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的拐卖妇女叙事,向陶醉在现代化想象的当代人暴露了这样一个黑色的底层百姓的生存世界,探讨了拐卖妇女犯罪的复杂性,打破了人们头脑中关于拐卖妇女犯罪的一些刻板印象,既让人们正视与现代经济相伴的金钱崇拜以及古老的传统性别文化观念对人性的扭曲,又让人们目睹了拐卖妇女犯罪的受害者们(被拐卖妇女本身及家庭、买媳妇的男性及家庭)的深重苦难与痛苦挣扎,发现了这些底层百姓在与苦难命运抗争中闪现出的人性之光,感受到他们身上所隐藏的坚韧与大爱。

当然,在具体叙述中有的文本还存在着将拐卖妇女现象简单化处理的问题,如《中西部》《盲井》把造成这一悲剧的成因归结为村民的贫穷与愚昧;有的潜隐着俯视式的精英主义视角,如《谁家有女初养成》;有的作品流露出传统男权文化意识,如《断侉子》将女性的“轻佻”叙述为农村妇

女遭遇拐卖的重要原因,把所有抗争妇女的人生结局都安排为凄惨的悲剧;有的作品为被拐妇女设计的大团圆结局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被拐妇女的人生悲剧,如《买媳妇》挖掘了乡村的温情,书写被迫加入买媳妇行列的男性的无奈与善良,但是,由于作品缺乏对被拐女性的复杂心理抒写以及对这一大团圆结局所隐含问题的探究,反而强化了乡村女性的宿命感,冲淡了对拐卖妇女犯罪的批判力度。根据“感动河北人物”郜艳敏的人生经历而改编的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在再现与叙述被拐卖妇女山菊的命运经历之时,有意淡化了被拐卖遭遇对女性的巨大伤害,回避了拐卖妇女这一犯罪所折射出的各种社会问题,突出了女性对苦难的忍耐与承受、对他人的宽容与感恩、对各种责任的担当,彰显了女性的伟大与崇高。其实,这种对社会阴暗面、社会矛盾有选择性的忽视与沉默,是对拐卖妇女犯罪的纵容;而对受伤害女性诗意化、道德化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对女性的道德绑架和规训,这是对女性的另一种压榨和索取。“面对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艺术家们怎么进入才有可能更接近真实?”^[12]对被拐卖妇女叙事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同时,我们的艺术家们如何通过叙事改变人们的理念和认知,消除拐卖妇女犯罪、为被拐

卖妇女的人生出路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王金玲. 质性研究中情景脉络的理解和诠释[J]. 云南大学学报, 2006, (6): 19-23.
- [2] 韩少功. 暗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256.
- [3] 陈彩虹. 现代社会中的金钱崇拜[J]. 文景, 2007, (12): 4-5.
- [4] [德]西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 刘小枫, 编. 顾仁明,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5.
- [5] 鲁人. 买媳妇[J]. 北京文学, 2001, (4): 73-77.
- [6] 严歌苓. 谁家有女初长成[J]. 当代, 2000, (4): 4-49.
- [7] [美]佩吉·麦克拉肯.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87.
- [8] 徐先智, 范伟. 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J]. 湘潭大学学报, 2014, (3): 107-110.
- [9] 谢琼. 书写强奸: 被转移的言说[J]. 南方文坛, 2010, (6): 67-72.
- [10] 刘传霞. 论中国底层妇女的主体性与救赎之路[J]. 文艺争鸣, 2014, (7): 108-112.
- [11] 李智伟.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J]. 飞天, 2009, (10): 26-27.
- [12] 李云雷, 盘索. 《盲山》、性与“文明”的链条[J]. 黄河文学, 2008, (4): 119-120.

On Narratives about Trafficking of Women in the New Century

LIU Chuan-xia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century, narratives about women trafficking created by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ers in the new century exposes the livelihood of the lowest class to modern imagination, explor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crime, and breaks people's stereotypes about women trafficking. Such narratives not only let people see the distorted human nature caused by money worship and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gender culture, but also let people witness the deep suffering and struggling of the victims, the grandeur of human nature exposed in those suffering and struggling, and their perseverance and profound love. In the face of complex social problems in the new century, it is indeed a question how artists can enter closer to reality. Meanwhile, for such narratives, it is really a problem for the artists to find the proper way to approach this complicated social problem. What is also important is how to improve people's idea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is problem through narrative, eliminate this crime, and illuminate the life of trafficked women with more possibilities.

Key words: trafficking of women; new century;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赵莉萍)

新时期陕西女作家笔下的都市女性

白军芳, 张晓宾

(西安工业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 要:在卫慧、棉棉的冲击下,“美女作家”成为新时期的女作家创作的重要潮流。但是,陕西新时期女作家在商业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夹缝中,却大胆探索,忠于现实,写出了西安城市文化的变化,并为都市女性的活动提供了开明、时尚的物理空间。其笔下的人物是都市中的知识女性,也是有热情、有尊严、有自信的人群,面对消费主义浪潮,她们没有迷失,仍然遵从内心的欲望,寻找精神的家园。这样的一群女性形象为西安文化的国际化建设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清流。

关键词:新时期;陕西女作家;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83-05

新时期的陕西女作家的城市创作与男作家不同,没有对城市生活的疏离和嫌弃,她们关注西安城市文化,具有重视其文明、大气、时尚的特点。她们对于都市女性的描写,重视其知性、优雅、理性的特征。冷梦、周瑄璞、唐卡、杜文娟、辛娟、吴文莉等都是描写西安城市的主要女作家,不仅写出了城市的变化,而且也写出了都市女性的勃勃生机。

一、处在夹缝中的新时期陕西女作家的创作

在 20 世纪末,上海的卫慧、棉棉等作家的创作被广泛关注后,“美女作家”的称谓便有了具体的能指。“美女作家即指出生在 1970 年代,天生美貌且在写作上呈现出展现自我层面,关注女性心理等某些共同倾向的创作群体,以卫慧、棉棉、九丹为代表。”^[1] 1970 年代出生的所谓的“美女

作家”这样的能指具体到陕西女作家身上,是不太恰当的。这个阶段的陕西女作家,从 1990 年代起也开始推出 1970 年代女性作家作品系列^①。因为北京、上海“美女作家”称谓的出现,陕西 1970 年代的女作家群有才有貌,也被多名学者有意无意地移植过来,称其为“美女作家”以恭维女作家的才情。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西“美女作家”不仅没有卫慧、棉棉那样的性暴露、吸粉、堕落的样态,连林白、陈染那样爱写隐私、窥视的情节都不多^②。这样笼而统之的称谓,虽然能够建立一个批评界的交流平台,然而,如果忽视了作家的地域特征,模糊了作家的个性,是极不严肃的批评态度。

陕西文坛上 1970 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不少于 20 位,她们分散在西安、安康、渭南、商州等地,由

收稿日期:2017-07-01

项目基金:陕西省教育厅项目“文学视野下的西安国际化城市形象的塑造研究”(项目编号:15JK1333)

作者简介:白军芳(1975—),女,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学和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张晓宾(1985—),男,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于所处地域不同,她们关注现实的视角和描绘生活的方式也很不相同。西安地区1970年代的女性作家生活在物欲充斥的都市,难免带有消费文化时代的特征,她们也关注性欲,描写都市的浮华,涉及咖啡馆、情爱、夜生活的内容也比较多,似具有海派“美女作家”的特点,但西安的“美女作家”作品有着与上海、北京“美女作家”作品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上海历来有“十里洋场”之称,东西文化交融的地域优势为卫慧、棉棉们提供了丰沃、靡丽、温软的文化支持,所以,“身体写作”在上海就表现得丑态十足、轻浮迷乱;西安地处大陆腹地,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冷梦、周瑄璞、唐卡、惠慧等从来没有那样放肆与张扬过,她们的作品受传统保守思想的影响比较多。另外,1970年代出生的陕西女作家群,其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也不可忽略。丁玲等第一代延安女作家的阳刚、敏锐、大气也影响了她们关注现实的视角,其塑造的知识女性自尊、自爱,没有扭捏之态。分析她们的作品,更容易挖掘出她们笔下的城市文化特征,是西安城市文化书写的重要一环。

二、新时期陕西女作家笔下的都市文化背景

雷涛说,翻开她们的作品,不难看出这一现象: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有文化的小知识分子,作品多是展示她们的苦恼、不幸、欢乐和忘情。其作品中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城市或城乡交叉地带。长安文化即指西安都市文化特征,自古以来,描写西安特征的都是以都市文化为背景。

历史翻卷至21世纪,西安再次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进入人们的视野。它霓虹闪烁,高楼林立,香车宝马络绎不绝,丽影鬓角,衣袂飘飘,仿佛靓丽妆扮的美女。性欲的张扬与城市的物质消费紧紧相连,社会现状如此,表现在美女作家作品中的生活亦如此,女作家们把自己的经历、心灵体验、情感震动一一写进作品。

与新时期的京沪女作家相比较,西安女作家也写美色的香艳与肉欲的张扬,比如周瑄璞、唐卡都关注爱情,并大胆描写性欲。周瑄璞的《疑似爱情》中,主人公丁朵朵行走在职场,在各大摩天楼、写字楼、车的海洋、喧闹的购物场所出没,

各种奢侈商品纷纷登场;唐卡的《你在找谁》中,郭贝蕾频繁地在飞机上飞来飞去,生活放荡,轻佻;夏坚德的《红杏在墙》写的则是婚外情。她们描写的就是20世纪末这个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西安都市,描写的环境也是大学校园、咖啡馆、电影院,突显的是女性个人的情感历程。虽然她们的体验有时会显得肤浅与单薄,但这并不能否定她们在新生代作家中对女性的自我认同、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努力过程,也不能否定其文本的都市文化的独特意义。

周瑄璞和吴文莉的作品都写到了西安城市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她们都选择了“河南人”进入陕西西安城,经历艰苦生活,由逃难的农民变成西安市居民又变成城市的建设者的过程。西安也由原来的破败荒凉、肮脏紊乱、落后迟滞,变成了高楼林立、时尚干净、蓬勃发展的现代城市,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她们对于西安小东门“大棚区”改造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并且在城市拆迁建设中,书中的主人公个个感同身受。都市的包容、开放、恢弘、发达为都市人造就出自信、喜悦的心态,使西安表现出与北京、上海不一样的生机。唐卡的小说都在描述都市女性“寻找爱情”中的迷惑,《你在找谁》就是一部膨胀自己的体验、将男性客体化的城市文化作品,4个单身女性出入于大都市中搜罗自己心仪的男性,频繁地更换男朋友,调侃、嘲笑男性的敏感,软弱,渴望找一个爱人,渴望征服爱人,却只能在人群中穿梭,不能安定下来。唐卡的作品铭刻着鲜明的时代和年龄印记,她的语言在清新中饱含着沧桑感,在炫耀的气焰中也有凄切哀婉的影子。变化而美好的西安城市为故事的主人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活动空间。

三、陕西女作家笔下的都市知识女性特征

新时期的陕西女作家,其书里书外都洋溢着知识女性的优雅格调。从作品的主人公身份来说,她们都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能够经济独立;从作家的创作风格来说,作品语言雅洁、内容丰沛充实,虽然技巧性略显稚拙,但是又有思考的敏锐性。于是当京沪的美女作家空洞地游荡于酒吧、歌厅、电影院等时尚消费场所,用放荡的

语言描述色情故事的时候,陕西女作家的作品流淌着掩饰不住的书卷气和知识女性的典雅。

第一,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一般都超越了柴米油盐的烦庸生活基准,优越的工作环境能为她们提供个性解放的背景。同样,在自己个人生活的安置中,爱情又是她们展示自身魅力的舞台。唐卡的《你是我的宿命》《你在找谁》《私密空间》,周瑄璞的《多湾》《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人丁》《夏日残梦》等作品都以知识女性为主人公,她们的命运际遇虽有不同,但是字里行间都弥漫着知识女性的淡定和自信。例如《你在找谁》的主人公林同之甜美、娴静、端庄、富有才华,在寻找男朋友时,充分展示了知识女性的魅力。精致的妆容,得体优雅的谈吐,工作上的才情,使她渐渐走入富商谢致南的心里,他斟酌再三,了断了其他多个国家的情人,准备与林结婚,但是,林发现真相后,心理“雅静”的她,忍受不了谢致南的“乱性”交友方式,而毅然离开了他。这些作品里的主人公,有知识、有涵养,即便面临选择和迷惑,也能深刻思考,清醒处置。相比之下,京沪的一些美女作家都显得浮躁、浅薄而不知所措。比如,林同之们带着作家对人生的思考和理解具有较明显的自尊、自立意识,为她们的人格笼罩上绚丽的光华,显示出知识女性独特的魅力。

第二,知识不仅给作品女主人公带来兰心慧质的优雅,还点燃了她们内心深处的理性之光,知识成为拯救她们的有效工具。冷梦、周瑄璞、惠百团、夏坚德等作家的作品都描写了知识女性的自律、淡定、勇敢等优秀品质。比如《疑似爱情》里,丁朵朵是一位长相丑陋的女孩子,她暗恋着自己的总编,但是,无论多么痛苦,她都自尊、自爱、自律,当米左拉(总编的情人)怀孕时,她颇有侠义心肠,努力帮助米左拉;当她自己面临被社会贬抑(她因长相丑陋,一直没有男朋友)时,她用道家思想洞悉一切,认认真真走自己的人生之路。这种超然、坚定的态度令作品中的其他人物黯然失色。

第三,古都文化熏染下的知识女性,重情趣,讲格调,天然地排斥龌龊和卑贱,成为新时期都市文明中最阳光的人群。在西安城市文化中,儒

家思想根深蒂固,“文学依然神圣”(陈忠实语),文学的启蒙功能深深植根于这一地域作家的思想意识中。城市外表的革新,并没有影响到西安女作家内心的美好、正直、坦诚。因此,当京沪美女作家将性欲张扬到“卑贱”的程度时,西安女作家仍然重视知识女性的时尚、气度、涵养。她们剥离的是传统意识制约下女性的怯懦与自卑,张扬的是内心世界的自信、快意和强大。当然陕西推出的“女作家”系列作品,也不乏商业炒作的嫌疑,但是翻开这些女作家的作品发现,其表现着与京沪女作家作品不同的美学特征。卫慧、棉棉把“身体写作”当成商业炒作的“卖点”,大肆渲染,力爆隐私,满足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窥视的欲望。不管她们的作品有何种创新,当人们把性描写作品斥为“流毒”而严格控制的时候,这些“一炮走红”的作家作品,其结果可想而知。而陕西女作家的作品内敛、含蓄、优雅,避免了男性恶意的觊觎,大方地行走在明亮的阳光下。比如“西部文学女作家丛书”,七册,分别写都市爱情(唐卡的《你在找谁》)、婚外恋(周瑄璞的《疑似爱情》)、商业题材(张瑜林的《网事倾城》)等,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全面的城市文学作品。作家的尊严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书商的商业炒作,令读者有意外的收获。

综上所述,陕西1970年代出生女作家群虽然处于商业与传统文化交织的夹缝中,却苦心经营,大胆创新,并没有在夹缝中迷失。她们能够深入生活,描绘自身真实的体验,既涉及现代文明给女性生活带来的困惑,也涉及知识给予这些作家独有的坚定、自信、勇敢。因此,相较于京沪女性作家,她们不炫耀,不空虚,于是,“美女”二字在她们身上洗涤了色情的成分,显现出理智、豁达、优雅的精神气度。这也是西安古都文化端庄、典雅风采的再现。

四、新时期陕西女作家的性描写

新时期的陕西女作家大多都涉及城市文化书写,作为西安文化的重要方面,女作家的作品中的性描写是城市文明的一张“试纸”,个人欲望的诞生和满足是城市文化发展与否的一个标准。“西安女作家是从现实的庸常的城市生活中来关

注普通女性、解读普通女性的。”^[2]肖云儒的这句话非常有代表性。陕西女作家作品反映了都市小市民百姓的生存状态和感情心态,反映了他们命运的沉浮、谋生的尴尬和情感的困惑,以及庸常的喜悦、无奈和创痛,其中既有声色迷离的欲望摹写,也不乏重拾浪漫的心灵渴望。作者对城市女性性欲的痛惜和关爱,在感情倾向上十分明晰。“她(周瑄璞)总是表露出一一种女性特有的情怀,她笔下的现代生活场景是用女性娴淑恬静的情怀浸泡过的,是那种被温馨情怀包裹着的女性性描写。”^[2]“她的作品里女主人公没有男朋友就觉得生活好像有一个巨大的空缺,急切期待某位男性的出现,”^[3]她们对性的要求很多,但又追求心灵的宁静,肉欲与精神的共鸣,是她们笔下最幸福的性体验。

首先,她们自恋却也自尊。周瑄璞的《疑似爱情》中的女主人公丁朵朵,她是众多作品中唯一一个被塑造成丑女形象的主人公,她有丑女的自卑、消极与世俗,但同时又具有独立女性敏感、机敏、自尊和好强的个性。她不像其他长相平平的女孩,认为上天给了自己一张不好看的脸就得认命,安于现状。丁朵朵有思想,她坚持自己的信念,别人看低自己,可她自己不看低自己,凭着实力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在选择男朋友问题上,她不屈服于社会要求,家人着急而她不急,快30岁的她仍然是单身。她暗恋社长,却一直没有结果。所以当性爱来时,她疯狂地沉浸于这迟来的快乐中,仿佛积蓄多年的激情要一下子全部倾泻出去。她热爱性生活,有着狂热迷乱的肉体欲望,这让她寻找到了使自己更加自信的元素,那就是她的身体。“关于美与丑没有严格的界线,美与丑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而人们总是以面孔的美丑来划分一个人,这是多么狭隘无知浅薄的观点啊。”^③当她裸体站在男朋友家镜子前时,男朋友夸她美,而她似乎也被自己的美惊住了——“镜子里的人确实是我,身材适中,肤色不白不黑,发出柔和的淡黄色光泽,双肩圆润,乳房不大不小,像新出笼的小馒头,鲜活地挺立着,腰肢柔韧挺拔,是粗与细之间的最好力度,肝脐像一个厚实的陷阱收缩着很秀丽的洞口,双腿结实

而温馨地并排站立。我突然意识到这应是个跳舞时的镜子,海帆(她的男朋友,一位舞蹈老师)一定在这前面调整自己的身姿,于是,我将一只脚稍微向后移动几寸,那双腿便立即幻化出几多风姿与灵韵。我低头看自己,左边的乳房随着心脏的跳动上下上下地颤动着。我的身躯蒸腾成一个童话随着音乐飘飞起来。当我抬起头再看镜子里的自己时,丑的脸庞模糊了,我的身影模糊了。我是美的化身,我在这一刻变成了美丽的女子。海帆说得对,美与丑是互相转化演变的,美就是丑,丑就是美,在丑即美,丑极则美。”她发现了自己身体的美,因此迷恋上了裸体照镜子,哪怕一个人在家,她也要拿出来炫耀一番,独自欣赏着自己姣好的每一寸肌肤。“把女性身体作为艺术创作唯一可用之媒介的手法正风靡于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身体化文本正在成为女性自恋的最大载体。”^④可以说,女作家对于女性胴体的欣赏,充满了惊艳和骄傲,是性爱之外的女性身体尊严之宣扬。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发现与海帆间不像她之前所向往的两性之爱(没有惊喜、躲闪、期盼、心灵的火花碰撞、思想的交相辉映、人格的无穷魅力),于是,她就激流勇退,恢复到等待的状态。

另外,陕西女作家描写性都带有传统伦理的痕迹,个人享乐的成分比较少。著名批评家寇挥认为周瑄璞的这部作品是写生命的,他在评论中写到:“在这里,生命以孩子、母亲和男人作为符号而出现,联结这三者的是爱和性。生命的基本单位以爱和性而紧紧地扭结在一起,谱写了一曲礼赞生命之歌。孩子是值得赞颂的,因为她是生命的未来。男人也是值得赞颂的,他携有生命的种子。母亲就更值得赞颂了,孩子和男人以她为其承载之舟,演播出生命的壮丽和辉煌。在这部小说里,孩子明明,母亲陈阿莹,男人刘强,他们已经升华神圣生命的象征,他们的关系由于爱的渗透而变得圣洁,由于性的极致、生命力的张扬与狂舞,而变得伟大而永恒。”^[4]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周瑄璞的笔下,性是美德,生命的繁衍也是美德。我们在看这部作品时应抛开世俗的眼光,用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伟大的母亲。另一位女作家唐

卡也描写性爱,描写得更放纵一些,但是仍然带有女性的自尊和知识女性的聪慧。

总之,新时期陕西女作家的写作受地域的影响,她们重视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快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感情表达方式。对于女性主体意识的描写,有机敏的建构,也有无意识的言说,更有性爱的发现和伦理基础上的尊严、气度。当然,形成这样特别的写作方式,也有作者个人自身的原因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她们较高的个人精神素养、自尊自爱的做人处事方式、宽容的心态、对他人的无私的爱与奉献等等,都与长安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密切联系。她们打破思想浮躁、商业气息浓厚的“美女写作”模式,着笔于西安城市文化知识女性的生命体验、职场感受、男欢女爱,她们作品中的城市散发出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气息,也使陕西女作家群的创作,从整体上看,清新、浪漫、刚健而纯洁,是1990年代文坛女性创作的一股清流。

注释:

- ① 这批女作家在《山花》《人民文学》《大家》等国家级文学刊物上纷纷发表作品,仅以唐卡为例,现已发表长篇小说7部,可见陕西女作家,尤其是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其数量和质量已经相当可观了。
- ② “美女”这个称谓如果这样肤浅地与“身体写作”私通,的确有点被恶意歪曲的意思,上海派部分女作家的叫嚣、卖弄、放肆,的确不能被称之为“美”。
- ③ 周瑄璞《疑似爱情》,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参考文献:

- [1] 李仕华,何兰蓉.欲望的舞蹈[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23-25.
- [2] 肖云儒.女性主义的心灵写作——周瑄璞的小说风格[EB/OL].布衣璞的博客,2008-09-01.
- [3] 白军芳.陕西女作家创作题材的特征[N].文艺报,2007-05-01.
- [4] 寇挥.一曲绝唱——评周瑄璞长篇小说《疑似爱情》[EB/OL].布衣璞的博客,2008-09-01.

Urban Women in the Works of Shanxi Female Writers over the New Period

BAI Jun-fang, ZHANG Xiao-bin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i Hui, Mian Mian, “Mei Nv Zuo Jia” is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new period. But the female writers in Shanxi, exploring boldly in the gap between local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culture, demonstrate truthfully the change of the urban culture of Xi'an and open a new and fashionable space for the life of urban women. Such women images, intelligent, self-reliant and confident, keep cool mind in the storm of consumerism, follow their inner desires and seek for their spiritual and sensual mate. This set of eminent images are ideological role models for the internalization of Xi'an culture.

Key words: the new period; shanxi woman writer; city cultural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女性教育研究 ·

“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女大学生思政工作探析

——以山东女子学院为例

王 鲁, 郭晓东

(山东女子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女大学生的性别特质、学习生活习惯、心理特征等因素决定了对她思政教育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和方法,通过了解女大学生作为需求侧对思政教育的期待,提出有针对性的供给侧改革建议,才能使“互联网 +”背景下的高校思政工作取得更好效果。

关键词:“互联网 +”;思政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88-05

一、赢得互联网阵地对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性

据有关统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到 2.87 亿,占中国青少年人口总数的 85.3%,远高于 2015 年全国整体网民互联网普及率(50.3%)^①。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在山东女子学院大学生群体中发放的《关于大学生网络新媒体使用情况调查问卷》回收有效样本 4397 份,其中女生 4060 份,男生 337 份。大一至大四年级学生分别占 47.92%、27.75%、16.85% 和 7.48%。汇总分析发现,女大学生每月使用手机流量在 1G 以上和 500M~1G 的群体占比最高,分别为 68.13% 和 20.22%,这与男大学生的情况相类似。对于每天花费在网络新媒体上的时间,有 42.12% 的女

大学生超过 3 个小时,28.67% 的在 2~3 个小时,22.76% 的在 1~2 小时,仅有 6.45% 的在 1 小时以内,与此相对比,男大学生在上述选项中的占比分别为 26.92%、22.49%、33.73% 和 16.86%,不难看出,女大学生每天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明显多于男生。女大学生主要使用的网络新媒体是 QQ、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和微博,分别占比 98.55% 和 71.87%,这与男大学生的情况相同。在回答网络新媒体对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如何的问题上,7.32% 和 62.49% 的女大学生认为非常大和比较大,29.14% 的认为基本不影响,仅有 1.05% 的认为完全不影响,男大学生在上述选项中的占比分别为 13.9%、53.85%、28.4% 和 3.85%。

这些信息表明,对于网络原住民的一代大学生,网络在其成长过程中影响较大。纷繁复杂的

收稿日期:2017-06-15

基金项目: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新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4-ZX-ZC-11)

作者简介:王鲁(1981—),男,山东女子学院团委副书记,副教授,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及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郭晓东(1991—),男,山东女子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从事辅导员工作及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互联网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特别是女大学生由于生活习惯、较少参加室外活动等原因,在网络新媒体上花费的时间更长,也更易受新媒体的影响,因此谁赢得了互联网,谁就赢得了青年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4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就指出,“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在信息裂变的时代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互联网是一个必须争夺、必须占领、必须巩固、必须主导的阵地。

二、女大学生对网络新媒体的使用现状

(一)女大学生群体使用网络新媒体的目的分析

1. 女大学生使用网络新媒体的目的主要集中在休闲娱乐(游戏、音乐、影视、网络文学)、维系亲朋关系、了解学校新闻、查阅时事政治、网络购物,占比依次为87.95%、83.72%、65.52%、62.91%、62.5%。而男生使用新媒体的目的依次为休闲娱乐(游戏、音乐、影视、网络文学)、维系亲朋关系、查阅时事政治、了解学校新闻和网络购物,占比依次为74.56%、74.56%、70.12%、57.69%、42.9%。对比不难发现,女生更关注身边事,而男生更关注社会事(见表1)。

表1 女大学生使用网络新媒体的目的

选项	小计	比例
查阅时事政治	2530	62.32%
维系亲朋关系	3429	84.46%
了解学校新闻	2687	66.18%
休闲娱乐(游戏、音乐、影视、网络文学)	3615	89.04%
网络购物	2603	64.11%
其他	252	6.2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4060	

女大学生在网络新媒体各项功能上花费时间最多的排序也与目的排序一致,占比依次为52.9%、26.43%、8.62%、8.26%、2.39%;男生则依次为39.35%、30.77%、19.53%、6.8%和0.89%。由此可见,女大学生使用新媒体时,花费在休闲娱乐(游戏、音乐、影视、网络文学)上的时间占比52.9%,远高于男生的39.35%,表明她们更多将网络新媒体作为休闲娱乐的工具,也更

容易沉溺其中。

2. 在回答对网络新媒体传播的主流价值观新闻资讯是否感兴趣时,81.84%的女大学生表示很感兴趣或比较感兴趣,17.46%的表示不怎么感兴趣,仅有0.69%的表示完全不感兴趣。而男生在上述选项的占比分别为82.84%、14.2%和2.96%。这表明女大学生对于学校新闻、时事政治特别是主流价值观新闻资讯的关注度比较强,这为通过互联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影响女大学生群体对网络新媒体资讯关注度的因素分析

1. 调查显示,在影响女大学生是否愿意浏览网络新媒体资讯的原因和占比方面,与自身兴趣相关的占70.3%,标题新颖的占21.35%,图片吸睛的占7%;与男大学生的选择基本相同。这也与受访者回答自己会认真阅读一则信息大约多少字的调查结果比较一致,69.01%的受访者表示只要有兴趣就会一直读完,16.7%的表示会认真阅读300字以内,9.04%的表示会认真阅读100字以内。这说明只要能够吸引女大学生的兴趣,新媒体的传播就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2. 尽管81.84%的受访学生表示对网络新媒体传播的主流价值观的新闻资讯很感兴趣或比较感兴趣,但在回答影响自身对主流价值观咨询产生兴趣的原因时,51.63%的女大学生认为是一味说教,51.53%的选择理论性太强,45.62%的选择表述形式不够生动活泼,33.82%的选择标题平淡(见表2)。可见影响她们接受主流价值观信息的主要原因在于形式和内容是否经过精心设计。

表2 影响女大学生对网络上主流价值观咨询产生兴趣的原因

选项	小计	比例
课堂上已经学习过	493	12.14%
标题平淡	1373	33.82%
理论性太强	2092	51.53%
一味说教	2096	51.63%
表述方式不够生动活泼	1852	45.62%
其他	121	2.98%
(空)	751	18.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4060	

(三)女大学生对网络新媒体资讯的甄别能力亟待增强

1. 调查显示,尽管有 97. 12% 的女大学生认为网络新媒体传递的资讯需要进一步分辨真假,但仅有 8. 4% 的女大学生认为自己一直可以甄别新媒体传递的信息,远低于男生的 21. 89% , 71. 13% 的女大学生认为需要开设媒体素养方面的课程或讲座。

2. 在回答影响自己有效甄别网络新媒体信息的原因时,79. 09% 的女大学生选择缺少该领域的专业知识,60. 34% 的选择这则信息是在影响力很大的媒体平台发布的,49. 04% 的选择缺少辩证的思考方式,还有 13. 57% 的选择这则信息是由欣赏的明星介绍的。男生在上述选项的占比依次为 77. 22% 、44. 38% 、44. 38% 、14. 79% (见表 3)。这说明女生更容易相信权威平台的发布。

表 3 影响女大学生有效甄别网络新媒体信息的原因

选项	小计	比例
缺少该领域的专业知识	3211	79. 09%
缺少辩证的思考方式	1991	49. 04%
这则信息是由欣赏的明星介绍的	551	13. 57%
这则信息是在影响力很大的媒体平台发布的	2450	60. 34%
其他	163	4. 0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4060	

(四)网络新媒体对女大学生阅读能力的影响

女大学生在网络新媒体上花费大量时间意味着相当大程度上挤占了其对传统媒介的使用,调查显示,尽管有 80. 32% 的受访女大学生认为网络新媒体阅读和传统纸媒阅读的关系是二者互为补充,但有 32. 32% 的受访者仍然认为网络新媒体阅读对自身阅读能力的影响是使自己越来越“走马观花”,不习惯深度阅读或更不喜欢阅读大部头的图书了,表明网络新媒体对女大学生深度阅读能力和良好阅读习惯有负面影响。

三、对“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女大学生思政工作改革的建议

高校思政工作要在互联网上筑牢“网上长城”,其核心是在供给的途径、内容、形式、主体上创新性地开展工作。

(一)供给主体上的多方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做好互联网环境下的高校思政教育需要党政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和学生骨干的群策群力,各自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通过党政协同、教师协同、师生协同、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融合,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亲和力和针对性。同时学校、家庭、社会也要共同努力,形成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完整闭环。

(二)供给内容和形式上的多元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指明了思政工作的重要意义,也明确了思政工作的丰富内涵。高校思政工作要占据互联网的阵地,必须通过内容和形式上的精心设计实现对需求侧引领的效果。

1. 在内容方面,高校思政教育要以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完善和提升大学生的道德涵养和思想素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目标。这包含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意识教育、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特别是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自”教育以及先进性别教育。

思政教育登陆互联网,就要研究互联网的传播规律,互联网受众的关注习惯,从教育内容的体例、架构、标题、案例设计、课件制作、语言,甚至内容时长上进行创新。要研究当代女大学生的心智特点,当代大学生愿意接受的内容要具备“三有”即有用处、有道理、有意思。特别是女大学生高度关注性别平等、人际关系、职业发展等问题,这就要求思政教育的内容要能唤醒受众内

在的利益需求,娓娓道来,生动讲述。中宣部、教育部于2015年印发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为我们提供了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要提升思政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以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2. 在形式上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点明了新形势下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

一是应考虑制作更多高质量的微课作品,并通过新媒体形式发布。要总结近年来国内外大规模线上课程的成功经验,按照女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使思政课程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使新媒体平台成为其思想营养的来源。

二是积极建设校本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调查显示,高达97.22%的女大学生都关注学校自身的微信号(包括学校官方微信、学校团委微信等),且90.67%的是通过自己搜索、学生组织宣传或同学介绍进行关注的。这说明,女大学生对校本媒体平台的需求非常强烈,校本新媒体平台具备成为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的基础,要努力将其打造成女大学生信任的权威平台。

调查还显示,女大学生关注的微信公众号(订阅号)数量较多,关注10~30个的占50.69%,关注10个以内的占40.81%。如何在众多公众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对校本新媒体平台的运营提出了很高要求,其致胜之道在于紧贴学生需求实际,通过文字、图片、漫画、微视频、H5等丰富的表现形式,将有意义的事情用有意思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回答通过网络新媒体主要关注哪些信息时,选择关注学业相关信息和新闻事件的女大学生分别占73.94%和73.97%,这表明校本新媒体平台应在这两项内容的供给上精准发力,将对女大学生的思想引领和服务其成长蕴含其中,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三是探索建立网上班级、网上团支部等“网上家园”。这既可以开辟班级、支部网上活动的阵地,又便于拉近师生、同学之间的距离。由于虚拟世界离开了现实社会的种种约束,个性解放和自我

张扬变成一种相对容易的体验,正值个体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确立关键时期的女大学生面对网络世界带来的多元价值取向时,其身心成长易受其影响。但网络班级由于既具备虚拟世界的特点,又集合了年龄、心智相对一致的大学生群体,辅以老师的指导,可以成为立德树人的良好平台。

(三)供给途径上的“堵”“疏”结合

网络新媒体鱼龙混杂的情况,使得女大学生容易成为受害群体。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调查显示,在回答网络新媒体对自己学习生活的影响时,94.24%的受访女大学生认为有助于开阔视野,80.54%的认为方便人际交往,56.72%的认为有助于明确职业规划,48.97%的认为有助于增强自信(见表4)。这决定了从供给途径上对于网络新媒体的监督管理需要“堵”“疏”结合。

表4 网络新媒体对女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哪些帮助

选项	小计	比例
开拓视野	3826	94.24%
增强自信	1988	48.97%
明确职业规划	2303	56.72%
打发时间	2218	54.63%
方便人际交往	3270	80.54%
其他	172	4.2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4060	

所谓“堵”即堵住网络新媒体中负面信息的来源。这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尽快建立健全媒体信息监管的法律法规,提高传播不良信息的犯罪成本,从源头予以杜绝。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互联网进行审查和监管,集中在防范网络犯罪、限制不健康内容的传播,禁止危害社会公共道德和公共利益、规制对他人隐私和人格的侵犯、重视保护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1]。2004年教育部曾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校园网络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在高校教育网实施实名制,但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需要立法的与时俱进,特别是提升互联网监管的立法层次,不断提高法律法规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是监管部门对主要网络新媒体平台的所有者和运营商给予严格监督,使其权责一致,切实担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三是建立健全便利的举报机制,发挥公众监督力量。如英国内政部和城市警察署等部门签订《安全网络:分级、检举、责任协议》,设立热线接待公众投诉,并针对投诉内容指定相应部门处理。

所谓“疏”则是鼓励积极向上的信息的推广。一是主管部门要积极提倡和弘扬主旋律;二是媒体供应商应自觉传播积极健康的资讯。

(四)及时评估运用互联网开展思政教育的效果

自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学校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及教育服务平台,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以来,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变革蓬勃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因势而新,不断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互联网+高校思政工作”不能是新瓶装旧酒。必须及时评估使用新技术开展思政教育的效果,关注女大学生的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实现供给的精准发力。

“互联网+高校思政工作”的目的在于立德树人,根据青年学生的思想特点和成长发展需求,利用信息技术的手段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帮助青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

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从育人的角度而言,“互联网+”的目的不是要将学生“捆绑”在互联网上,而是使学生能够理性辩证地看待互联网,成长为人格健全、热爱生命、遵纪守法、勇于承担责任、善于创新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公民。调查显示的一组数据令人欣慰,53.97%的受访女大学生认为自己在使用网络新媒体时应更好地控制时间,42.93%的认为自己在使用网络新媒体时应更有目的性,仅有3.1%的认为自己不需要改进。通过“互联网+思政教育”传递的信息,可使女大学生对原文原著产生兴趣,进而重读深度阅读的能力和批判理性的思考,从这个角度上说,“互联网+”恰恰是为了今后的“互联网-”。

注释:

① 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15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xzbq/qsnbg/>。

参考文献:

[1] 罗静.国外互联网监管方式的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6):117-121.

Analysis on Supply - Side Reform of

“Internet +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aking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as Example

WANG Lu, GUO Xiao-dong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 China)

Abstract: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s related to the essential issue of what kind of people we cultivate and how to cultivate people, just a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emphasized on the conference of national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Presently,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has outgrown that of the male students, so the special gender traits, learning habits, and psychological features of female students ask for special approaches to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new generation and new media rising, only by learning college female students' expectations for “Internet +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s the demand side and putting forward targeted direction for supply - side reform, can we improve “Internet +”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Key words: “Internet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责任编辑 王 灵)

校园贷与女大学生消费观矫正

谢 婕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淄博 255049)

摘 要:校园贷是大学生网络贷款的专有名词。由于在女大学生中出现“裸贷”现象,引起了人们对女大学生消费观的关注。女大学生校园贷的原因主要有:女大学生发展性消费旺盛;女大学生就业创业不容乐观;女大学生情绪化心理诱因渐多等。校园贷对女大学生群体带来以下危害:伤害了女性身心健康;弱化了知识的价值;强化了拜金主义;淡化了“女德”思想。因此,必须对女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引导女大学生形成科学的消费观念;提高女大学生道德素质;加强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女大学生创业就业教育。

关键词:校园贷;女大学生;消费观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5-0093-04

校园贷是大学生网络贷款的专有名词,指的是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借贷的行为。这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而崛起的新兴事物。2016 年 4 月国家教育部与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高校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日常监测机制和实时预警机制,同时,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应对处置机制。2016 年 8 月,中国银监会也明确就“校园贷”提出用“停、移、整、教、引”五字方针,来整改校园贷问题。

女大学生进行校园贷已经不是由于金融安全意识匮乏带来的问题,也不是知识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价值观层面的问题。高校必须从加强女大学生消费观的教育与引导入手,使她们学会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从而矫正扭曲的价值观。

一、女大学生校园贷原因及校园贷给女大学生群体带来的危害

(一)女大学生校园贷原因分析

1. 女大学生发展性消费旺盛。有的高校女大学生往往在生活上,爱打扮、爱淘宝、爱唱歌、爱明星;心理上,她们有些更爱表现、更爱炫耀、更爱展示。由于以上原因,一些女大学生的消费观更超前,她们的发展性消费需求更旺盛。

2. 女大学生就业创业不容乐观。很多单位招聘岗位仅限男生,即使是男女同等名额招收的情况下,女大学生符合条件的多,男生符合条件的少,因此女大学生竞争力更大。女大学生就业压力偏大,就会导致就业心理失衡。这对女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在创业方面,鲜有女大学生参与,女大学生在创业方面更需要得到辅导和培训。

3. 女大学生情绪化心理诱因渐多。近年来,

一些高校女大学生自我意识突出,她们往往很敏感,遇事处理不冷静,容易情绪化。校园内五花八门的原因,使一些女大学生变得越来越容易动怒,越来越容易赌气,越来越容易走极端。情绪化消费,更让女大学生为了满足一时心理需求,往往不计后果而终于酿成苦果。情绪化心理带来的种种负面问题,让一些女大学生后悔不已,校园贷与此也有密切关系。

(二)校园贷给女大学生群体带来的危害

1. 伤害了女性身心健康。一些不良网贷平台,引诱女大学生拍摄裸照,逾期未还贷者被安排“肉偿”,这种行为在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性剥削和性讹诈。裸贷视频的曝光,不仅给女大学生带来名誉的损害,更为其带来了长久的心理阴影,使其身心受到双重伤害。一些校园贷女大学生难以回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心理上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债”。“以前我宁可出卖肉体也不出卖灵魂,可是后来看到网上横飞着的我的裸照时,我发现灵魂也好、肉体也罢,都成了一团死灰”^[1]。这是一个校园贷女孩的自述,由此可见,校园贷对女大学生带来的身心伤害之大,危害之烈。

2. 弱化了知识的价值。女大学生读大学,目的是通过学习,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就业难的问题让女大学生心理失衡,与读书学习找工作赚钱相比,校园贷来钱轻松而又便捷。被要求拍摄裸照视频的女大学生,没有受到任何威胁,都是自愿裸露身体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拍照的。在金钱带来的刺激和享受下,女大学生的价值观出现危机,学习积极性弱化,新的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

3. 强化了拜金主义。在消费经济刺激下,女大学生作为高学历消费群体,高消费特点较为明显。在北京读大学的冯萧,为“买买买”走上了网络贷款道路,她在借贷宝等多个平台均借过款,最多时共欠款三万多元^[2]。她为了满足虚荣心,盲目地陷入了拜金主义的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深渊。

4. 淡化了“女德”思想。对校园贷女大学生而言,“她们缺钱,更缺只有充裕的金钱才可能带

给她的自信和尊严”^[3]。由于缺钱而失去自信,由于缺钱感到没有尊严,由于缺钱就去校园贷,这说明了女大学生观念中的现代女德思想的缺失。女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女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影响着国家的社会风气,女大学生的道德思想关乎整个国家的道德教育程度,然而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的女德思想在女大学生身上逐渐淡化。

二、教育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一)引导女大学生形成科学的消费观念

1. 量入为出,不攀比。近些年来,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也“水涨船高”。旅游消费、培训消费、创业消费、奢侈品消费、高档电子产品消费等都在迅速攀升,消费结构在悄然改变。在消费结构调整的当今大学校园,必须加强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的消费理念教育,引导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考虑自己家庭的经济实力,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大学校园要通过班会、主题团日活动、座谈会、沙龙活动等思想上教育引导女大学生。还可通过举办“记账达人赛”“科学消费周周赛”等比赛活动,在行动上促进女大学生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2. 避免情绪消费,不跟风盲从。高校应该注意女生的消费观教育、理财教育、金融知识教育;应该侧重开展针对女生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要教育引导女大学生根据自身需要进行消费,避免盲目跟风,情绪化消费。商家、企业要根据女性需求特点开展营销策略,高校也应该根据女大学生的需求特点开展教育引导策略,如开设女性理财课程、女性理财沙龙等帮助女大学生理性消费,避免盲目消费。特别在重要节庆日、购物狂欢日等时间节点,多开展金融理财类宣讲活动,呼吁女大学生要理性消费,不要盲从。

3. 勤俭节约,不过度消费。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必须在新时期继续发扬。当前高校存在着大量浪费现象,水浪费、电浪费、粮食浪费在校园各种浪费现象中最为突出。浪费现象带来人们内心价值观念的扭曲变形,不以勤俭节约为荣,反以铺张浪费为荣。有些女生爱炫爱夸,喜欢攀比,所以必须加大女大学生传统文化

教育,倡导勤俭倡导节约。高校可以通过宣传栏、网站、微博、飞信、微信、QQ 等新媒体平台宣传节俭、节约思想;通过成立专门女性社团,举办社团活动,进行社会实践的行动,促使其养成节约用电、节约用水、节约粮食等良好习惯和行为;着重发挥女大学生在学生会、社团、团支部、班小组等学生组织中的作用,使她们融入集体,融入组织生活,提高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能力。

(二)提高女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1. 树立“四自”精神,引领女性风尚。要积极倡导“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精神。校园贷事件充分暴露出女大学生缺乏“四自”精神,高校需要集中精力、集中时间、集中人力做好女大学生“四自”精神的培养。通过女大学生传统文化课堂灌输“四自”精神,通过传统文化活动慢慢渗透“四自”精神,通过传统文化比赛慢慢熏陶“四自”精神。精神的培养是循序渐进的,不会一蹴而就。不仅要让女大学生做到思想上自尊、自爱、自立、自强,还要将其贯彻到其学习生活中。

2. 强化传统美德和廉耻文化教育。羞耻之心,义之端也。羞耻心是修身养德的开端,借助外部因素把道德规范外化为大学生的品行、内化为其品德,使其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并符合道德规范要求。人若缺少羞耻心,就可能无视所有的道义原则、法制规范。“羞耻心”这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旦被捅破,人往往就会干出一些丑陋的恶劣的事情。女大学生校园贷事件就可以看出一些女大学生羞耻心在淡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女大学生羞耻心的淡化,由来已久。培育羞耻文化,强化礼法道义在当代高校已迫在眉睫。高校首先应该加强宣传教育,通过网络、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宣传栏、校报等平台让广大学生知耻、明耻;其次要进行教育引导,辅导员、班主任、心理咨询师、任课教师等要利用班会、课堂、沙龙、座谈的时间做好学生的教育引导工作;另外,广大女大学生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维护女大学生形象。

3. 着重担当教育,树立远大志向。责任即担当,责任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有承担精神,不逃避,不推脱,不退缩。当代女大学生应该承担的

人生责任不仅包括对父母、对自己的责任,也包括对他人、社会、国家的责任。然而,当代女大学生普遍存在责任感的淡漠现象。其主要表现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缺少信仰,缺少追求,缺少动力。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女大学生责任感教育。从树立远大志向着眼,从养成教育着手,培养其责任感。培养责任感还应该从点点滴滴的具体小事做起,在具体的事情上,具体的活动中,具体的目标下,使其能自觉承担责任,履行义务,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逐步培养其责任意识,使其做到知责任、明责任、负责任。

(三)加强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 树立心理健康意识。心理健康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前提,培养身心健康的大学生是高校的基本责任和目标。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走向独立和成熟的关键期。对女大学生而言,除了学习之外,还正处在恋爱与性发育时期,这时候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教育尤为关键。女大学生之所以能进行校园贷,也正说明了她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因此高校要帮助女大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培养健康阳光的心态。通过举办阳光体育文化节等文体活动,从生理上促进其心理健康;通过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对其进行专业的心理健康培训,从教育上促进其心理健康;通过心理健康知识竞赛、团体心理游戏等,从活动上促进其心理健康。

2. 增强女大学生心理调适能力。女大学生为什么要进行校园贷,其中原因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但是一个共同的原因是女大学生的心理应对能力比较差。也许是由于虚荣,也许是由于一时缺钱,也许是由于赌气等等因素让女大学生不惜出卖自己的青春之躯,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女大学生面对问题、面对事情、面对环境缺乏调适能力的表现。因此高校加强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就是要增强女大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高校要帮助女大学生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让女大学生在面对挫折困难时有人可诉;建立心理咨询机构,增加心理咨询时间,使女大学生在有心理困惑时有人可解;建立朋辈辅导机制,加强朋辈辅导培训,使女大学生在面对心理难题时

有人可帮。

3. 预防心理不良问题。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流行和新媒体的发展,大学校园中的心理问题日渐突出。空心病、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心理病例增多,不良的心理问题给大学生带来诸多困扰,使其学业难以维系。除了心理不良问题外,许多女大学生还备受情感困扰。因此高校还应该针对女大学生开设情感课程,让女大学生不再在情感的天空折断翅膀,迷失自我。

(四)加强女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

1. 提高女大学生就业率。女大学生就业压力偏大是近年来不争的事实。如何提高女大学生就业率,缓解女大学生就业压力,是帮助女大学生经济自立、生活独立的开始。只有解决了经济问题,思想认识问题、道德伦理问题、心理问题,就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因此高校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针对女大学生就业问题,分析具体原因,提出应对措施;要抓难点,建立结对帮扶,为毕业女生寻找就业岗位;要加强女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从简历制作、面试礼仪、面试技巧等方面给予专门指导,提高女大学生就业成功率。

2. 提高女大学生创业能力。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创业课,定期举办创业沙龙活动,设立了创业孵化园,很多高校大学生有了自己的创业项目。但是女大学生参与创业较少。创业艰难百战多,创业不仅仅是创富,还是创事业、创青春、创梦

想。创业可以大大提高大学生的理财意识,改变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增长大学生的金融知识。创业不仅是男生的事情,女大学生也应该参与其中,为自己青春梦想点亮一盏希望的灯火。因此高校在创业教育方面不能忽视了女大学生的创业需求。

3. 提高女大学生成长竞争力。成长竞争力是时代对女大学生提出的新课题,要求女大学生不仅具有学习知识的能力,还应该具有思辨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女大学生只有不断提高自身成长竞争力,才不会“被”就业、“被”选择,才能提高自信心。高校可以通过女性文化沙龙、女性高雅艺术欣赏会、女性传统文化课堂等,为女大学生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设立女大学生助学金,为女大学生健康成长提供资金来源;高校团委可以通过文化赛事、社团活动等为女大学生健康成长搭建平台。

参考文献:

- [1] 皮皮. 裸贷女孩自述:因为裸贷我被大学开除了[EB/OL]. http://www.thepaper.cn/www/v3/jsp/newsDetail_forward_1583272, 2016-12-20.
- [2] 隋雯雯. 裸贷女大学生:为“买买买”三年欠三万还钱后照片仍遭泄露[EB/OL].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6542, 2016-12-08.
- [3] 王小妮. 指责裸贷大学生之前,应该先听她们讲讲自己的贫穷[EB/OL].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wxn20161208.html>, 2016-12-09.

Nude Loan and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Core Values

XIE Ji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49, China)

Abstract: Campus loan refers to the loans issued to college students by online lenders. The phenomenon of “nude credit” that some girl students offer attracts people’s attention. Causes for such action are various, such as girl students’ strong desire for development, severe employment situation, increasing psychological incentives, etc. Campus loan harms female students in diverse aspects: hurt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grade the value of knowledge, make them more money – worshiping and reduces the virtues of woma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and educate female students, cultivate their sensible consumption norm, improve their ethical level, stress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vide help with their employment.

Key words: campus loa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norm

(责任编辑 赵莉萍)